第四散文

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集

安东 译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第四散文

——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集

作　　者　曼德尔施塔姆
译　　者　安　东
责任编辑　曹坚平　李　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5 万
印　　数　5000
ISBN-7-80616-476-6/I・173
定　　价　11.50 元

编辑说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 19 世纪 20、3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的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30多年前，美国的俄苏文学专家艾马努埃尔·拉伊斯应邀为法国文学界人士介绍俄罗斯新诗。当时听讲的人中有很多去过莫斯科，还有不少人通晓俄语。报告结束，有人向拉伊斯提问：在您提到的诗人中，谁最优秀？拉伊斯的回答：曼德尔施塔姆。尽管很多人听说过曼德尔施塔姆的名字，但他的回答还是令他们吃惊不小。因为毕竟同时代的还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

我并不觉得拉伊斯的看法是不争之论，我也不认为给诗人排座次是合理的、必要的。因为评价诗人高下优劣的尺度不同于体育比赛，其中主观因素和人为成分实在太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能强求一致。不过，基本的、大家有意无意普遍接受的标准总还是存在的，这使得人们的好恶取舍大体上不会相去太远。当然，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不过，对于拉伊斯的看法，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曼德尔施塔姆当之无愧地属于白银时代乃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诗人之列。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于1891年生于华沙的一个商人家

庭，少年时代在彼得堡和巴甫洛夫斯克度过，商业学校毕业后，先后于1907年和1909年赴巴黎和海德堡求学。1911年进海德堡大学研修语文，一年后转到彼得堡大学（没有毕业）。他是维·伊万诺夫家庭沙龙的常客。这期间，他开始在阿克梅主义机关刊物《阿波罗》杂志上发表诗作，并结交该流派领导人古米廖夫，成为与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相对峙的“诗人车间”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里成为莫逆之交的，即使在后来最困难的时候，两人的友情也从未间断。1913年发表第一本诗集《石头》和最初几篇随笔。十月革命后辗转居住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1920年秋与爱伦堡一起回到莫斯科。1922年在柏林出版第二本诗集《Tristia》。1925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时间的喧哗》和文学论文集。1928年受到政治迫害，幸亏有布哈林的帮助，使他得以去亚美尼亚暂避一时。1931年起居住在莫斯科。1934年5月被捕并被判处流放，先后在乌拉尔地区和沃罗涅什过了三年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1937年5月回到莫斯科，1938年5月再度被捕并被遣送至远东的集中营，年底被处决。

曼德尔施塔姆有“文化诗人”之称。他崇尚古典诗歌（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的严谨，这一点表现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尽管他的诗里经常出现与古典诗歌背道而驰的极其独特的隐喻。曼德尔施塔姆善于挖掘词语原始的非常规意义。他似乎不善于使用现代语言，好像生活在遥远的古代，而与现代的东西格格不入。他痴迷于古希腊文化，沉湎于经典作品的世界，执意要通过对某些人物或某些情节的改写，对历史进行重新体验。勃洛克说“他的诗来自梦——非常独特的、艺术领域的梦”。奇特的联想，复杂的比喻，纷繁的文化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接受。他的诗只有少数可以转述。他的诗，既洋溢着现代主义气息，又是对

现代主义的超越。

尽管曼德尔施塔姆主要以诗人著名，但他的散文遗产也不容忽视。曼德尔施塔姆研究家鲍里斯·菲利波夫说："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是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其实，在文化中，本无所谓'前进'和'倒退'：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摆脱了别雷的心理叙述，摆脱了扎米亚金的神话现实主义，摆脱了陈旧的情节性叙述方式。他的散文有时具有情节上或言语上的诙谐，有时具有组曲的结构，机锋四出，妙语连珠。他的叙述永远不是沿着以往情节核心——主人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心理动机——的路线进行。他是从主人公周围的事物，生活的历史背景落笔，间接地、侧面地刻画人物。这个背景如此靠近主人公，以致有时简直要遮住他、淹没他。然而，不管这有多么不可思议，我们都必须承认，曼德尔施塔姆笔下的人物要比用直接和正面的老手法描绘出来的人物优越得多。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同时也是时代的编年史和大合唱。"

曼德尔施塔姆写过近百篇特写、随笔、文论和书评。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作品与诗歌作品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互为补充，相互印证，甚至相得益彰。对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感兴趣的读者，不可不读；欲欣赏文采斐然、深沉睿智的文学散文并从中受到启迪的读者，更不可不读。

郑体武

1997 年 10 月于上海

目　录

巴甫洛夫斯克市[1]的音乐

俄罗斯 90 年代那些死气沉沉的岁月，我至今记忆犹新：蜗牛般的爬行，病态似的安静，根深蒂固的迂腐，这一切仿佛一潭死水，它是垂死的世纪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人们在饮早茶时，不时议论着德雷福斯[2]，提到埃斯捷尔加齐和皮加尔这两位上校的名字，不知可否地争论着《克鲁采尔奏鸣曲》，以及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上站在高高的谱架后面的指挥家们的轮番上场，这在我看来，就像朝代的频繁更迭。街角上伫立着一个个报贩，他们既不叫卖，也不走动，只是笨拙地站在人行道上。带着小折椅加座的狭小的轻便马车一辆接一辆在街上行驶。在我的记忆里，90 年代都是由一张张破碎的图画拼接成的；然而，无声无息的贫困和病态，注定要灭亡的生活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女人们衣袖上宽宽的皱褶，蓬松的肩膀，裹紧的肘部，勒得细细的柳腰；唇髭，西班牙式的短尖胡子，修剪整齐的胡须，一张张男人的面孔和各种发型，这种发型现在只有在偏远的理发店的画着前额垂有卷发的和鸡冠型发式的画廊里方能看得到。

简而言之，女人们衣袖上的皱褶和巴甫洛夫斯克市里的音乐，90年代仅此而已。女人们身上蓬起的带有皱褶的一个个气球似的衣袖和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玻璃明净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旋转，指挥家加尔金站在世界的中心。

90年代中期，彼得堡人都向往着巴甫洛夫斯克，也向往着一个叫埃里齐的城市。轮船的汽笛、火车的铃声和1812年序曲的爱国主义旋律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响彻着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③的音乐的庞大的车站里散发着一股股特别的气味。发霉的公园里的潮湿空气，暖房和温室玫瑰散发出的霉味，雪茄烟味，车站里的煤焦味，成千上万人群身上的脂粉气，统统都交杂在一起。

结果，我们都变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我们成年累月都生活在这个老态龙钟的城市里的冬季别墅里。这是一座俄罗斯的凡尔赛宫，是宫廷侍从、普通的守寡女人、红褐色头发的警官、身患肺痨的教员(他们认为住在这里有益于身体健康)、拥有私人住宅的贪官污吏们的城市。啊，这些年来，菲格纳④渐渐失去了歌喉，人们到处传阅着他的一张双面照片，正面是他在歌唱，反面是他在挖耳朵。装帧精致的杂志《田地》、《世界处女地》、《世界文学通报》几乎把书架、铺着绿呢面的小方牌桌压垮，成了小市民书库里的最主要的藏书。

现在已经觅不到像这般庞然大物的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然而，这些《全球博览》、《处女地》却是认识世界的真正来源。我爱读关于介绍鸵鸟蛋、双头牛、孟买和加尔各答节日风俗的杂俎栏，尤其爱看其中的整幅图片：双足系在木板上从三层楼高的浪尖上滑行的马来亚游泳能手和富克先生的秘诀，他可以使巨大的摆锤围着一只金属圆球旋转，戴着领带、长着胡子的绅士们神情严肃地在四周围观。我觉得成年人和我一样，也阅读这些杂

志，也就是说，主要看那些铺天盖地涌现出来的诸如《处女地》等杂志里的附页。我们的兴趣，一般来说都是相同的。我七八岁时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用轻率而得意的调门，装出闷闷不乐的神态，不断地用法语重复着：时代结束了。为了证实德雷福斯无罪和与鬼岛清算旧账，这个可怕的时代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男人们为德雷福斯案夜以继日地消耗了全部心血，而女人们，也就是那些穿着打皱褶衣服的太太们却在不断更替身边的女仆，好让她们为兴致勃勃的谈话源源不断地做出可口的食品。

在涅瓦河畔的叶卡捷琳娜天主教堂里住着一位年高望重的小老头——拉格朗日神父。他的职责就是把贫穷的法国女孩介绍到有钱人家当保姆。太太们直接从外商商场买来礼物向拉格朗日求教。他出门总是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身上穿一件粗布长袍，常常用貌似笃诚的天主教的笑话，再加上些法国的俏皮话逗得孩子们咯咯发笑。大家对拉格朗日神父的介绍工作评价很高。

设在弗拉基米尔大街上的著名的厨娘、保姆、家庭女教师的介绍所，是大人们带我去的地方，它就像一个贩卖奴隶的市场。渴求工作的人依次被带到位子上。太太们嗅她们身上的气味，还索看她们的鉴定书。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特别是一个将军夫人所写的鉴定书被认为是十分有分量的。不过有时也发生这样的事：被带出来出售的人对雇主瞟上一眼，朝她嗤之以鼻，回身就走。这时，贩卖女奴的经纪人立刻走出来道歉，并且说些世风日下的话。

我又一次向巴甫洛夫斯克投上一眼，每天清晨，我漫步在条条小路和车站的镶木地板上，在那里，一个晚上积起的彩纸屑和

彩纸条足足有半俄尺厚，这是纪念某一演员在此演出的热烈场面留下的痕迹。一盏盏煤油灯正在改装为电灯。彼得堡的街头至今仍在奔跑着有轨马车和磕磕绊绊走着唐·吉诃德骑的那种驽马。沿着豌豆街到亚历山大花园行驶着四轮轿式马车，这是彼得堡最古老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在涅瓦大街上叮叮当当地驰骋着用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拉着的黄颜色的新式特快驿车，它和过去脏兮兮的暗红色的驿车有很大区别。

译注：

① 原苏联列宁格勒州城市。铁路车站。城市始建于1777年，有俄国沙皇郊外行宫。

② 1894年法国反动军阀诬告犹太血统的军官阿·德雷福斯充当德国间谍，被判处终身苦役。围绕德雷福斯案的斗争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赦，1906年恢复名誉。

③ 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④ 俄罗斯抒情戏剧男高音歌唱家。

孩子气的帝国主义

矗立在国务会议大厦对面的骑在马背上的尼古拉一世的纪念像，始终如一地在安抚着因为年久而长了青苔的近卫军士兵，安抚着一个个冬天和夏天。他头上低压着一顶毛茸茸的羊皮帽子。它的式样像东正教主教头上的金冠，很大很大，几乎用整张羊皮做成。

我们这些孩子和一个年老体衰的哨兵聊起天来。他使我们很失望，因为他不是我们所想的经历过1812年。不过，他告诉我，他的爷爷们是尼古拉陛下的卫士，在整个连队里，他们是硕果仅存的五六个人。

沿岸街上的夏季花园的大门围着铁丝网，设有岗亭。在工程城堡对面的地方也由挂着勋章的骑兵队长护守着。他们察看每一个游客穿着是否整洁，赶走那些穿着俄国靴子的人，不让戴着便帽和穿着小市民服装的人入内。在夏季花园里，孩子们的举止都非常有礼貌。一个光脚的小女孩跟家庭教师，也许是保姆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以后，就走到一条长椅跟前，“啪”地一下站定或者坐下来，尖声尖气地说：“小姑娘（或者叫小男孩，这是他们的正式称呼），您愿意跟我一起

玩‘打门’和‘救命棒’游戏吗？”

你可以想象得出，只要开了头，他们会玩得多么开心。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而且这种交友方式对我来说很不习惯。实际上，我的遥远的彼得堡的童年时代是在名副其实的军国主义的标志下度过的。说实话，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而要怪我的保姆和当时彼得堡的街道。

我们常常沿着海军大街空旷的地段散步，那里有红色的新教教堂和一条用木块铺砌的名叫莫依卡的沿河街。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克柳科夫运河边上，这里是荷兰风格的彼得堡，有造船台，有刻着罗马神话中海神和航海标志的一道道拱门。然后，我们又不知不觉走到近卫军步兵的营房前面。

这里，在这条绿色的、从未走过马车的路上，海军近卫军士兵们接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一面面铜鼓振荡着宁静的河水。我喜欢对人的体格进行筛选：这些士兵的身材都比常人要高。保姆和我的趣味完全相投。这样，我们都喜欢上了一个长着黑胡子的水兵，就到这里来想亲眼见见他。我们从队列里找到了他，就目不转睛地朝他看，一直到操练结束。彼得堡这片广阔的土地，花岗石和木块铺砌的街道，泛滥着汛水的广场，树木繁茂的花园，一座座小岛似的纪念碑，矗立着一根根女像柱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神秘的百万街，那里从未有过行人，在众多的大理石建筑中只有一家小铺夹在里面，这一切都是这座城市的温柔的心脏。我尤其喜欢总司令部的拱门、参政院广场和荷兰风格的彼得堡。我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当时我虽然只有七八岁，然而我认为这些地方是神圣而又华丽的。

我不知道卡庇托林①给罗马的小公民产生了哪些想象。我却把要塞和宽阔的广场想象成某种不可思议的、崇高的公众阅兵的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喀山大教堂，尽管它有着朦胧色彩的拱门和如林的破旧旗杆，我却丝毫不相信它。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但是我想以后再谈。马蹄形的石头柱廊和防范暴乱而用铁链子围住的宽阔的人行道，在我的记忆里并不比马尔斯教场上的五月阅兵逊色多少。天气会怎样？会不会起变化？今年会有阅兵吗？……但是在夏季运河边上到处堆放着木板和板条；马尔斯教场上，木匠们已经在敲敲打打，一座座观礼台像小山一样崛起在地面上。冲锋演习的队伍卷起一团团尘土，像路标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步兵挥动着小旗。观礼台只化了三天功夫就搭成了。速度之快真让我看了吃惊，在我的眼里，它的规模就像一个大斗兽场。我每天都到工地上去，观赏工人们有条不紊的劳动，在脚手架上跑来跑去，站在上面，仿佛自己就是明天恢宏盛典的参加者。我甚至羡慕那些木板，它们一定能见到冲锋演习的壮观场面。

如果能悄悄躲进夏季花园里，那有多好啊！那里，成百支军乐队鼓乐齐鸣，演习场上刺刀出鞘，步兵和骑兵的队伍纵横交错，仿佛那不是一个个军团的队列，而是生长着的一垄垄荞麦、黑麦、燕麦和大麦。透过花园中的林荫通道，还能窥见各个军团之间的隐蔽活动！还有那银光闪闪的号角，震天响的呐喊和雷鸣般的击鼓声……甚至还能看到骑兵散兵线呢！

我始终感到，彼得堡必然会举行蔚为壮观的活动。

在举行王储葬礼的那天，长长的黑纱将盏盏油灯连成一串又一串，灯罩外也裹着黑纱。我心里高兴极了。亚历山大圆柱大厅门前的岗哨、将军的葬礼、“巡街”都是我每天要做的游戏。

当时，大家把沙皇和他的家庭出来逛马路称为“巡街”。我对做这种游戏已经掌握得非常熟练。宫廷卫士像一只只长触须的棕红色的蟑螂，爬出来随随便便说一声：“先生们，不必拘礼，请

进。敬请光临……"可是,扫院子的人已经开始用木簸箕向地上撒黄沙。警察分局长们的胡子也都抹上了染须剂。沿着商队街或者沿着马厩街都布满了警察,密密麻麻,就像一颗颗豌豆。

我总是向警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谁到这儿来,什么时候来?他们却从来不敢透露半点。他们被我弄得精疲力尽,我却觉得很好玩。必须说一句,饰有国徽纹章的、挂着雕有金色小鸟的马灯的豪华马车和套着披网纱的大走马的英式雪橇,往往在眼前一闪而过,总是让我大失所望。尽管如此,我觉得"巡街"的游戏是非常有趣的。

彼得堡的街道唤起我心中对观赏盛大场面的渴望,而城市的建筑使我产生了某种幼稚的帝国主义思想。我念念不忘近卫骑兵团士兵身上的铠甲、近卫重骑兵团将士的头盔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乐队的银色号角。除了五月阅兵,近卫骑兵团庆祝报喜节②的盛况,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节日。

我记得《奥斯拉比亚》号装甲舰下水的情况。它像一只庞大的海蝎慢慢地爬进水中。我还看到大吊车和船台滑道上的两条脊梁。

那种种形形式式的黩武主义表现,甚至包括某种警察美学观点已经植根在某一个具有相应的家庭传统的军长儿子的心上,但是与中小市民厨房里的油烟,与散发出皮革味的父亲的书房,与犹太商人的生意谈判却是极不协调的。

译注:

① 罗马城发源地的七丘之一,上有卡庇托林神殿,是元老院和民众大会聚会场所。

② 俄旧历 3 月 25 日东正教节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诉圣母:耶稣将诞生。

骚乱和法国女人

大学生们什么时候将在喀山大教堂门前闹事，总是有人事先知道的。每个家庭都有知情的大学生。一群群看热闹的人都汇集到这里，站在很远的地方观看这场骚乱，他们中间有带着孩子的保姆，无法把闹事的孩子关在家里的大妈、大婶，上了岁数的官吏和形形色色的游手好闲之徒。在预定闹事的一天，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从花园街到阿尼奇科夫桥堍，观众如潮，人山人海。喧闹的人群都不敢靠近喀山大教堂。警察都躲在各个院子里，比方说，躲在叶卡捷琳娜天主教堂的院子里。相比之下，喀山广场却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三三两两的大学生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蹓跶。突然，从喀山广场那边传来长长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的号叫“呜——呜”，后来又变成震天动地的吼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时，观众们纷纷向四周闪开，马群向人堆里冲过去。“哥萨克，哥萨克！”这声音闪电般地掠过人群，比飞驰而来的哥萨克还要快。骚乱者被严严地包围起来，被赶到了米哈依洛夫练马场。涅瓦大街一下子变得寥落了，好像用扫把清扫过一样。

街道上黑压压的人群给我留下了最初的、清晰的、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刚满三岁。1894年,家里人把我从巴甫洛夫斯克带到了彼得堡,打算观看亚历山大三世的葬礼。在临近尼古拉街的涅瓦大街上我们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间,在四层楼上。在举行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我爬到窗台上看见街上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就问:"什么时候举行葬礼?"回答说:"明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些人整夜都站在街上。我第一次感到,甚至连死亡竟然也变得如此不同寻常,变得如此豪华和隆重。有一次,我跟着保姆和母亲走过莫依卡大街上的意大利大使馆的褐色大楼,突然看见大门敞开着,不管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参观。从门里飘出来一阵阵松脂、乳香和一种甜滋滋的好闻的气味。入口处和墙上都垂挂着黑丝绒,点缀着各种银器,摆放着热带植物,涂上防腐剂的意大利大使躺在高高的长桌上。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可是它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还把它珍藏在心里。

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每天清晨五点钟,在大海军街上散步,从豌豆街一直走到总司令部的拱门。城里一切打扮得摩登入时的无所事事的人在人行道上悠闲自在地走来走去,大家点头致意,相视而笑。你可以听到马刺的叮哨声,用法语和英语的交谈声,还有英国商店和赛马总会的流动展览。许多保姆、家庭女教师和年轻的法国女人都把孩子们带到这里来,为的是能轻松一下,并且好跟爱丽舍田园大街作一番比较。

家里为我雇了不少保姆,她们各自的面容,我已经分不清了,都融合成了一张共同的肖像。在我的眼里,所有这些法国女人和瑞士女人都被唱歌、练字、文选和动词变位法弄得十分幼稚可笑。被众多的阅读文选扭曲了的注意中心是拿破仑大帝和1812年的战争,然后是贞德(她是一个瑞士女人,同时是加尔文

宗[1]信徒)。我生性好奇,可是无论我怎样想方设法向她们了解法国的情况,除了知道法国很漂亮以外,其他一无所获。法国女人对艺术十分钟爱,说话很快。瑞士女人会唱很多歌,其中有一首歌叫"犬尾猴之歌"。这些可怜的小姑娘都深深崇拜着伟大人物:雨果、拉马丁、拿破仑和莫里哀……每逢星期天,她们可以出去做弥撒,但是不允许和别人认识。

在法兰西岛某地有大桶葡萄酒,有白色的道路,有白杨树林。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带了几个女儿到住在里昂的外婆家去。回家以后一见,到处都贴着封条,压榨机、发酵桶都被钉死了,门上和酒窖也被贴上了封条。总管想逃过税吏,藏起几桶新酿的葡萄酒,可是被当场抓住了。一家人从此破了产。必须缴纳一大笔罚款。结果是,法兰西的严律向我赠送了一位女教师。

我哪里顾得上去观赏近卫军节日的行进队伍?步兵和骑兵都装扮得漂漂亮亮,但都是千人一面。他们一个个都是呆板的面孔,走在花岗石和大理石铺成的灰色的百万大街上,发出宏亮的脚步声。

彼得堡的和谐的幻景,只不过是一个梦,是深渊上的一层闪光的覆盖物,周围都是犹太人的混乱世界,既不是家园和房屋,也不是暖烘烘的炉灶,而是不折不扣的混乱世界,一个陌生的、鄙俗的世界。我从那里走出来,我见了它就害怕,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它的存在,于是,跑啊,跑啊,不停地跑。

犹太人的混乱世界无孔不入,进入到每一个用石块垒起的彼得堡的房子。它隐藏在崩溃的威胁里,隐藏在来自外省的客人的房间里的帽子里,隐藏在未经翻阅的《创世纪》的铅字笔划里(它被丢在积满灰尘的书架上,压在歌德和席勒的著作下面),也隐藏在黄黑色的宗教仪式的标记上。

俄罗斯严寒的年轮随着染色的鸡蛋、枞树、芬兰的钢制雪

橇、12 月的来临、扇车和别墅，在向前滚动。这里的季节的征兆都似乎颠倒了过来：9 月里过新年，以及一个个并不快活的古怪节日，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罗什-加沙纳、约姆-基普尔，在亵渎着你的视听。

译注：

① 基督教新教的学说之一，16 世纪宗教改革时发端于瑞士，由法国人加尔文倡导，流行于法、荷、英等国。

书　橱

犹太教的最细微的影响会贯穿着你的一生，就像麝香的一丁点儿粉末能使整个屋子香气扑鼻一样。啊，多么浓烈的气味啊！难道我可以无视在现今的犹太人的房子里散发出的气味和以前阿利安人居住的房子有什么不同吗？这种气味不仅从厨房里散发出来，而且也从人群、物品和衣服上散发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喷泉街上的木房子里，在德国人居住的里加，在爷爷奶奶家里，这种腻人的气味一次一次地向我袭来。父亲的书房早已不是我悠闲自得尽情散步的花岗岩筑成的天堂，它带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它那各种陈设的混合体和形形色色的收藏品在我的脑海里联成一条牢固的绳索。首先，是那把手工制作的橡木圈椅，还有三弦琴和一双连指手套，在圈椅的弧形把手上还有一行题字："宁静致远。"这是顺应亚历山大三世提倡的虚伪的俄罗斯文体的表现。其次是堆满帐本的土耳其式沙发和一张张用作商业信函的上面用德文密密麻麻写满哥特字体的烟卷纸。起初，我以为父亲的工作仅仅是用打字机打印那些用烟卷纸写的信函。直到现在，我似乎还闻到沉重劳动的气

味，到处弥漫着的熟皮子的气味，摊在地板上的一张张掌形皮革和形状像爪趾一样的新剥下来的毛茸茸的麂皮——这所有的一切，加上放着大理石小台历的小市民的写字桌，都在烟味中飘浮，被皮革熏得黄黄的。在这恶劣的做买卖的环境里，有一口玻璃小书橱被绿色的塔夫绸遮了起来。我现在就想说说这个书库。童年时代的书橱是一个人的终身伴侣。它那一层层书架的布局、收藏的书籍、书脊的色彩，总是被当作世界文学的色彩、高度和布局。那些没有放在第一层书架上的书籍从来就不可能跻身于世界文学之列，就像不可能进入宇宙空间一样。不管你愿意与否，在第一层书架上总是放着各种经典著作，绝不会去抽掉其中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奇怪的小图书馆，好像地层一样，沉积了几十年，并非是偶然的。父亲和母亲的藏书都是分开放的，从来不混在一起。这个小书橱的每一个剖面都是一段整个家族精诚努力和把别人的血液注射到它身上的历史。

我记得下层的书架总是零乱不堪的。各种书籍不是一本靠着一本竖得整整齐齐，而是像一堆堆废墟：封面破碎的、棕红色的摩西五经①，一个会说俄语的犹太教法典研究者用笨拙的语言写成的俄国犹太人史。这是被彻底粉碎的犹太人的混沌世界。我的最起码的希伯莱语都在这里忘记得精光，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学会。出于强烈的民族悔过精神，家里为我请来了一个地道的犹太教师。他住在商贸街上，教我念书的时候从来不脱下帽子，这使我很不自在。他那符合规范的俄语说得很不自然。希伯莱语的字母表配着各种各样的图画：小猫、小书、水桶、喷壶，每幅画上都有一个戴着便帽、长着大人面孔的、神情沮丧的小男孩。我认不出这个小男孩就是我自己，我全力向书本和科学进攻。在这个教师身上有一件事使我十分惊讶。虽然他话说得很不自然，

却有一股犹太民族的自豪感。他说起犹太人，就像那个法国女人说起雨果和拿破仑一样。可是我感觉，当他上街的时候，他从来不把这种自豪外露出来，因此我不信任他。

在犹太的废墟上筑起了书的楼房，而且都是德国人的世界：席勒、歌德、克尔纳和德国版的莎士比亚——都是古老的莱比锡版本，又厚又矮，深红色的压出花纹的硬封面，大概看到年轻人的眼力很好，所以字体印得很小，书里还有线条柔和的木刻插图，有一点古罗马的风格：长发披肩的女人用力使双臂弯向背后，灯的式样画得像烛台，骑士们都长着宽阔的前额，而在章节首尾处的小花饰都是一串葡萄。这是父亲自学攻读日耳曼世界中学究式难题的见证。

放在最上一层的是本国的俄罗斯书籍，1876 年伊萨科夫②出版的普希金著作。我至今还认为这是最好的版本，比起科学院的版本，我更喜欢这一种。在这个版本里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铅字排印得非常整齐清晰，每一行诗都排列得十分自然流畅，就像一队队飞速前进的士兵，就像英明的统帅将他们带回到记忆犹新的 1837 年。这难道就是普希金的色彩？任何色彩都是信手拈来的。你将选择哪种色彩表现低声细语呢？啊，兰波③的犹太人感色的基本知识啊！……

我的那些伊萨科夫出版的普希金著作中，有的包着没有任何颜色的封套，有的裹着中学生用的布封面，有的包着褪色的、带有一点沙土色的玄褐色的封套，它不怕沾上污迹、墨迹，也不怕火，不怕煤油。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黑黄色封套尽情地吸纳着一切新鲜的东西。我明显地感受到我那可亲的普希金不加修饰的精神美和肉体的魅力。在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用棕红色墨水写的字："赠给一个三年级女学生，奖励她学习努力。"围绕着这套普希金著作有一段关于一群献身理想的、脸上泛出肺痨性潮

红的、穿着破皮鞋的男女教师的故事。那是在80年代的维尔诺，母亲，尤其是外婆说起“知识分子”这个词儿，总是显得得意洋洋。莱蒙托夫著作的封面是浅绿色的，有一点军人的色彩，难怪他以前曾是个骠骑兵。我从来不把他当成普希金的兄弟或亲戚。我认为歌德和席勒倒是一对孪生兄弟。在这儿，我认清了一些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且自觉地将它们分开。要知道，1837年以后血和诗的声音都和以往不一样了。

那什么是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是《田地》杂志的附刊。这些书的装帧是一样的，就像他们的兄弟。包着皮面的硬纸板的封面。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上放着一块墓碑似的禁书牌。大家都说它“很重”；屠格涅夫的作品不在禁书之列，和巴登-巴登④、《春潮》⑤和懒散的谈话一起供人公开阅读。但是我知道，没有地方能找到屠格涅夫书中描绘的那种平静的生活。它早已不复存在了。

您想得到开启时代的钥匙，热得烫手的书吗？您想得到那些无论如何都不愿死去的书吗？它们活生生地躺在90年代狭小的棺木里。您想得到那些被读破的或被宅院里的板凳上的阳光晒得过早发黄的书吗？这本书的第一页上有一张梳着富有青春活力的发式的少年的、可以当作圣像的面孔。我望着青年纳德松⑥的脸，我为他脸上显露的炽热，然而又几乎是木然的单纯感到十分惊讶。难道全书从头至尾也是这样的吗？难道这些时代也是这样的吗？将他送到尼斯⑦去，让他看看地中海，他将会歌唱自己的理想和受苦的一代——除非再加上海鸥和浪涛。请不要去嘲笑纳德松式的心理分析——这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谜，实际上是它的一个不可理解的音符，因为我们不理解，也听不见，而他们却能理解，却能听见。他，这个永远生着一副没有表情的青年人面孔的、木头似的僧侣、这个热情洋溢的傻瓜似的青年学

生，也就是某一个十年中的优秀人才，这个中学晚会上的预言家，究竟是什么人呢？虽然我不止一次地知道纳德松不是好人，可是我还是一遍遍读他的书，渴望听到他的声音，就像整整一代人摒弃脱离实际的傲慢和为这个青年过去的愚昧而产生的愤恨，倾听他的声音一样。纳德松的日记和信件对我们帮助很大。他总是在谈：文学上的丰收、蜡烛、掌声、热情的面容；一代人围成一个圈，中间是一张祭台——放着一杯水的诵经者的小桌子。整整一代人，仿佛炽热的玻璃灯罩下的夏天的飞虫，在用别有寓意的玫瑰扎成的花环装点起来的文学节日的火焰里被焚烧得体无完肤，然而这个群体却具有祭祀和为一代人作出牺牲的本质。那个想至死不渝分享一代人命运的人向这里走来。傲慢的人都站在丘特切夫和费特[⑧]的一边。事实上，整个庞大的俄罗斯文学与患肺痨的一代，连同他的理想一起一刀两断。留给他的还有什么呢？纸扎的玫瑰、中学生晚会上的蜡烛和鲁宾斯坦的船歌。80年代的维尔诺，就像母亲将它生下来的时候一样，到处都是一样：十六岁的姑娘们都尝试着阅读斯图尔特·穆勒[⑨]的作品，耸立着一群光明磊落的人，他们的面孔没有表情，木然地坐在钢琴后面，在公众的晚会上用浑厚的和弦弹奏着安东的新作品。事实上，有着巴克尔[⑩]和鲁宾斯坦的知识界，由一群在神圣的愚蠢行为支配下迷失方向的光明磊落的人带领着，必然地走上火化自焚的道路。以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和热里雅鲍夫[⑪]为代表的民意党人，仿佛浸透树脂的火炬，在遍地燃烧。所有这些人，整个闭关自守的俄罗斯和“青年学生”都在令人同情地腐烂着，直到不留下一片绿叶。

多么贫乏的生活，多么可怜的书信，多么可笑的笑话和浅薄的模仿啊！我在家庭相册中看到一张米沙叔叔的银版照片，他是个长着虚胖面孔的性格忧郁的人。别人对我说，他不光是神经错

乱，而且是"烧死"了，就像这一代人宣告的一样。人们也这样评论着迦尔洵⑫。众多的牺牲汇聚成同一个葬礼。

谢苗·阿法纳西奇·温格罗夫是我母亲的娘家人(据我中学时代的回忆，他的家在维尔诺)，对俄罗斯文学一窍不通，而他的工作却是专门研究普希金的，"这个"他懂。他所谓的"这个"就是俄罗斯文学的英雄性格。当他紧紧扶住老伴的胳膊，带着从浓密胡子里透出的笑容，沿着城郊大街，从家里走到卡片库的时候；他身上的英雄性格显得多么美好啊！

译注：

① 旧约圣经头五卷的总称。

② 俄国图书商和出版商，出版有普希金全集、《教科书库》、《旅游丛书》等。

③ 法国诗人。

④ 联邦德国西南部的一城市。

⑤ 屠格涅夫的小说。

⑥ 俄国诗人(1862—1887)，他的抒情诗反映了一个正直而远离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思。

⑦ 法国一城市。

⑧ 均为俄国诗人。

⑨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⑩ 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⑪ 均为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谋刺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 年 4 月 3 日在彼得堡被处绞刑。

⑫ 俄国作家。

芬　兰

盖着绿色绸幔的红书橱和刻着“宁静致远”的圈椅，常常从一个住处移到另一个住处。有一处坐落在马克西米里阿诺夫斯基胡同里，在箭形的伏兹涅辛斯基大街的尽头，可以望见骑在马背上的尼古拉陛下的雕像；还有一处在军人大街上，离“为沙皇献身”纪念碑不远的地方，在一家名叫埃利尔斯的花店上面；再有一处在城郊大街上。冬天，就到芬兰，到维堡去过圣诞节，而别墅则在泰里约基。泰里约基有沙滩、刺柏、小木桥、供狗洗澡的浴棚，按照洗澡的次数在浴棚上画上鸡心或其他各种锯齿形的记号，还有彼得堡人喜欢的一个外国佣人，这是个冷冰冰的芬兰人，最爱观赏伊万诺夫家里的灯光和在被勃洛克①称为不修边幅和绿眼睛的民族宫草地上跳的动作笨拙的波利卡舞。革命前的彼得堡充满着一派芬兰的气氛，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②到勃洛克，他们的手心里都捏着芬兰的黄沙，用芬兰的柔雪抚摩着自己花岗岩般的前额，在自己沉睡的梦呓中倾听着低矮的芬兰马的铃铛的叮当声。我一向朦胧地感觉到芬兰在彼得堡人心目中的特殊意义，所以我特意上这儿来仔细思

考一下在彼得堡无法思考的问题。在这儿，低垂的积雪的天空几乎压到了头顶，借宿的小旅馆里，茶罐里的水都是冰冷冰冷的。我喜欢这个国家，那里所有的女人都是无可挑剔的洗衣工，而马车夫一个个都像古罗马的元老。

泰里约基[3]的夏天是孩子们的节日。回顾这件往事，真是太值得了！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和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穿着紧身上衣，向超过学龄的姑娘们并足致礼，然后和她们一起跳起四步舞和溜冰舞，这是一种90年代风行的轻松舞蹈，舞步很稳重，不带一点花俏。然后是做各种游戏：握蛋绑袋跑步，就是说，两条腿绑在麻袋里，手里拿一只木勺子，勺子上再放一只新鲜鸡蛋。中彩的人往往能赢到一头奶牛。这时，法国女人们就太高兴啦！她们像天上的小鸟一样，唧唧喳喳地说个没完，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孩子们则挤成一堆，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游戏。我们乘车到维堡[4]找一个当地的老居民，商人沙里科夫，他当过尼古拉手下的犹太兵。根据芬兰法律，他们后来定居在远离犹太人的净土——芬兰的土地上。沙里科夫这个姓，用芬兰话来说就是“小圆珠”，他开了一家专售芬兰商品的大店，起了个很长很长的德文店名，店里充斥着松脂、皮革、面包的香味，还有芬兰商店的特有气味，还有许多铁钉和麦米。沙里科夫一家住在一幢摆设着橡木家具的坚实的木头房子里。主人尤其感到自豪的是一只雕刻着伊凡雷帝一生的餐柜。他们一个个吃得肚子发胀，连从饭桌上站起来也感到困难。沙里科夫的父亲肥得像尊菩萨，说起话来带有芬兰口音，有一个女儿长得很难看，黑黑的皮肤，坐在柜台后面；其他三个女儿都很漂亮，一个个都跟着当地的卫戍部队的军官走了。房间里散发着雪茄烟和钱币的气味。女主人不识字，但是很贤惠。客人们都爱喝潘趣酒和滑雪橇，也是地地道道的牌迷。在离开了阴霾多雨的彼得堡以后，这坚实的橡木屋子使我感到

十分高兴。我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个在冰雪严寒中惯于卖弄风情的、一个个胸脯丰满的美人窝里。在法采尔糖果店里出售着香草饼干和巧克力，在蓝色的窗子外面响起雪橇的吱吱声和铃铛的奔跑声……从飞速的、狭窄的雪橇上跳下来，立刻走进热气腾腾的、散发着奶油味的芬兰咖啡馆，只见一个气势汹汹的小姐正和一个陆军中尉争得面红耳赤。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穿着紧身胸衣，不过，我记得他对天发誓，并且求她把手伸进他的军大衣摸摸他的肋骨。飞快的雪橇、潘趣酒、纸牌、像纸板箱一样的瑞典式要塞、瑞典话、军乐——维堡煤油灯里燃烧着的潘趣酒的蓝色火焰。后来举行过第一届杜马会议的望楼旅馆以干净、凉爽和像雪一样耀眼的床单而著称。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洋气和瑞典式的舒适感。这个固执又机灵的城市以及它的咖啡磨、摇椅、粗毛线地毯、写在每一张床头的圣诗，仿佛是一条上帝的鞭子，挑着俄罗斯军人的枷锁，但是在每一座房子里，在围着黑纱的木框里嵌着一张照片：一个叫苏奥米的没戴头巾的姑娘，在她的头顶上矗立着一头凶悍的双头鹰，恶狠狠地把一本书紧贴在胸前，书上有一行题字：Lex—法律。

译注：

① 俄罗斯诗人。

② 俄国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作家。

③ 列宁格勒州城市，滨临芬兰湾。

④ 列宁格勒州城市，芬兰湾港口，铁路枢纽。

犹太人的混乱世界

一次，来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四十岁左右，头上戴一顶红帽子，瓜子脸，一双乌黑的眼睛炯炯逼人。她自称出生在一个叫沙弗里的小地方，想求我们在彼得堡为她找一个丈夫。她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打发她走了。间或有一些行踪不定的著作家找上门来，有的是长络腮胡子和穿着长襟礼服的，有的是学究式的哲学家，有的是挨户兜售自己印制格言警句的商人。他们往往留下一本亲笔签名的书，然后就埋怨起自己凶狠的老婆如何虐待他。我这一辈子到犹太教堂只去过一二次，都是别人带我去的，就像去参加音乐会一样，排着长长的队伍，差一点没有从黄牛贩子手里去买门票。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使我回去以后不由得感到心情沉重。彼得堡有个犹太人居住区，它的一端刚巧靠近马林斯基剧院后面票贩子经常出没的地方，也就是在立陶宛城堡发生革命时被烧毁的监狱天使塑像的后面。在那里的商贸街上常常可以看到画着公牛、母牛的犹太人店铺的招牌、戴着从三角头巾下面露出来的假发的女人和穿着曳地长袍、健步走着的、深谙世故又钟爱子女的老头。锥形和

圆球结顶的犹太教堂，好像来自异邦的硕大的无花果，淹没在简陋的建筑之中。到处可见带小绒球的天鹅绒贝雷帽，疲惫不堪的教堂职员和唱诗班歌手，一张张插七支蜡烛的烛台，高耸的黑丝绒法冠。一艘犹太轮船带着清脆的中音和刺耳的童音在全速前进，它被历史的暴风雨劈成男女各一半。女声合唱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只得像窃贼那样钻进房架躲起来。教堂唱诗班长，好像大力士参孙①，摧毁着雄狮般的大厦。丝绒的法冠跟他十分匹配。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惊人的协调和清晰的咬音吐字都告诉人们，圣歌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可是当他在说“君主吾王”的时候，又是多么耻辱——拉比②的语言虽然文理通顺，但却十分丑恶。多么庸俗啊，他所说的一切多么庸俗啊！突然，两个头戴大礼帽，穿着讲究，炫耀着财富的先生，迈着上层人士的优雅步伐，轻轻摸着一本厚书，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根据众人的委托，代表众人准备完成某一件光荣的、也是最重大的事。这人是谁？金兹堡男爵，另一个又是谁？瓦尔沙夫斯基。

我小时候从未听到过行话，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听到好多这种带着尖利的重音，似乎用半音唱歌的话。我听着，常常感到惊奇、失望，留下很多问题。父亲的语言，母亲的语言——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的语言里是不是既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互不相融的语言呢？是不是它们塑造了行话的特征？母亲的话语清晰响亮，不带一点外国口音，她发出的元音很舒缓，音域很宽阔，完全是大俄罗斯的文学语言。她的词汇很贫乏，句式很单调，然而在这语言里蕴含着一种传统的和富有自信的东西。母亲爱说话，并且为被知识分子的习俗弄得贫乏不堪的大俄罗斯语言的字根和字音感到高兴。难道是她第一个渴望用纯洁清晰的俄罗斯语言来说话？父亲嘴里说出的话根本不能算语言，他口齿不清，近乎哑巴。是波兰犹太人的俄语吗？不是。是德国犹太人的俄语吗？

也不是。也许是一种特别的地方口音？不过我从未听到过。那是一种完全抽象的、凭空想象出来的语言，是一个自学者玩弄辞藻的俏皮话，在这种语言里，常用词和赫尔德·莱布尼茨和斯宾诺沙③的古老的哲学名词交错在一起，怪诞费解的学究式的句法、矫揉造作的、始终是有头无尾的句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不是语言，尽管如此，他说的还是俄语，也许是德语。

实际上，父亲将我带回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纪和遥远的、但绝对不是犹太人的环境里。如果您同意我所说的，那是一个在汉堡某地纯粹的 18 世纪，甚至是 17 世纪的犹太人文明区。宗教上的需求完全被抹杀了。启蒙哲学变成了奥妙费解的学究式的泛神论。在邻近斯皮诺兹的一家银行里正滋生着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卢梭④和他的自然人都预感到这点。一切都极为抽象、深奥和图式化。一个被训练成未来的拉比和被禁止阅读非宗教书籍的十四岁男孩子，只身跑到柏林，进入一所学究式的高等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许多像他一样顽强的、有悟性的，虽然身居穷乡僻壤却想成为天才的少年。他不读经书，而读起席勒⑤的作品，而且务请您注意，他读起来就像读一本从未读过的新书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又从这所奇特的大学回到 70 年代的沸腾世界里，为的是不忘记秘密开设在商队街上的牛奶铺。从那里，他们把地雷埋在亚历山大二世的脚下。在手套工场里，在皮革厂里，他向身体虚胖、满脸惊讶的顾客宣传 18 世纪的哲学思想。

当家里人要把我带到住在里加的爷爷奶奶家去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肯，差一点儿要哭出来。我认为，他们要将我带到一个不可理解的父亲哲学的故乡。一只只硬纸盒和上着挂锁的木筐、笨重的日常行李都被运走了。冬天的物品都一堆堆到处乱放着。竖起的一把把椅子用布罩着，像一匹匹白马。动身到滨海城市里加去，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那时，我收藏着一枚

枚铁钉。这是一种怪诞的收藏癖。我把一大堆铁钉抱起来，就像一个吝惜的骑士一样，我为自己的带刺的财富增多而感到高兴。这时，有人从我手里把铁钉夺了过去，放进一个小匣子里。

旅途动荡不安。晚上，在杰尔普特⑥，在昏暗的车厢里，爱沙尼亚人高声地唱着歌。他们攻占了这座小城镇，回来的时候就像过节一样，唱起歌来。爱沙尼亚人跺着脚，破门而入。这情景太可怕了。

祖父是个蓝眼睛的老头，戴着一顶小圆帽，遮住了半个前额，神情很傲慢，还有点官架子，就像一个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他面带笑容，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想让人见了感到温柔亲切，可是他装不像，两条浓黑的眉毛总是紧锁在一起。他想抱我，我差一点儿哭出来。慈祥的祖母在灰白的头发上套了一顶黑颜色的假发，身上穿一条带黄花的宽大连衣裙，在轧轧作响的地板上迈着碎步来回走着，总想拿出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招待我。

她不停地问："吃过了吗？吃过了吗？"这是她会说的唯一的俄文单词。可是我不喜欢这种只有老年人爱吃的甜得发腻的点心和苦涩的杏仁味。父母亲都进城去了。祖父整天愁眉苦脸，祖母也是心事重重，忙忙碌碌；他们想开口说话，可结果还是像一对受委屈的老鸟无精打彩地蜷起了身子。我拼命要向他们说清楚，我想回到妈妈身边，可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这时，我就用手指在桌子上打比划，用中指和食指做出走路的样子。

突然，祖父从五斗橱的抽屉里拿出一条黑黄色的丝绢，将它搭在我的肩上，要我一句句重复他说的听不懂的话。可是他不满意我嘴里发出的含含糊糊的声音，生气了，一个劲儿地摇着头。我感到窒闷，心里很害怕。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母亲是怎样赶回来帮我的。

父亲常常说，祖父为人正直，这是一种崇高的品德。对犹太

人来说，正直就是贤明，甚至是一种圣洁的体现。像这种严厉的蓝眼睛的老头，一代代越往上数，就越显得正直和严厉。曾祖父维尼阿明有一次说过："再也不做生意了，因为我不再需要钱。"他的钱刚巧用到死去的那一天。他身后没有留下一个铜板。

里加的海滨是一个国家。它以沙滩和木板小路而远近闻名。那里的沙色泽金黄，富有粘性，特别细腻(沙漏里装的一定是这一种沙！)，而小路都是用一二块布满窟窿的木条铺成的，一直穿过二十俄里长的萨哈拉别墅区。

里加海滨别墅区的规模和其他地方的疗养地是不能相比的。道路、花坛、屋前的花园、玻璃圆球无边无际地绵延整个城市，一切都建造在小麦粉似的金黄色的沙滩上，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

拉脱维亚人在农舍后面晾晒着比目鱼，这种鱼只生一只眼睛，骨骼粗大，身体扁平，像一个大手掌。孩子的哭声、弹奏着练习曲的钢琴声、数不清的牙科医生手中病人的呻吟声、小包饭作坊里餐具的叮当声、歌手们尽情舒展的歌声和小贩们的叫卖声，在布局庸俗的花园、面包房和围着铁丝网的曲径小道上整天不绝于耳。一眼望去，小火车在筑在沙丘上的马蹄形的铁路线上来回奔驰。火车上挤满了逃票者，从古板的德国城市比尔德尔林斯高夫到人口稠密的、散发出一阵阵小孩奶香味的犹太城市杜贝尔诺，都有人从车上跳下来。在稀疏的小松林里经常有江湖乐队在徘徊，一共只有两只乐器：单簧管和长号；他们吹的乐曲，又刺耳、又走调，到处被人驱赶；不是在这儿，就是在那儿，都会突然响起优美动听的卡罗利纳骑兵进行曲。

这片土地由一个戴单眼镜的姓菲尔克斯的男爵所拥有。他把自己的土地隔成两半，一半是与犹太人隔绝的净土，另一半则是不净土。在净土上坐着德国大学生社团里的青年人，围着小桌

喝着一杯杯啤酒。在犹太人居住的土地上到处挂着小孩的尿布，断断续续传来一声声钢琴练习曲。在德国人居住的马依奥林高尔，在花园里的露天音乐厅里演奏着乐曲——斯特劳斯的《死与净化》。年过半百、面色红润的德国人穿着新做的丧服，正在寻找自己的快乐。

在犹太人居住的杜贝尔诺，乐队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这里可以听见两个声部的弦乐怎样此呼彼应。

这时，我爱上了柴可夫斯基作品中那种近乎病态的异常激越的旋律，它使我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⑦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涅陀契卡·涅兹瓦诺娃躲在火红色的丝幕后面想听一听小提琴演奏会的情景。我从铁蒺藜后面倾听着柴可夫斯基音域宽广、旋律流畅的弦乐演奏。为了能不买票进入露天音乐厅，我常常被撕碎衣服，扎破了双手。我常常从别墅的蹩脚的留声机里传出的不协调的乐声中捕捉到强有力的弦乐曲的片断。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样倾心于交响乐的，但是我想，我一定理解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懂得他作品中蕴含的特殊的音乐情感。

在藏污纳垢的犹太人居住区里，俄罗斯的小提琴乐曲虽然带有意大利式的缠绵，但仍然演奏得多么坚定有力啊！是一条什么样的线把这些初期的淡雅的协奏曲同贵族会议大厅中火红色的丝绸帷幔和身体虚弱的斯克里亚宾⑧联结在一起的？斯克里亚宾眼看就要被团团围住他的、默默地站成半圆形的歌手和演奏《普鲁米修斯》管弦乐的如林的小提琴手踩在脚下；在乐队的上方，像盾牌一样地竖立着一台收音器——一个奇怪的玻璃仪器。

译注：

① 《圣经》中古犹太大力士。

② 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③ 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评论家、美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斯宾诺沙(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④ 法国作家、哲学家。

⑤ 德国诗人、戏剧家。

⑥ 爱沙尼亚东南部城市。

⑦ 俄国作家(1821—1881),作品有《罪与罚》、《白痴》、《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等。

⑧ 俄罗斯作曲家和钢琴家(1871—1915)。

霍夫曼和库贝利克[1]的音乐会

1903 年至 1904 年间，彼得堡曾经是一系列盛大音乐会的见证人。我说的是在贵族会议大厅里举行的霍夫曼和库贝利克的风格淡雅的音乐会，其近乎疯狂的热烈至今无与伦比。在我的记忆里，在它之后，没有一次音乐盛会，甚至包括斯克里亚宾的《普罗米修斯》管弦乐，也无法与在白圆柱大厅里的狂欢场面相比。那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已经超越了对音乐的爱好，而是从心底里升起的一种可怕的，甚至是危险的感情，仿佛是对某种行动的渴望，是在某一事件发生之前的深深的不安，这种不安正苦苦折磨着当时的彼得堡。当时，日历还没有翻过 1905 年，在米哈依洛夫广场上出现了近似鞭笞派教徒的别出心裁的狂热的娱神活动。在煤油灯的朦胧灯光下，贵族会议大厦的每一个门口都被团团围住。宪兵队雄纠纠地骑着马，给广场增添了国内形势动荡的气氛，他们"驾，驾"地赶着马，吆喝着，用铁链守卫着大厦的正门。装着弹簧的轻便马车点着暗淡的油灯，在原地打空转，聚拢在一起，仿佛是一支庞大的游牧民族的车队。马车夫们不敢把车停在大厦前面，尽管他们在路上收了主顾的

钱,但还是赶紧溜走,以免惹得警察生气。一个彼得堡人穿过三道铁链的封锁,像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钻进窟窿一样的大理石前厅,立刻消失在用丝绸和天鹅绒装饰起来的冰冷的大厅里。椅子和椅子后面的空间都同往常一样,秩序井然,可是,各个靠近边门的宽敞的厢座,仿佛一只只篮子,装满了一簇簇人。贵族会议大厅,宽敞、厚实,几乎是正方形的。舞台差不多占据了大厅的一半。厢座里热得像七月的天气。空气中一片嘈杂,好像草原上的蝉鸣。

霍夫曼和库贝利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当时彼得堡人的心目中,他们二人是融为一体的。他们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完全一模一样。他们长得比中等身材的人还要矮小,头发比乌鸦羽毛还黑。两人的下颏都很短,手也很小。我至今的印象仍是:他们二人就像侏儒马戏班里的头牌演员。虽然我不是拉小提琴的,有人仍把我带到欧罗巴旅馆去向库贝利克致意。他生活阔绰得像个真正的王子。他一听说我这个小男孩竟然会拉小提琴,不由得吃了一惊,不安地将小手一挥,可是立刻又镇定下来,应我的请求,送给我一张亲笔题词。

当这两个小个子的音乐之神,侏儒剧院的一对头号拍档将要走上被人群快要压坍的舞台上去的时候,我真替他们感到害怕。大厅里电光四溅,惊雷乍起。过了一会儿,维持秩序的人好不容易在人群中劈开一条小路,他们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狂热的人群的震天吼声中走过,既不笑着向大家行礼致意,而是面孔铁青、战战兢兢地挤到谱架和钢琴跟前。这一段路程,我至今仍觉得很危险。我一直在想,这一群人不知道这样的开头会把自己的崇拜者撕成碎块。接下去,这两个小个子天才完全控制了惊叹不已的音乐会听众,从宫廷女官到女大学生,从肥胖的富翁到头发蓬乱的补习教师。他们调动了自己的一切演奏技巧、一切音乐逻

辑和美妙的乐声，来驯服和抑制那种毫无节制的感情发泄。我从未聆听过如此清纯剔透、古朴流畅的乐声，钢琴声是那样清朗，仿佛淙淙泉水，它与小提琴的演奏融为不可分解的一体。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两位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的技艺超群的演奏。他们的风格如同阿尔卑斯山上的寒雪，那么晶莹，那么清新，而且又是那么明朗。然而，他们演奏中的明朗清新的风格却更加激起听众们一阵又一阵的狂热，他们有的紧靠在一根根大理石圆柱上，有的像葡萄一样一串串地攀在厢座边上，有的坐在一排排椅子上，有的不顾炎热，挤在舞台上。这两位音乐圣手充满理性的、炉火纯清的演奏所产生的力量竟然会如此巨大。

译注：

① 霍夫曼(1876—1957)，波兰钢琴家，1895—1913 年曾在俄国演出；库贝利克(1880—1940)，捷克小提琴家。

捷尼舍夫斯基中学

在城郊街上有一幢很大的出租楼房,严严实实的砖墙,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望见它的侧面,门前挂着擦得油亮的招牌;在楼房里面的院子里,有三十来个男孩穿着短裤、毛袜和英国式的衬衣正在狂叫着踢足球,他们的模样仿佛是被带到了英国或者瑞士,在那里被装束得焕然一新,完全不像俄国人,也不像中学生,而是一副剑桥的派头。

我还记得当时的盛况:一个穿着紫色长袍的慈祥老人和一群心情激奋的观众正在参观学生画展。突然,大家向四周散开,彼此交头接耳地嘀咕着:哦,维特来了。大家都说维特有一只金鼻子。孩子们都信以为真,朝他的鼻子看。可是,他的鼻子跟常人一样,不过看上去肉厚一点。

当时的传说,我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在青苔街上,有着按照议会样子排列的代表座位的半圆形剧场里举行着精心组织的仪式。9月份的最初几天,就像过节一样,纷纷庆贺模范学校开学。在这些会上,就像英国上议院开会一样,总有一个叫韦连尼乌斯的老头、保健医生,上台发表演说。他面色红润,就像奶粉罐头上的娃娃。他每年说的都是老一

套:游泳对健康有益。由于他说话的时候是秋天,离开下一个游泳季节还有整整十个月,所以他的现身说法也好,讲解示范也好,都是不适时宜的。然而,这位游泳的使徒总是在每年冬季来临之际传播他的宗教。另一位卫生学教授塔尔哈诺夫公爵,是个长着亚述利亚人胡子的东方贵族。他在上生理学课的时候,老是在课桌中间走来走去,让学生们能够透过厚厚的西装背心听见他心脏的跳动。不知是心脏的滴答声,还是金表的滴答声,但他穿着西装背心却是肯定无疑的。

放着折叠式课桌椅的半圆形阶梯剧场,被便捷的过道切割成一个个扇形,头顶上的灯光十分强烈,每逢重大日子总是座无虚席,整条青苔街都沸腾起来,被警察和知识分子淹没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 90 年代初。

捷尼舍夫斯基中学讲堂的主要租户是文学基金会,它是激进主义的支柱,也是纳德松著作的拥有者。文学基金会,按它的性质而言,是个追荐亡魂的机构。它经常举行追思会,它有一本记载详尽的年历,就像祭司一样,每逢忌日和生辰,都要开纪念会。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年历上写着涅克拉索夫、纳德松、普列谢也夫、迦尔洵、屠格涅夫、果戈里、普希金、阿普赫金、尼基京①等作家的名字。所有这些文学家的追荐仪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在会上选读哪篇作品,很少考虑到它是否出于死者的手笔。

通常,仪式一开始,伊赛·佩特罗维奇·魏恩贝尔格,活像一头披着厚毛围巾的老山羊,诵读着一成不变的悼文:“我的挚友,您像大海,无边无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接着,亚历山大剧院的演员萨莫伊洛夫上台了,他捶着胸脯,声嘶力竭地喊着,然后大声咳嗽不止,渐渐变成颤栗不安的低语,他朗诵起尼基京的诗《主人》。

再接下去是几个风姿绰约的女演员表演的小说人物对话,

有《死魂灵》的片断，有涅克拉索夫的《马扎伊老爹和兔子》，要不就是《大门前的沉思》。维德琳斯卡娅唧唧喳喳地说："我前来向你致敬。"结束的时候演奏了肖邦的送葬曲。

这是文学，现在变成了公民论坛的演出，首先成了由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②和佩特龙凯维奇领导的法律协会会议。会上，立宪制的毒液随着嘟嘟哝哝的话语流淌出来。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摆出威严的架势，宣扬牛津法案③的合法性。当周围不断有人被砍下脑袋的时候，他却在发表长篇大论，大谈特谈暗中检查邮件的法律，也就是说，可以私拆别人的信函。他根据英国法律认为，必须准许实行这种法律，限制和删除它的某些条款。马·科瓦列夫斯基、罗季切夫、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安年斯基、巴丘什科夫和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④都当过履行这个法律的文官。

我们整天就与这种民间活动场所为邻，关在高大的玻璃盒子里接受教育。那里有被热水汀烘得暖暖的窗台，有能容纳二十五人的宽敞教室，决不是在走廊里，而是在铺着镶木地板的室内运动场上竖着观测宇宙尘的斜筒，从物理实验室里还时常飘出一阵阵煤气味。直观教学法主要表现在进行残酷的、毫无必要的活体解剖，从玻璃罩里抽出空气，把可怜的老鼠活活闷死，折磨青蛙，进行水的沸腾的科学实验，描述实验过程，在瓦斯灯上熔炼玻璃小棒。

在实验室里，强烈的、令人恶心的煤气味把脑袋熏得疼痛难忍。对于大多数并不机灵、健康欠佳、神经过敏的孩子来说，手工劳动是一种受罪。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被塞满了讲解、演示的一堂堂课压得不堪重负，在刨花和锯末堆里休息片刻，因为我们不会把木板锯断。锯子弯了，刨子歪了，凿子敲疼了手指，还是一事无成。教导员把二三个心灵手巧的男孩带走了，其余的继

续罚做手工劳动。

德语课上，在一位德国小姐的指挥下，大家齐声高唱“啊，枞树”，我们似乎看到了放牧着奶牛、散落着瓦房的阿尔卑斯的高山景色。

学校里始终笼罩着军队的、享有特权的近乎贵族的气氛。特权家庭的孩子成了生性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头头，这些孩子都是被为所欲为的父母送到这里来的。有一个宫廷高级侍从的儿子姓伏耶伏茨基，是个美少年，脸部轮廓十分端正，侧面看去长得像尼古拉一世。他自命为统领，强迫别人吻十字架和福音书，向他宣誓效忠。

下面是我班里同学们的肖像素描：瓦纽沙·科尔萨科夫，绰号叫“肉饼”(优柔寡断的地方自治工作者，留着童化头，穿一件束丝腰带的俄罗斯衬衣，家庭中有地方自治的传统：佩特龙凯维奇·罗季切夫)；巴拉茨，他的家庭和斯塔秀列维奇(《欧洲导报》)的关系很好，是个勤奋的矿物学家，他守口如瓶，除了石英和云母，什么也不谈；列昂尼德·扎卢宾，在顿河大煤矿里工作，起初研究发电机和蓄电池，后来是瓦格涅尔从事这项工作；普尔热谢茨基，没落小贵族出身，是研究唾液的专家。我们班的第一名学生姓斯洛博津斯基，是被果戈理烧掉的《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范，热爱真理，是个中庸派的神秘论者，他还是个优秀的数学家，读过许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后来他主管一个无线电台；纳杰日京——平民知识分子，身上带着一股小官吏房间中散发出来的酸味，他乐观，无忧无虑，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克鲁宾斯基兄弟是一对双胞胎，比萨拉比亚的地主，研究葡萄酒和犹太人的行家；最后一个是鲍里斯·西纳尼，他属于至今仍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一代人，对于处理重大事件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已经显得十分成熟老练；他刚

刚毕业，就去世了。如果能活到革命年代，该多好啊！

然而，至今还有各种各样的老派女人和保持外省风尚的体面人，当他们想夸奖某某人的时候，总是说："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是我明白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如果用这句当年的时髦话来评价我们的奥斯特罗戈尔斯基[5]，是最恰当不过了。不合情理、过分肉麻的吹捧话，并不使人感到可笑。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燕尾服后襟仅仅在这一世纪初叶，在捷尼舍夫斯基中学的走廊上一闪而过。他近视，总是眯着眼睛，闪出嘲笑的目光，整个模样就像一只穿了燕尾服的大猴子，金黄色的耳朵，金黄色的大胡子和头发。我相信，他的确具有契诃夫[6]式的不可思议的笑容。他没有活到 20 世纪，可是他想活到 20 世纪。他喜欢勃洛克[7]（多么早啊！），在自己的《教育》杂志上刊登了勃洛克的作品。

他并不是什么行政负责人，总是眯起眼睛，面带笑容，露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很少有机会能跟他聊上几句。不论什么场合，他喜欢用开玩笑来回答别人的问题。"您现在上什么课？""地质学。""你自己就是地质学。"整个学校，连同它的人文主义的胡说八道，都被他的笑容支撑着。

无论怎么说，捷尼舍夫斯基中学有一批优秀学生，他们的模样都仿佛是谢罗夫[8]的肖像画里的人物。儿童修道院里的小苦行僧、小修道士，那儿的笔记簿里、仪器里、玻璃烧瓶里、德文书籍里，比起成年人的生活，有更多的精神世界和内在和谐。

译注：

① 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诗人，写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等；普列谢也夫（1825—1893）俄国涅克拉索夫派诗人；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作品有《猎人笔记》、《贵族之家》、《父与子》等；果

戈里(1809—1852),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普希金(1799—1837),俄国作家,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主要著作有《叶甫盖尼·奥涅金》、《青铜骑士》等;阿普赫金(1840—1893),俄国诗人,写有诗歌《疯狂之夜》等;尼基京(1824—1861),俄国诗人,作品有《罗斯》、《晨》等。

② 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进化论学派社会学家。

③ 1258年英国国会在牛津制定的改组政府、限制王权的方案。

④ 罗季切夫(1853—1932),地方自治活动家、法学家、立宪民主党首领之一;尼·费·安年斯基(1843—1912),俄国经济学家、民粹派政论家;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1853—1920),俄国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

⑤ 俄国教育家、作家。

⑥ 俄国作家(1860—1904),写有许多短篇小说和剧本,其中最著名的有《套中人》、《樱桃园》等。

⑦ 俄国诗人(1880—1921),作品有《祖国》、《十二个》、《报应》、《恐怖世界》等。

⑧ 俄国画家(1865-1911)。

谢尔盖·伊凡内奇

1905年,处处可见俄国革命的幻影、宪兵们惊惶四顾的眼睛和戴着像煎饼一样的浅色制帽的大学生们。彼得堡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你的马蹄的得得声。为了躲避你的汹汹来势,都蜷缩在军事医学院的充斥酒精味的教室里和缅希科夫大学的长长的棒球场上。这时,一个未来的亚美尼亚演说家,像一头狂暴的雄狮,正对着软弱无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怒吼,而有些人不得不伸长脖子倾听他演说。记忆总爱在黑暗中捕捉往事。你诞生在茫茫黑夜里,只是一刹那,然后,一、二、三,涅瓦大街眨了眨长长的电光的睫毛,又淹没在漆黑的夜里,而在沉沉黑夜的尽头出现了宪兵们惊惶四顾的眼睛和大学生们戴着的扁平制帽的幻影。

对于我来说,是从谢尔盖·伊凡内奇身上了解1905年的。导演这场革命的人真是太多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十分傲慢的人,言之凿凿地说:"确实有书人、报人。"可怜的谢尔盖·伊凡内奇就莫名其妙地被划了进去,然而他应该是第三类人——"死译"人。逐字逐行译出的革命译文从他的

手里纷纷撒落下来，在他的冻得发麻的脑袋里簌簌地卷着烟纸，他从自己海蓝色的骑兵短制服的翻袖里抖落掉薄薄的禁书，吸着雪茄，偷偷地吐着一缕缕烟，仿佛他的烟纸筒是用禁书的书页卷成的。

我不知道谢尔盖·伊凡内奇是从哪里和怎样学会这种本领的。我年轻时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可是有一次，他把我带到自己家里，我看见了他的办公室、卧室和实验室。这时，我和他两人进行了一件重大的，然而又是徒劳无益的工作。我们一起写了一篇关于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的学术论文。谢尔盖·伊凡内奇一星期内连珠炮似地让我笔录了密密麻麻整整一百三十五页练习本纸。他从来不加思索，也不查阅有关资料，像蜘蛛吐丝一样，从雪茄的烟雾中纺出由科学用语连成的粘糊糊的细丝，把各个社会经济时期的网向四周撒开，然后又将它们的重要时刻打成一个个结。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是我们家的常客。难道罗马人雇佣希腊人做奴隶是为了在晚宴上炫耀一下自己的学术论文吗？在撰写上述学术论文最紧张的时候，谢尔盖·伊凡内奇把我叫了去。他住在位于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后面的涅瓦大街 100 号。这里，一幢幢房子，没有丝毫豪华的装扮，而是像一只只猫似的，全身都是灰的。谢尔盖·伊凡内奇住房里发出的浓浓的刺鼻的气味，不由得使我哆嗦了一下。成年累月被雪茄烟熏得呛人的房间里容纳的已经不是空气，而是一种新的、不知名的物质，它具有另一种比重和其他的化学性质。我不禁想起物理学上提到的那不勒斯狗洞。自从他住到这里以后，屋里的主人，显然像一名真正的苦行僧一样，从来没有搬动过屋里的一瓶一罐，他只要认为什么东西没有用处，就往地上一扔，从此再也不把它拣起来。在家里，谢尔盖·伊凡内奇只保持一种躺着的姿势。他口述的时候，我就斜视着他那煤黑色的床单。当谢尔盖·伊凡内奇宣布让

我稍作休息的时候，他亲自煮两杯淳香扑鼻的可可茶。这使我非常惊奇。原来他嗜饮可可。他煮得很好，比一般的可可要浓得多。从这件事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谢尔盖·伊凡内奇是否是一个奢侈逸乐的人呢，或者是一个被可可魔鬼缠身的，迷恋着苦行僧和虚无主义的人？啊，谢尔盖·伊凡内奇黯然失色的权威啊；啊，他那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他那骑兵的制服和宪兵呢的裤子啊！他的步态就像一个人被突然抓住，被揪到暴吏面前的样子，而这个人却装得若无其事。和他一起在街上散步是一种乐趣，因为他会把一个个密探指给你看，而他自己一点也不害怕。

我以为，他自己却像个密探，抑或他经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譬如说，生物拟态是否符合规律，哪一些鸟和蝴蝶从山崖里飞出以后会改变自己的颜色和羽毛。的确，在谢尔盖·伊凡内奇的身上还残留着一点宪兵的痕迹。他爱挑剔，好唠叨，用沙喉咙滔滔不绝地讲述将军们的趣闻逸事，既饶有兴味，又带着反感的情绪说着五等以上文武官员们的坏话。谢尔盖·伊凡内奇的脸看起来总像没有睡醒，无精打彩，就像大学生头上戴的煎饼帽子。一脸的表情完全是宪兵式的喋喋不休。往将军和四等文官脸上抹黑是他的最大的乐趣，而我认为，乐趣是一种像数学一样的比较抽象的事物。

的确，从他口中说出的趣闻几乎成了数学定理。一位将军光凭一份菜单就报废了全桌菜肴，并下结论说："呸，真卑鄙！"一个大学生偷听到了将军的话，就问他，大大小小的官吏怎么样，得到回答以后，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仅仅如此吗？真卑鄙！"

无论在谢德尔采，还是在罗夫诺，谢尔盖·伊凡内奇都是一个温柔可亲的男孩，脱离了行政警察的悬崖。西部边区的一些小省的省长都是他的亲戚，他本人当时已经是个革命导演。喝可可着了魔的他向某一个省长的女儿求了婚，显然，这位千金小姐也

是义无反顾地脱离了自己的家庭。当然,谢尔盖·伊凡内奇并不是革命者,后来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革命导演。在历史舞台的灯光照射下,他仿佛是一个幻影。随着1905年的来临,他显得更加神秘莫测,暗淡无光的权威也与日俱增。他本当站出来解决某些问题,即使是显示一下工人战斗队发给他的手枪,或者拿出一样别的物证来也好,以此证明自己是献身革命的。

可是,在最动荡的1905年,谢尔盖·伊凡内奇成了向来高枕无忧,而现在却是惊惶失措的小市民的保护人。他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眯缝着眼睛,为他们捎去确凿可靠的消息,说什么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在某一天里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屠杀。他,作为工人战斗队的一名队员,竟然保证,到时候一定会带着勃朗宁手枪去保护他们安全无恙。

1905年过去好多年以后,我有幸再一次见到他。他已经判若两人。他面容苍白,毫无血色。往日的爱挑剔的脾气和威风已经剩下一层暗淡的影子。原来,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天文台的普尔科夫斯基瞭望台上当助手。

如果谢尔盖·伊凡内奇能变成星体运行速度对数,或者变成空间函数,我是不会吃惊的:他应该离开人世,因为他早已是一个幻影了。

尤里·马特维奇

趁着尤里·马特维奇上五楼的当口，我们可以从门口到里面来回跑好几次。他被人搀扶着，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外厅，他站定下来等别人替他脱去大衣。他个子很小，腿也很短，穿一件老年人的毛皮大衣，一直拖到脚跟，头上戴了一顶厚皮帽子。他一个劲儿地喘着粗气，一直等到别人帮他脱下海狸皮大衣，才缓过气来。这时，他坐到沙发上，像小孩一样，伸伸两条短腿。他出现在家里，不是意味着举行家庭会议，就是意味着要平息某一场内部纠纷。说到底，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国家。他喜欢家庭纠纷，他作为一个治国之材，喜欢政治上的麻烦。他没有自己的家庭，但为自己的生活选择了一副异常困难和异常复杂的担子。

每当他那有部长气概的脑袋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这群孩子都会乐不可支，因为他的脑袋太像俾斯麦①了，光溜溜，没有一根头发，就像初生的婴儿，头顶上也最多不会超过三根。

尤里·马特维奇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总会发出古怪的、游移不定的胸腔共鸣，就像一名拙劣的乐手在吹小号；在发

出一阵前奏之后，才用一成不变的套话开始说："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或者"我总是对你们说"。

尤里·马特维奇膝下无子，举目无亲，却要充当别人家庭里的俾斯麦。我对他的这种处境深表同情。

他是在比萨拉比亚、敖德萨和罗斯托夫一带的南方商业地主堆里成长起来的。

在基什尼奥夫和罗斯托夫的下等旅馆里，在希腊公证人的参与下，签订了多少承包合同，卖掉了多少葡萄庄园和养马场啊！

所有这些人，包括希腊公证人、奸猾的地主、摩尔达维亚人充当的省府文书，穿着肥大的白外衣，坐着四轮轻便马车或者带天盖形幔帐的敞篷马车，冒着霍乱流行的酷暑，在驿路上，在省城的街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在那里，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积累了资本，当然也养成了贪图享受的习惯。不勤的四肢逐渐退化成短短的鳍脚。在基什尼奥夫和罗斯托夫的旅馆里，尤里·马特维奇常常和头面人物和承包商一起共进午餐，用上面说到的那种游移不定的像从小号里吹出来的声音频频招呼茶房一旁侍候。他渐渐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将军。他像铁铸似的，可以用他来建造纪念碑；然而，何时何地这块生铁能浇铸出三根俾斯麦的头发呢？尤里·马特维奇的世界观很明智，很坚定。他最喜欢读缅希科夫和勒南[2]的书。这种结合，初看起来很奇怪，然而仔细一想，甚至连国务会议的议员也想不出更好的读物。他对缅希科夫的评价是："他是个聪明人。"说着，像参政员一样地举起一只小手；其次，他完全赞同勒南关于基督教的观点。尤里·马特维奇藐视死亡，痛恨医生，并且用教训人的口气说自己怎样逃过霍乱而太平无事的。年轻时，他到过巴黎，三十年以后，当他重返巴黎时，说什么也不肯踏进任何一家餐厅，而是千

方百计寻找一家叫“科克道尔”的饭店，因为以前他光顾过，吃得非常满意。可是，这家饭店现在已经没有了，后来勉强找到一家叫“科克”的饭店，不过并不是原来的那一家。尤里·马特维奇摆出一副美食家的派头，按照菜单开始点菜，侍者在一旁屏息静气等他复杂而又细心地点菜；后来，尤里·马特维奇决定叫一碗浓汤。要想让尤里·马特维奇掏出十到十五卢布可真不容易。他化了一个多小时宣传贪欢取乐的窍门，开头又是一句老话：“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接着，他在房间里一边不停地走来走去，一边寻找钥匙，喘着粗气，一头扎进藏得严严实实的一只只小箱子里。

尤里·马特维奇死得很惨，就像巴尔扎克[3]笔下的老头儿，被一个奸猾的大商场老板的家庭赶了出来。步入晚年以后，他开始当起了家庭俾斯麦，并且把别人的财物都占为己有。

风烛残年的尤里·马特维奇被别人从老板的办公室赶了出来，在森林街的一幢小别墅里租了一个小房间。

他边幅不修，形容枯槁，整天坐着，与痰盂和《新时代》杂志为伴。滞板发青的面颊长满了肮脏的短髭，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拿着一面放大镜，帮他看清报上的一行行字。从他的一对生着白内障的深色瞳孔里透出极端的恐惧。一名女仆把一只小碟子放到他面前，也不问一声他还需要什么，就立即走开了。

许许多多德高望重的以及素不相识的亲戚都前来参加尤里·马特维奇的葬礼，一个在亚速-顿河银行任职的侄子一边迈着两条短腿，一边摇晃着俾斯麦一样的大脑袋。

译注：

① 公爵，德意志帝国宰相(1815—1898)。

② 缅希科夫(1673—1729)，彼得一世近臣，特级公爵，大元帅，叶卡

捷琳娜一世时期实际是国家执政者，后被彼得二世流放；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③ 法国作家（1799—1850），著有《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小说。

《爱尔福特纲领》①

“为什么你要读这本小册子？它对你有什么用处？”在我的耳畔响起聪明绝顶的瓦·吉皮乌斯的声音。“你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吗？就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吧。”于是，我拿来读了，读不下去，又丢下了，重新拾起了小册子。唉，我的那位捷尼舍夫斯基中学的好老师不会对我说假话吧？马克思的《资本论》，好比克拉耶维奇的物理学。难道克拉耶维奇有这样大的力量？小册子有一层假面具，它的用途就在于从假面具里产生一种思想。

有多少大杂烩，有多少对真实历史的议论充斥在我们的学校里。(在那里，地理课上冒着化学试管的青烟，顷刻间又变成了关于美国托拉斯的趣闻。)又有多少历史在捷尼舍夫斯基中学的用鸡爪子架起的暖房和原始的足球场旁边一闪而过！

不，俄国孩子和英国孩子不一样。无论是运动，还是热气腾腾的课外艺术活动，都不能吸引住他们。不过，充满着突如其来的兴趣和热烈的益智游戏的生活一定会闯入像温室一般的、像用沸水消过毒的学校，就像当年这种生活闯入

普希金读书的皇村中学一样。

课桌下面放着《天平》月刊[②]，旁边堆着从奥布霍夫工厂拿来的刨屑，大家像事先商量好一样，一声不响地阅读着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③]的文章。不过，巴尔蒙特[④]的作品最受大家欢迎，有很多他的追随者。社会民主党人恨不得掐死民粹主义者和渴饮社会革命党人的鲜血，即使后者把切尔诺夫、米哈伊洛夫斯基[⑤]，甚至发表了《历史信札》的拉夫罗夫[⑥]这些神灵都请来帮忙，也是徒然。大家把文章中宣扬的处世哲学都贪婪地吸收了。我想再说一遍：我的同志们不喜欢别林斯基模棱两可的处世哲学，而非常敬重考茨基[⑦]和东正教大司祭阿瓦库姆[⑧]；帕夫连科夫出版的书籍中介绍的他的一套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了俄国文学作品。

当然，这里多亏了瓦·吉皮乌斯，这位优秀人物的灵魂工程师和导师（不过，我们眼前找不到这样的优秀人物）。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现在是考茨基独领风骚，他是马克思主义曙光中的一条红线！

《爱尔福特纲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使你过早地养成了追求严谨逻辑的习惯，然而给我和其他许多人却是带来了过去年代的生活感觉；在那个年代里，生活渴望完美与和谐，时代挺直了脊梁，心脏更需要主动脉的鲜血！难道考茨基，抑或丘特切夫能做得到？难道他能召唤大如苍穹的感觉（"一根细细的蛛丝在空荡荡的犁沟里颤动"）？你不妨想想，从年龄和历史的瞬间的角度来看，考茨基（我当然是以他为例，其实，马克思、普列汉诺夫[⑨]更为恰当），还有那个丘特切夫，是产生无比喜悦的源头，强烈而严谨的处世哲学的传播者，是有思维能力的芦苇和放在深渊口上的一层覆盖物。

那年，在塞格沃尔德，在库尔兰河的上空，秋高气爽，大麦地

里到处挂着蛛网。男爵们的尸体刚刚被焚毁，一间间瓦房被夷为平地，处处笼罩着屠杀后的可怕寂静。偶尔，从德国人开辟的坚硬的大路上出现一辆上面坐着当地主管和警官的两轮车，一个举止粗鲁的拉脱维亚人赶紧脱帽致意。在被挖成一个个窟窿的、用红砖砌起的一层层堤岸中间，一条充满诗意的小河像德国传说中的美丽的水妖，轻轻流淌着，潺潺的水声从耳畔飘过，一直隐没在绿色的麦田里。当地的居民还隐约记得不久前被河水淹死的科涅夫斯基。他少年老成，俄国青年中很少有人读他的作品，因为他往往在自己晦涩难懂的诗歌里大声喧哗，仿佛林涛呼啸一般。现在，当我手握《爱尔福特纲领》，置身在塞格沃尔德的时候，即使我按照茹科夫斯基⑩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风格创作诗歌，我的心也更加贴近科涅夫斯基了，因为我能够使这个长着大麦、有着乡间土道和华丽宅邸、洒满阳光的、感觉得到的世界变得人丁兴旺，变得社会主义化。

我挥动纲领，向深不可测的苍穹架起远不如《圣经》中所说的天梯，顺着这条梯子上上下下的并不是天使雅各，而是跨越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大大小小的私有者。

什么东西会更强烈，什么东西会更具有它的本性?我感到整个世界变成了产业，人类的产业，沉默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家庭工业的纺锤声，仍在高爽的秋天里回响着！是的，我仿佛一架放在远处田野上的脱谷机，惊觉地听见，日益变得颗粒饱满的，不是沉甸甸的麦穗，也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它一天天膨胀，就是为了坠落！

译注：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市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是继哥达召开的统一代表大

会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恩格斯对写入《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内容起了决定性影响。

② 文学评论刊物，象征派机关刊物。

③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文艺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④ 俄国象征派诗人(1867—1942)作品有《着火的房屋》、《我们将像太阳一样》等。

⑤ 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杂志的编辑之一。

⑥ 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⑦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854—1938)。

⑧ 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作家(1620—1682)。

⑨ 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⑩ 俄国诗人(1783—1852)。

西纳尼一家

当我跨进教室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等待着我的是一个不容易应付的对手。当我结束充满自信的演说以后，一个男孩走到我跟前，他腰里束着一条细皮带，红褐色的头发，瘦瘦的身材，窄窄的肩膀，英武而又柔和的小脸蛋，细长的手指和小小的脚掌，嘴唇上边有一块苔癣，好像火红色的胎记，身上的西装完全不像是英国式的，裤子和衬衣似乎都是很旧很旧的，用肥皂在小河里使劲地搓过，再放到太阳底下晒干，然后不经熨烫，就拿来穿在身上，谁见了他这副模样，都会说：他真是弱不禁风！可是，如果你看看他那高高的、端庄的前额，你就会为他生着一对眼梢向上吊的、含着冷笑的眼睛而感到吃惊，而且还会注意到他小嘴巴上流露出的既痛苦又充满自尊的表情。他的脚步，只要他感到需要，就会迈得又大又快，就像费多尔·托尔斯泰①塑雕中的那个玩打拐子游戏的男孩。但是，为了保持玩游戏时动作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他经常做剧烈运动。他的脚步出奇的轻快，就像光着脚板走路。如果在他的脚边放一只牧羊犬，再让他手里握一根长竿，倒是很相称的，因为

在他的两颊和下颏都长着金黄色茸毛。究竟像玩投钉戏[②]的俄国男孩，还是像意大利神话中的长着小鹰钩鼻子的施洗约翰[③]，我也说不准。

他被派来做我的导师，从此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去世。我和他形影相随，十分赞叹他清晰的头脑，充沛的精力。他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到来的前夕去世的，他已经为这个日子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他的天性就是为此作准备的，就像当时牧羊犬准备躺在他的脚下，基督先行者手中的长竿换成牧羊人的手杖一样。他的名字叫鲍里斯·西纳尼。我是怀着亲切和尊敬的感情呼唤他的名字的。他是彼得堡的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鲍里斯·纳乌莫维奇的儿子。母亲是俄罗斯人，而西纳尼是卡拉伊姆-克里米亚人。他的面部特征的两重性是否源出于此？他既是出生在诺夫哥罗德的俄罗斯男孩，然而又长着一个非俄罗斯人的鹰钩鼻子和克里米亚牧羊人那种金黄色的汗毛。鲍里斯·西纳尼从懂事的那天起，由于受到团结和睦家庭的传统影响，就认准自己是民粹派的一个优秀分子。我以为，与其说吸引他的是民粹派的理论，倒不如说是它的精神力量。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为了事业随时都可以抛弃一切是非曲直的现实主义者。然而，他现在心目中的稚嫩的现实主义思想暂时还没有包孕平淡乏味和令人痛苦的内容，因而具有魅力，并且充满着崇高的道德精神。鲍里斯巧妙地为我的眼睛摘除了白内障，照他的说法，这层白内障使我看不见存在的土地问题。西纳尼一家住在帕勒-罗雅里旅馆对面的普希金街上。这是一个从富有理智的性格向朴素的情感世界转化的强有力的家庭。鲍里斯·纳乌莫维奇·西纳尼在普希金街上显然已经住了很久。一个白发苍苍的看门人对西纳尼全家，从脾气暴躁的精神病医生老西纳尼，一直到驼背的小女孩莲诺奇卡，都怀有无比的敬意。没有一个人不是

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踏进西纳尼家的门槛的，因为鲍里斯·纳乌莫维奇随时会把他不喜欢的人赶出去，不管是病人，还是客人，只要他嘴里不干净。鲍里斯·纳乌莫维奇·西纳尼是格列勃·乌斯宾斯基④的私人医生和遗嘱执行人，也是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朋友；其次，虽然他个人并不光彩夺目，但却是当时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顾问和挚友。

从外表上看，他是个矮壮的卡拉伊姆人，甚至还保存着一顶卡拉伊姆小皮帽子，他的脸长得粗犷而严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受住他那透过眼镜向你注视的凶狠而又机灵的目光的，可是当他从稀疏而卷曲的胡子后面露出笑容的时候，他的笑容却像孩子般的天真和动人。鲍里斯·纳乌莫维奇的书房是严禁别人入内的。书房里挂着他个人的和全家人的徽标，还挂着谢德林的肖像，他倒竖浓眉，盛气凌人地注视着孩子们，并且用他可怕的乱蓬蓬的胡子吓唬他们。这个谢德林看上去像头凶神，也像个省长，尤其在黑暗中，他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可怕。鲍里斯·纳乌莫维奇是个鳏夫，并且执拗地没有再娶。他和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是个斜白眼，长得像日本姑娘，小巧玲珑，她叫热尼娅。小女儿莲娜，是个驼背。来找他的病人并不很多；他总是将病人，尤其是将女病人弄得心惊肉跳。尽管他的态度十分粗暴，可是病人们还是送给他绣花便鞋、绣花拖鞋。他就像一个守卫室里的护林人，生活在四周蒙着皮革和挂着大胡子谢德林肖像的书房里，被四周的敌人团团围住：神秘主义、愚昧、歇斯底里和野蛮。和狼一起生活，就会像狼一样嗥叫。

在当时的知名人士的圈子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威望显然是很高的。鲍里斯·纳乌莫维奇未必能容忍这种情况。作为一个狂热的纯理性主义者，出于致命的内心矛盾，他需要提高本人的威望，不由自主地渴求这种威望，并为此而感到痛苦。每当政

治生活或社会生活发生突然转折的时候，他们一家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米哈伊洛夫斯基对此有何见解。过不了多久，《俄国财富》杂志编辑部的同仁们就会聚到米哈伊洛夫斯基身边，米哈伊洛夫斯基也就滔滔不绝地谈他的看法。西纳尼老头总是高度评价他的言论。他就是如此尊敬当时的民粹派活动家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就像一尊降示的神，完美无缺，然而他写的政论却是空话连篇，他的为人也是不值得别人尊敬的。归根结蒂，西纳尼并不喜欢米哈伊洛夫斯基。他认为切尔诺夫为人机灵，在土地问题上具有农民的思维方式，而佩舍霍诺夫⑤不过是窝囊废。他对米雅柯金⑥就像对韦尼阿明⑦一样，怀着亲切的感情。其实，他对上面几个人都不是十分看重的，他真正尊敬的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纳坦松⑧老头。头发雪白、脑门光秃的纳坦松像个资深的老医生，亲自上门，当着我们这些孩子的面跟鲍里斯·纳乌莫维奇侃侃而谈。我们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和骄傲：家里来了中央委员。

尽管没有家庭主妇，日常家务却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像富裕人家一样。驼背女儿莲娜偶尔做点家务。然而，有一种无形的协调的力量使这个家庭很自然地维持下去。

我了解鲍里斯·纳乌莫维奇在自己的书房里做些什么。他整天阅读那些充斥着神秘主义、歇斯底里和各种病理学内容的胡说八道的坏书。他跟这些坏书进行斗争，进行清算，但是未能从里面挣脱出来，反而又重新回到这些书堆里。如果把西纳尼老头放在纯实证主义的食粮上，他就会立刻沉下去。实证主义对于靠利息吃饭的人是很有益的。它每年能带去百分之五的利息。鲍里斯·纳乌莫维奇需要为颂扬实证主义作出牺牲。他曾经是实证主义的亚伯拉罕⑨，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次，大家坐着喝茶，有一个人提到人死后的状态，鲍里

斯·纳乌莫维奇惊奇地扬扬眉毛问："你说什么？我难道记得自己出生之前的事吗？根本不记得，根本不存在。同样，人死以后，什么也不存在了。"

他的巴扎洛夫[10]式的观点是向古希腊朴素思想的回归。连独眼龙厨娘也被大家的情绪感染了。

我把西纳尼一家的主要特点归结为符合美学观点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实证主义是和审美观点、自尊心、思考的乐趣格格不入的。对于他来说，思考是乐趣，是健康的表现，是运动，甚至是一种顶礼膜拜的信仰。同时，他的思考范围又很小，视野很狭窄；实质上，贪婪的思考吞掉了贫乏的食物：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米哈伊洛夫斯基显赫的个人名声，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整治政策——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思考范围。当鲍里斯在家里对这些问题感到厌倦以后，就一头埋进拉萨尔[11]的法庭辩护词中去了。拉萨尔的辩护词写得严谨、感人、生动——这完全是思维的美学和真正的运动。于是，为了效仿拉萨尔，我们就醉心于辩才的训练和演说家的即兴发言。尤其是在训练过程中大家常以社会民主党人当假想的靶子，就土地问题慷慨激昂地抨击他们。有几个人的得不到反应的演说确实很精彩。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鲍里斯怎样在一次聚会上把老谋深算的孟什维克、一家大杂志的撰稿人克莱因鲍尔特驳得哑口无言，浑身冒汗。克莱因鲍尔特只是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困惑不解地环顾四周，他对这个热衷于辩论的人的巧妙应答感到突然，并且尝到了新式辩论武器的厉害。当然，这一切仅仅是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子。但愿青年人不要碰上像米哈伊洛夫斯基这样的导师！他是个专说空话的演说家！是地地道道的马尼洛夫习气[12]！凭借陈词滥调和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吹嘘出来的无聊空话，像野草一样到处蔓延，占领了自由美好的

遐想的位置。

根据家里定下的规矩，心情沉重的西纳尼老人不敢向被叫做玫瑰屋的年轻人的房间看上一眼。玫瑰屋和《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休息室十分相似。去过玫瑰屋的客人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叫娜塔莎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很可爱。鲍里斯·纳乌莫维奇不喜欢她，说她是只会做家务的蠢货。娜塔莎先后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先是信东正教，后来又信了天主教；她既是古希腊语文学家，又是神智学者，没有一样是坚持到底的。由于在信念上朝三暮四，她的头发过早地变白了。当她还是个古希腊语文学家的时候，她在罗马疗养地拜伊写了一部以恺撒大帝[13]生活为内容的小说。顺便说一下，拜伊的景色很像谢斯特罗列茨克[14]（娜塔莎十分富裕）。

像别的休息室一样，玫瑰屋也是一片乱哄哄的。是什么东西使起源于上世纪初叶的休息室变得乱哄哄的呢？印着施图克[15]和茹可夫斯基寓言的讨厌的明信片，仿佛从纳德松诗歌中跳出来的《童话明信片》——一个未扎头巾，反剪着双手的小姑娘，被碳笔放大了画在一张硬纸板上。可怕的“朗诵演员”和米哈伊洛夫、塔拉索夫并列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俄国缪斯”，我们从中仔细寻找诗集，但有时仍感到十分羞愧。大家读得最多的是马克·吐温和杰罗姆[16]的作品（它们是我们最优秀、最健康的读物）。还有诸如《阿纳焦姆》、《野蔷薇》、《知识丛书》的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每个夜晚都沉浸在对卢加庄园的朦胧的回忆之中。那里，客人们睡在客厅中的半圆形的小软椅上，同时使唤着六个可怜的女佣人。最后，还有一本本日记和自传体小说。这一切加在一起还不够乱哄哄吗？

谢苗·阿基梅奇·安斯基是西纳尼家的一个亲戚，他因处理犹太人的事务常去莫吉廖夫，有时也途经彼得堡，找不到住

处，就在西纳尼书房里的谢德林画像下过夜。谢苗·阿基梅奇·安斯基集犹太民俗学家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契诃夫于一身。他一个人能担当一个个小镇拉比[17]的工作，按照排定的日期轮流举行各种祝祷、慰灵等仪式，看上去就像讲寓言故事一样。在生活中，谢苗·阿基梅奇只需要有一个过夜的地方和一杯浓茶。听众们都前来巴结他。谢苗·阿基梅奇讲述的俄罗斯和犹太民族的民间故事娓娓动听，它像一道浓郁香醇的泉水轻轻流淌。谢苗·阿基梅奇年纪并不大，但由于太多地参与了犹太人活动和民粹运动，显得老态龙钟、伛腰屈背。省长们的纠缠、大屠杀、各种人祸、聚会，在明斯克、莫吉廖夫等地区的难以置信的条件下进行的巧妙设计、变化多端的社会活动，仿佛是能工巧匠精雕细琢出来的一件工艺品。阿基梅奇保存着一切，也永远记得一切——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曾是犹太教圣法经传学校的学生。他坐在小茶几后面，侧着头，做出《圣经》中描绘的动作，就像最后晚餐上的犹太使徒彼得。当家里的人一头扎进他们的偶像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著作里，敲打着土地问题这颗破核桃的时候，谢苗·阿基梅奇已经是一个软弱无力、面色土黄的普叙赫[18]了。

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同时存在着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最激进的纳德松式的心理分析和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的诗作。包括《滑稽草台戏》在内的勃洛克的诗，都已经读过了。勃洛克十分出色地把平民主题揉和到深奥难懂的诗体中。许多大型杂志经常发表一些不堪入耳的诗作，但是对于生性怪癖的失败者，对于年纪轻轻的自杀者，对于那些同《俄罗斯财富》、《欧洲导报》的平庸的抒情诗人相比没有多大差别的秘密诗人，倒是一条非常有意思的通道。

在普希金街上的一套很不错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姓戈尔德贝格的前德国银行家、《诗人》杂志的编辑兼出版人。

戈尔德贝格是个体态虚胖的资本家，认为自己是德国诗人，于是，跟他的撰稿人达成如下协议：他无偿地在《诗人》杂志上刊登他们的诗，而他们必须听从他。戈尔德贝格在《昆虫议会》的标题下创作德国哲学长诗，而且要用德文写，如果产生语言障碍，就译成俄文。

戈尔德贝格对全体撰稿人说："年轻人，你们会越写越好的。"他尤其看中一个他认为是自杀者的郁郁寡欢的诗人。这个被雇佣的青年的外表像个天生诗人，一直帮助戈尔德贝格编辑杂志。这个失败的银行家和长得像席勒一样的助手无私地为这本可爱的、然而又十分丑陋的杂志操劳着。古怪的银行缪斯用一只粗壮的手指来回抚摸着戈尔德贝格。在他那里供职的席勒看来在哄骗他。不过，在德国的和平时期，戈尔德贝格出版了他的全集，他亲自拿给我看过。

鲍里斯·西纳尼对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实质理解得十分深刻。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已经是青出于蓝了。广泛流传的一个绰号就能证明这一点。我们把有着与众不同尊容的社会革命党人叫做"善人"。你得承认，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挖苦话。"善人"是指面容姣好的俄罗斯女人，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思想的代表者，事实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像画家涅斯捷罗夫笔下的耶稣。女人们都喜欢他们，他们自己也很容易心血来潮。在森林大街上举行的游艺舞会上，总有这样的"善人"鼓着腮帮子吹起了恰尔德·哈洛尔德、奥涅金、皮巧林[19]。总的说来，在我的青年时代，革命的浮沫、无可非议的"圆周"，都被众多的小说填满了。1905年时的男孩都怀着尼科林卡·罗斯托夫当时去当骠骑兵的心情参加了革命，也许出于对革命的迷恋和崇敬。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觉得不可能庸庸碌碌地生活着，不可能没有忘我精神。《战争与和平》在继续着，只是荣耀已经改换了门庭。荣

耀已不伴随谢苗诺夫斯基团的上校，也不伴随穿着锃亮皮靴的侍卫将军！荣耀已经步入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功勋从艰苦的宣传开始。

在深秋的芬兰，在莱伏尔有一幢僻静的别墅，所有的东西都被封住了，围墙门也钉死了，几条猎犬在空荡荡的别墅旁边吠叫。只见挂着几件秋天的大衣和几条旧毛毯。在寒冷的阳台上，煤油灯冒出一缕缕热气。长着小脸蛋的莉西娅靠着当中央委员的父亲、年轻的 T 先生的名声住在这里。其实，她并不是这里的女主人，而是生着肺痨的懦弱病人，她甚至不能对客人的脸看上一眼。客人们穿着英式大衣，戴着圆顶礼帽，一个个进入黑暗的别墅。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上楼，走进厨房，突然发现一个剪短发的大脑袋，他是格尔舒尼[20]。

《战争与和平》在继续。被淋湿的荣耀的翅膀拍打着窗户：自尊心和对名誉的渴望！被雨浇瞎的芬兰的夜晚的太阳，新奥斯特尔利茨[21]的地下的太阳！鲍里斯在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芬兰，梦见自己就要去莱伏尔，正用一根绳子在捆扎行李。在这里我们玩过击木游戏，他躺在芬兰的割草场上，喜欢用安德烈公爵那种惊讶的目光望着洁净的天空。

我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时代的一切动荡都降临在我的身上。四周人心浮动——从寻求自杀到渴望世界末日的来临。以不着边际的世界问题和暴露社会问题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刚刚跨开沮丧的、散发着臭气的脚步招摇过市，商人们又用他们肮脏的、长着粗毛的手拼死拼活地把生和死的名字变得令人厌恶。那实实在在是愚昧无知的夜晚啊！身穿竖领衬衫和黑色短上衣的文学家们，像杂货铺的老板，在沿街叫卖上帝和魔鬼，他们无家可归，到处用一只手笨拙地弹奏着从《人的生活》杂志中抄来的波尔卡舞曲，这种舞曲已经变成可恶的、庸俗的象征主义的象征。知识

分子是靠听校园歌曲长大的。现在，他们被许多世界性的问题弄得大倒胃口：那恰恰是一个从啤酒瓶里倒出来的哲学！

同《爱尔福特纲领》、《共产党宣言》和土地问题争论中的世界相比较，这一切都是污垢。这里有阿瓦库姆大司祭，他的两面派手法（比如，他的关于无马农户的言论），这里还有异常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使人感到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历史悠久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

这种生活、这个斗争受到住在远方的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22]这两个共命运的朋友和具有激进的西欧派观点的赫尔岑[23]的赞同。赫尔岑的强烈的政治观点会像贝多芬的奏鸣曲一样，永远在空中回荡。

他们没有到处兜售生活的真谛，可是精神上是相通的。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24]写出来的全部东西相比，在内容贫乏的党派论战中有更多的生活，有更多的音乐。

译注：

① 俄国奖章刻制家、雕塑家、画家、版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

② 在地上放一个环，用大头钉投入环内。

③ 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曾预告救世主即将到来；耶稣基督的先行者，外号“施洗者”，因为他在约旦河畔常为人施洗。

④ 俄国作家（1843—1902），著有《遗失街风习》、《破产》、《土地的威力》等，作品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思想。

⑤ 俄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867—1933）。

⑥ 俄国历史学家、政论家（1867—1933）。

⑦ 俄国民族学家、博物学家（1797—1879）。

⑧ 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1850—1919）。

⑨ 圣经神话中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奉耶和华之命应将自己的儿子献燔祭，但刚要杀时便被天使阻止了。

⑩ 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男主人公。

⑪ 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25—1864)。

⑫ 指不着边际的空想,源出于果戈里《死魂灵》中的人物马尼洛夫。

⑬ 古罗马独裁者。

⑭ 俄国城市,位于列宁格勒州,濒临芬兰湾。

⑮ 德国画家和雕塑家(1863—1928)。

⑯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作家;杰罗姆(1859—1927)英国作家。

⑰ 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⑱ 希腊神话中人的灵魂的化身。

⑲ 恰尔德·哈洛尔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俄国作家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皮巧林,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⑳ 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创建人和首领之一。

㉑ 今捷克斯拉夫科夫市。

㉒ 两人均为俄国宗教哲学家、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

㉓ 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1812—1870),写有长篇小说《谁之罪》。

㉔ 俄罗斯作家(1871—1919)。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1]

我不想谈论我自己，而想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世纪，这个时代的喧哗和萌动。我的回忆从不容纳一切个人的私事。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取决于我的话，我只不过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皱一皱眉头而已。我一直不理解托尔斯泰、阿克萨科夫和巴格罗夫[2]的儿孙们为什么总是喜欢像史诗般地回忆他们的家庭往事。我的回忆并不温柔，而是充满着仇恨。它不是重复过去，而是摆脱过去。平民知识分子不需要回忆，他只需谈谈自己读过的书就够了。自传已经写好了。幸福的下一代人可以读到用古诗体和编年史写成的叙事文学。在我的自传里插着一根有裂缝的标记，在我和时代中间有一条深沟，充满着时代喧哗的深沟，把我和家庭、家庭档案远远地分离开来。家庭想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它生来就是拙口笨舌的。然而同时它又在说什么。这种与生俱来的拙口笨舌一直威胁着我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我们学习的不是怎样说话，而是怎样嘟嘟囔囔。我们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喧闹声中，在被它掀起的浪涛的白沫的冲刷下，学会了说话。

革命本身意味着生与死的较量，它不能容忍在进行革命时侈谈什么生与死的问题。它虽然已经舌焦口干，然而又决不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滴水。自然界——革命——永远的干渴和炽热(也许，它羡慕这个时代，因为它像一头温顺的绵羊走到河边，像平时一样去解渴。对于革命来说，最害怕的就是从别人手中获取东西，它不敢这样做，它害怕走近生命的泉源)。

然而，这些“生命之源”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汹涌的波涛冷漠无情地究竟流向何方?!它们为自己流淌，为自己汇聚成水流，为自己而汹涌澎湃！(“为我，为我，为我”——革命如是说。“让它去吧，让它去吧，让它去吧”——世界如是回答。)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像一个女大学生一样，平直的后背，小小的脑袋，天生一副唱圣歌的嗓子。如果说，勃拉维奇崇拜布拉克③，那么，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崇拜的就是耶达④。她很想走一走，坐一坐，可事实上，她总是站着。有时候，她走到易卜生⑤的教授客厅的蓝色灯光下，久久地伫立着，向观众展示自己微微弯曲的扁平的后背。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的魅力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她能成为像民族女英雄贞德⑥一样的领袖呢?为什么她身旁的贵夫人沙维娜在去过外商商场以后，会使人感到她全身乏力，像要瘫倒一样呢?

实际上，在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身上表现出俄国知识分子的新教思想，从艺术到戏剧的独特的新教主义。难怪她喜欢易卜生的戏剧，而且在演出符合新教教义的经典戏剧中达到了很高的造诣。知识分子向来不喜欢进剧场，在庆贺舞台偶像的时候，尽可能做得节俭一点，适可而止。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是在剧院里遇上新教主义的，而且走过了头，超出了俄罗斯新教的范围，几乎成了犹太教的教徒。为了表示虔诚的开端，她舍弃了一切剧场里的虚饰：融融的烛光、圈椅上的红色扶手、豪华舒适的包厢。

取而代之的是排成半圆形的层层增高的木椅子、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呢毯——像帆艇一样干净，像新教教堂一样四壁空空。同时，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具有悲剧女演员的天赋，但是还处在萌芽状态。和当时的俄国演员，甚至可以说，和现在的俄国演员不一样，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具有内在的音乐天赋。她能够按照歌词抑扬顿挫的要求，或是高亢激越，或是低声细语。她的演技主要依靠台词，配合少量必需的形体动作，比如将双臂举过头顶。她在演出易卜生和梅特林克⑦剧本的同时，探索着欧洲戏剧，深信欧洲已经拿不出更多更优秀的剧本。

像金黄色煎饼似的亚历山大剧院与总在这里举行大斋的无形透明的小世界很少有相似之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的小剧院始终笼罩着狂热的教派气氛。我并不认为能够从这里开创出一条戏剧新路。从小国挪威送来了一台室内剧、一些编外副教授，一些戏剧迷，来自一份佚稿的可笑的悲剧。它说的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司药如何诱使暴风雨袭击一只教授的鸡笼，引起耶达和布拉克之间一场既激烈又不失体面的争吵，从而将悲剧推向高潮。对于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来说，易卜生的戏剧仅仅是一家外国旅馆而已。她从俄罗斯的舞台生活中挣脱出来，就像从疯人院里挣脱出来一样，她自由了，但是一颗戏剧的心脏却停止跳动了。

当勃洛克俯身望着俄国剧场那致命的包厢的时候，他想到了卡门，并且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其实想说，为什么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走得那么远，永不回头。她的小剧院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这里弥漫着怪诞戏剧的虚伪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氧气。勃洛克在《滑稽草台戏》中狠狠嘲笑了这种怪诞戏剧。而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在演《滑稽草台戏》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嘲笑她自己。在舞台上的呻吟声和朗诵声中，她的声音变得坚定有力了，就像勃

洛克的声音一样。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剧院里都响彻人的声音。彼得鲁什卡⑧把铜鳞片压在上腭上，以便改变自己的声音。彼得鲁什卡胜过卡门和哈得斯⑨，胜过像猪叫一样的朗诵。

译注：

① 俄国女演员（1864—1910）。

② 阿克萨科夫（1817—1860），俄国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巴格罗夫，生平不详。

③ 法国画家，立体派创始人之一。

④ 瑞典抒情男高音歌唱家（1925— ）。

⑤ 挪威剧作家（1828—1906）。

⑥ 法国女民族英雄（约 1412—1431）。

⑦ 比利时法语剧作家、诗人（1862—1949）。

⑧ 俄罗斯民间木偶戏中主要丑角的名字。

⑨ 希腊神话中冥土的王，死者王国之神。

“皮大衣与身份不合”

深夜，沿着瓦西里耶夫岛，一场暴风雪席卷而来。从一间间旅店房间门缝里映出蓝荧荧的炉火；无论是不是营业，面包房里的一股股奶油香味不时地飘到街上。可是，钟表店老板早已关上了店门，只听见门里传来热闹的话语和清脆的蝉鸣。

几个更夫，像挂着号牌的蠢笨的黑熊，在大门口打盹。

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景象。现在，那里的冬天，药房门前都亮着深红色的球灯。

我的旅伴从像洞穴一般的文学创作的小屋里走出来，那里点着一盏暗淡的绿灯，放着一只木床，书房里少得可怜的藏书堆得像快要倒塌的崖壁；那里，从雪茄的缕缕青烟中似乎闻到被刺激的自尊性的气味，他感到了真正的快乐，用一件不合身份的华贵皮大衣裹住身体，转过脸来朝我看，他脸色红润，长满扎人的胡子，一半像俄罗斯人，一半像蒙古人。

他不是好好招呼马车夫过来，而是对他大声咆哮，好像对着一群拉着三套车的冬天的猎犬，而不是驯顺的马驹。

晚上，穿着不合身份的华贵皮大衣的平民文学家暴跳如雷。哎呀，原来是老朋友啊！在列昂季耶夫[①]文集的蜡纸封面下面放着一张肖像，此人戴着一顶裘皮法冠，好像一头长刺的野兽，他是严寒和国家的最高司祭。理论仿佛马拉雪橇的滑木在严寒中吱吱作响。拜占庭[②]，你冷吗？穿着不合身份的华贵皮大衣的平民作家冻坏了，发怒了。

诺夫哥罗德人和普斯科夫人同样也是如此对着圣像发怒的。好争论的人、好骂街的人从左右两面，像叠罗汉似地，你踩在我头上，我踩在你头上，惊讶不已地转动着自己短脖子上聪明的大脑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怀着异常惊奇的心情看热闹的好争论的人，一个个长得肥头大耳，满脸是坚硬的大胡子。它使我联想到仇恨文学的原型。

在可怕的法庭上，诺夫哥罗德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就像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始终在发脾气一样，它用平民知识分子和失败者炽烈的目光，也就是说怀着老百姓的仇恨对历史事件侧目而视。必须召唤这些没有及时觉醒的老百姓，不，最好是揪住他们的头发，把他们拉到拜占庭的历史法庭上当一个明白事理的见证人。

仇恨文学啊！如果没有你，我将和着什么佐料去吞下人世间的盐？

你就是加在淡而无味的理解面包上的佐料，你是快乐的谎言，你是制造阴谋的盐，被人们居心叵测地一代一代传下去，放在刻花的盐瓶里，或者包在餐巾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用严寒和刺眼的星星来扑灭文学的热火。是不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是不是在风雪交加的涅克拉索夫的街道上行走感到很快活？如果是真的，那当然啰。

我没有去回忆活生生的面容，而是想到了凝固的声音。瞎了

眼睛,只能靠手指触摸,靠耳朵辨认。悲惨的命运啊!你就这样步入现实,步入当代,就像踏进干涸的河床。

否则,他们就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亲人,而是和我格格不入的陌生人!然而,陌生人的面具点缀着我居室里的空荡荡的墙壁。只能回忆——独自一人回到干涸的河床!

第一次文学聚会是无法挽救的。只有一个人说得口焦舌干。费特③笔下的夜莺早就死掉了,那是别的老爷们的消遣,那是妒忌的对象,那是抒情诗歌。《骑马还是步行》,《钢琴已经打开》,《金玉良言恰似一杯热盐》。

费特的眼睛发炎,搅得他不能安睡。丘特切夫早期血管硬化,血管壁上有一层石灰质。最后说的五六句象征性的话,就像五条福音书上的鱼,把筐子压得沉沉的,其中有一条大鱼,就是《创世纪》④。

不能用它们来喂饱饥饿的时代,不得不把筐里的五条鱼,包括一条大死鱼《创世纪》全部丢掉。

在一个历史时代快要终结的时候,抽象概念总像一条腐烂的鱼,散发出臭味。最好还是低声吟读充满着仇恨和快乐的俄国诗歌。

对着马车夫吼叫的瓦西里·吉皮乌斯,是一位语文教员,他不给孩子们读文学作品,而是教他们一门更加有趣的科学——仇恨文学。为什么他要在孩子们面前摆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呢?难道孩子们需要的是自尊的刺和文学故事里毒蛇的嘶鸣?

我当时就知道,在文学的身旁总有见证人,就像它的家里人一样:即使是研究普希金的专家也不例外。后来,我又知道了其他一些行家。可是和吉皮乌斯相比,他们一个个都索然无味!

他与别的通晓文学的见证人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他的充满愤怒的惊奇。他像野兽一样对待文学,像对待体温的唯一来源一

样对待文学。他倚在文学身上取暖,坐在它身上蹭着自己棕红色的毛发和没有刮过胡子的面颊。他是一个罗摩洛斯[5],仇视自己的母狼,尽管他仇视,但却教别人去爱它。

每次去拜访瓦·吉皮乌斯,总要先将他唤醒。他睡在书房里的一张硬板床上,手里抱着旧的《天平》杂志,或是《北方的花》和被索洛古勃和勃留索夫[6]放过毒的《天蝎座》,他做梦也念念不忘斯卢切夫斯基[7]写的那首古怪的诗《公爵在日内瓦》。斯卢切夫斯基是早期象征主义的英勇善战的年轻修士科涅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8]的同志。

瓦·吉皮乌斯的冬眠是文学的抗议,是《天平》和《天蝎座》杂志议题的继续。他被叫醒以后,立刻变得盛气凌人,露出不友善的冷笑问长问短。可是他在现今的谈话中仅仅列举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书名,虽然是带着野兽般的贪婪和疯狂,但却是一种精神高尚的嫉妒。

他是一个多疑的人,最怕得咽喉炎,因为这种病会妨碍他说话。

同时,他个人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说话的力度和发音器官的动作。他下意识地喜欢发唏音和咝音,喜欢在字尾加上辅音“特”,他像学者一样,说起话来尤其偏爱齿音和上颚音。

瓦·吉皮乌斯淡淡的笔迹使我至今还在思考早期的象征主义,它就像这些茂密的唏音的树丛。“我的头顶上飞翔着雄鹰,会说话的雄鹰”,于是,我的这位老师更加偏爱诸如疼痛、攻击、委屈和自卫等字眼里的古朴的、有力的辅音。当瓦·吉皮乌斯异想天开地把费特的诗《火鸟》读给我们听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俄语语音外部不和谐带来的快乐。其中有一句是:“在婀娜多姿的树枝上。”朗读的声音仿佛课桌的上空游动着一条条蛇,它们发出一片沙沙的嘶鸣声。瓦·吉皮乌斯的冬眠使我害怕,也使我

感到兴趣。

难道文学就像一头将自己的脚掌含在口中的狗熊，在工作之后躺在书房的沙发床上沉睡不醒？

我到他家里唤醒这头文学野兽，听一听他怎样吼叫，看一看他怎样辗转反侧，我登门拜访这位俄语教员。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登门拜访”，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摆脱我当时登门拜访这位文学家的感觉。自那以后，文学已经不再是睡在身旁小床上的、长着褐色头发的小男孩的屋子、房间和家庭。

从拉季舍夫和诺维科夫[9]开始，瓦·吉皮乌斯同许多俄国作家建立了个人联系，这种交往既充满着火药味，又非常亲切，有精神高尚的羡慕、嫉妒，有开玩笑似的缺乏礼貌，有如同家庭内部的那种血缘间的不公平。

知识分子建造着偶像林立的文学殿堂。举例来说，柯罗连科[10]曾经写过许多关于兹梁人的作品，我觉得他自己也已经变成受崇拜的兹梁人了。瓦·吉皮乌斯教我们不要把文学建成殿堂，而是建成氏族，他高度赞赏文学中的父权制的文化起源。

如果我能舍弃对司祭的长命灯的热爱，去爱上瓦·吉皮乌斯所说的仇恨文学棕红色的火光，那该有多好啊！

瓦·吉皮乌斯的文学评论的权威性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产生影响。我和他一起完成了从俄国文学父权制时期的诺维科夫、拉季舍夫到早期的象征派科涅维茨的伟大旅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后来，我仅仅读读他们的书而已。

领带换成了细绳，在胸前摇晃。在没有浆过的彩色衬衫的领口里，一条患咽喉炎的短脖子在不安地转动。从喉头不时冒出强有力的唏音和爆破音：“唏”、“特”。

看来，他经常处于英勇激烈的挣扎状态。这种临死前的状态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一方面为他的枯干的精神世界的树根提

供养料，一方面也折磨着他，使他惶惶不安。

顺便提一下，在象征派的圈子里经常流行这样一些话："日子过得怎么样，伊凡·伊凡诺维奇？""还算过得去，彼得·佩德罗维奇，日子快到头了。"

瓦·吉皮乌斯爱好写诗，在诗里，他常常为一些好的韵脚感到兴奋，感到得意，比如：火焰——石岩，爱情——血亲，肉体——上帝。

在他的词汇里只能找到两个词："生命"和"火焰"。如果我们让他来掌管俄罗斯语言，那么说真的，为了颂扬"生命"和"火焰"，他可以漫不经心地把全部俄语词汇焚为灰烬。

时代的文学是世代相袭的。它的宅第是一杯斟满的酒。客人们坐在铺得宽宽的桌子后面，一批批后来的人脱掉大衣从风雪中走进来。潘趣酒的浅蓝色的火苗使来者想起了自尊、友谊和死亡。围绕着这张桌子，我们总会听到，也许是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请求："唱一支歌吧，梅丽。"这是最后的酒宴上的令人心碎的请求。

那位漂亮女人唱起了刺耳的苏格兰民歌，然而我感到那些用因交谈而显得疲惫和嘶哑的声音请她唱歌的人更加亲切。

我仿佛见到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他大声叱责着在瓦西里耶夫岛的雪地上驾车的马车夫。他这样做，仅仅因为他比其他的俄国作家都喜欢支配时代的巨石，他感觉时代，就像感觉天气一样，不时地对它们叱骂。

我真想高呼："啊，好啊，我们的世纪多么美好啊！"就好像在说："这天气真干燥啊！"可是事与愿违，话在嘴里像粘住了一样。严寒封住了喉咙，主人对世纪的呼唤像水银柱一样冻成了冰。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已经破灭，已经结束，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哪一个人都不敢，也不应该让它卷土重来。当我回顾这

段历史的时候，我真愿像留住好天气一样地留住这个世纪，看一看冰封雪锁的一统世界，它把每个十年凝结成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和一个严冬；在那里，可怕的国家体制仿佛一只燃烧着冰块的火炉。

我总觉得，在俄国文学史上的这个冬季里，没有什么贵族老爷式的和使我感到羞愧的东西。我战战兢兢地把蜡纸封套举到作家的冬帽上头。在这件事上谁也没有过错，谁也不必感到羞愧。野兽不必为自己的毛皮感到害臊。黑夜使它长出兽毛，冬天使它穿上衣服。文学就是一头野兽，熟皮匠就是黑夜和冬天。

译注：

① 俄国作家、政论家、后期斯拉夫派(1831—1891)。

② 又称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分裂后，在其东部形成的国家，首都为君士坦丁堡。

③ 俄国诗人(1820—1892)。

④ 《圣经》的第一卷。内容是古代犹太人关于上帝创造宇宙、地球和人类的神话，以及犹太人远祖的传说故事。

⑤ 传说为罗马城的创建者和罗马的第一代王。

⑥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著有诗集《火圈》等；勃留索夫(1873—1924)，诗人，俄国象征派创始人。

⑦ 俄国诗人(1837—1904)。

⑧ 俄国文艺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36—1861)；科涅夫斯基，生平不详。

⑨ 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俄国教育家、作家。

⑩ 俄国作家、评论家。

港务主任

作为旧制度遗产的一件浆过的白色制服，使他变得非常年轻，也使衣服本身显得十分和谐：中学生穿着青春焕发，长官穿着精神抖擞。他十分珍惜这种结合，并且唯恐失去它。他的心目中，整个克里米亚就像一件耀眼夺目、浆得硬梆梆的地图制服。彼列科普海峡上开始降下夜幕。那里，在盐碱滩后面已经找不到浆粉和洗衣女工，也找不到令人愉快的等级服从制度。那里，没有走出浴场后的那种矫健的步伐，而是永不止息的激奋，这里既有廉价购进外币时所产生的为自己克己奉公感到自豪的复杂心情，也有四十岁时成功地通过考试时的感觉。

他的家庭异常优裕。公文包旁边放着一只精致的旅行梳妆盒，里面有放剃刀、肥皂盒和各种毛刷的小格子。除他以外，也就是说，要是没有港务主任在场，就装不成哪怕是一吨的大麦面包和小麦面包。货主也发不出哪怕是一吨的粮食。无论是昨天的经纪人罗什，还是今天的神话般的暴发户，像意大利人那样懒散成性的卡尼特费尔什坦（他想把大麦发往法国马赛），无论是瘦得像公火鸡一样的小麦主利夫

舍茨(他还是艾瓦佐夫斯克地方的一个部长),还是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或者列兹涅尔一家都束手无策。列兹涅尔一家日子过得不错,他们庆祝的已经不是银婚,而是金婚,而父子两人出于幸福的愿望,相处得十分融洽。

每一艘货轮都肮脏不堪,弥漫着厨房的油烟味,一个混血种的女仆在里面忙碌着。炉子烧得又热又旺,好像是国际列车的包房,可是更像瑞士富翁家里的小贮藏室。船长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的私粮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放在船长室里运走。

大家很清楚,他们出售粮食的同时也出售他们在上面走动的土地。当他们觉察到这些土地将要陷进大海,并且打算当它们一旦崩溃就一走了之的时候,就继续出售这片土地。

当港务主任漫步在当地居民喜爱的绿荫覆盖的意大利大街上,常常有人拦住他,拉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边。顺便提一下,这个城市有一个习惯:一切事情都在马路上解决,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清楚他什么时候将达到和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同每一个男人谈话都十分亲热,就像同上司的夫人谈话一样,侧转鸡蛋似的脑袋瓜,靠着左边行走,使得跟你交谈的人一开始就会向你表示感激,并且感到局促不安。

他向某一些上等人送上有力的吻,就像欢迎远航归来的朋友,他把这些吻带在身边,就像拿一盒新鲜的薄荷药片一样。

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受尊敬的公民,随着夜色降临,我就去敲打一扇扇门,想找个过夜的地方。东北风在每条小街上肆虐。金兹堡、朗兹贝格和许多人一面吃着犹太式的麻花形的白面包,一面喝着茶。担当守夜的鞑靼人在钱庄和寄卖行的窗户下面走来走去。在寄卖行里,烟袋杆和吉他都披上了上校穿的丝长衣。也许是迟到的士官生连,穿着英国皮靴,用后跟喀嚓喀嚓敲击着地面,嘴里唱着著名的赞歌,声音震荡着空气。这些歌中夹着几句

违反书报检查规定的禁句，根据当地神职人员的强烈要求，当白天唱的时候就被删掉了。

我像每个流浪汉一样，急不可待地到处去找寻过夜的地方。这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为我打开港务局的大门，让我宿一个晚上。

我以为，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奇怪的夜店了。我按了一下电铃，一个穿帆布大衣、睡眼惺松的职员，疑神疑鬼地打开了大门。几盏明亮的白炽灯射出刺眼的光线，照亮了克里米亚的大幅地图、海深和海流测量图、其他各种图表和一只计时表。我小心翼翼地把一只青铜墨水缸从铺着绿呢的会议桌上拿开。房间里很暖和，也很干净，就像住在外科病房里一样。所有的英国船和意大利船曾几何时也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叫醒过，让他在厚厚的日志上登记备案，现在都在港湾里静静地安睡了。

要了解杰尼基尼-弗兰格尔岛上的费奥多西亚的情况，首先要了解它的过去。这个城市有些古怪，表面上好像一点没有变化，完完全全是老样子。古时候，它并不像热那亚，是一个军阀和奸商的巢穴，而更像温柔可爱的佛罗伦萨。在萨朗杰纳基当台长的天文台里，工作人员不仅记录天气情况，绘制等温线，而且每星期聚在一起聆听台长本人和其他市民写的剧本和诗歌。有一次警察局长也写了个剧本。亚速银行行长马博却是以写诗歌而出名的。当伏洛申穿着市服——羊毛长袜、波里斯绒裤子和天鹅绒上装——出现在坑坑洼洼的费奥多西亚马路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令人感动的古罗马气氛里，商人们纷纷从店铺里跑出来。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感谢弗兰格尔岛，因为它使我们呼吸到了16世纪海盗般的地中海共和国的清新空气。可是，温文尔雅的费奥多西亚很难适应克里米亚海盗的严酷的法律。这是它为什么能保护好善良的学术和文艺的庇护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

罗维奇的原因。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好像一只头戴热带软木盔形帽的小海狸,他笑嘻嘻地眯起眼睛,面对着历史,柔声低语回答它的粗暴举动。然而,他是市民们崇拜的海神,是别具一格的海神。一个人越强大,他的觉醒就越有威力。法国皇帝甚至还未到起身的时刻,就像旭日样升腾起来,而且还反复两次:“小日出”和“大日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大海一起苏醒。可是,他是怎样跟大海交往的呢?他给大海通电话。昏暗的办公室里,英国剃刀在闪闪发光,干净的亚麻布被褥、刺鼻的香水,还有略带甜味的进口烟草都散发出阵阵香气。这是极为优雅的男人卧室,任何一个美国人见了都会眼红的,但毕竟是航海结束的集中地和船长室。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随着第一艘轮船的到来就醒了。两个经过严格训练的穿白帆布衣服的勤务员,像医院的卫生员一样,向发出第一声铃的电话机冲去,对着像被叫醒的小猫一样的长官低声地报告说:来了一艘英国的、土耳其的或者是塞尔维亚的轮船,现在已经停泊靠岸。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慢慢睁开小眼睛说:“啊,好,很好!”他知道无法改变轮船抵达的时间。于是,这艘轮船就成了锚地的公民,开始了它的海港的一天。港务主任从一只睡猫变成商贾的保护人、海关和证券交易的鼓动者,变成买卖白兰地、渔网和兑换外币的人,一句话,变成了一尊人间的海神。他仿佛一只操持家务的、羽毛弄得湿漉漉的燕子,过早地离开了鸟窝。你不会注意到,它怎样带着孩子们练习飞翔去远涉大西洋。对他来说,撤离并不是灾难,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远渡大西洋的愉快飞翔,这是出于父亲和以家庭为重的人的本能,这仿佛是他对生活压力的胜利。他从来不谈及生活压力,却时刻准备面向它,也许从一开始起是下意识的。

老太婆的鸟

当你穿过整条意大利街，在最后一家寄卖行的后面就是外商商场被遗忘的游廊。从前，那里有一个地毯市场，再过去是一座爬满常春藤的装着百页窗的法国式小屋，一个叫安娜·米海伊洛夫娜的神智学者饿死在它的陈设着软家具的客厅里；在这小屋后面有一条道路向高坡延伸，一直通往检疫村。

从一月份起，这里就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严寒，彼列科普天寒地冻，士兵们拖着重炮在冰上走。在"阿斯托里亚"旁边的咖啡馆里，一群英国士兵——"巡捕"，正在举行热餐会，大家挨着火盆坐成一圈，烤着一双双冻得发红的大手，唱着苏格兰民歌，他们挤来挤去，碍手碍脚，使得态度客气的店主人无法炸鸡蛋，煮咖啡。像绵羊般温顺又温暖的城市变成了地狱。受人尊敬的、长着大黑胡子的、疯疯颠颠快快乐乐的卡拉伊姆人，再也不像孩子们那样，吹着口哨满街飞跑。

检疫村是由许多幢开着小窗洞的低矮的泥抹土房组成的迷宫，一人高的土墙围成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胡同。你走在这些小胡同里，不是被挂着冰棱的绳子绊倒，就是被坚硬

的梾木树丛撞着。刚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可怜的土城赫库兰尼姆，现在由几条凶狠的狼狗守卫着。白天，你在这里走，就好像置身于被毁灭的罗马废墟上；夜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只要躲开恶犬的袭击，只要能喝上一杯热茶，你就去敲开任何一户寻常人家的门吧。检疫村每天都担心缺水。人人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着结了冰的抽水站。妇女们聚集在陡峭的小山岗上吵吵嚷嚷，好像在开市民大会。在这里，被水泵压上来的水流还没有结成冰。为了在抬水的时候不让水从桶里溢出来，女人们将木屑撒在水面上，把冰冷的水桶封住。

检疫村的那种安宁闲适的田园生活持续了好几天。我付了一只鸡蛋的价钱，从一个老太婆那里租了一个房间。像村里别的女房东一样，这个老太婆尽管风烛残年，屋子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像过节一样。她不光将自己的小屋子收拾得十分整洁，而且还打扮得漂漂亮亮。外屋里装着一只小巧玲珑的悬壶洗手器；可是，它太吝惜了，根本无法痛痛快快地挤出水来。屋子里飘着面包的香味，暗淡的煤油灯的废气和老年人的清纯的呼吸声。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有力地敲着。满天寒星仿佛一粒粒粗盐撒落在院子里。我很高兴，因为屋子里很暖和，并且有人在外面忙碌着替我准备午饭，有土豆、洋葱，还有一小把大米。老太婆把房客当成鸟一样来喂养，一会儿换水，一会儿洗笼子，一会儿又撒粟米。这时候，做一只鸟要比做一个人好。成为老太婆笼中的鸟的愿望是伟大的。

当邓尼金①从库尔斯克撤退的时候，司令部把铁路职工都赶了出去，把他们和家属一起关进了取暖货车。当他们弄清真相的时候，列车已到了黑海边上。现在，这些铁路上的鸡群从温暖的笼子里被放了出来，迁徙到检疫村里安家落户，他们用瓦片擦亮一只只铝锅，可是仍然惊魂未定。老太婆无论说什么话总离不

开迷信的恐惧，她说，他们是怎样从库尔斯克被带走的，可是从来不提他们一定会被送回去，因为她一口咬定，送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要他们死在这里。

如果你选择一个克里米亚的寒风刺骨的夜晚，走到院子里，侧耳倾听走在没有积雪但却结了冰棱的泥地里的脚步声（这一条条冰棱就像十月里我们北方地上的一道道车辙），如果你用眼睛找一下隐没在黑暗中已经吹熄了城市坟丘灯火的移民们的墓地，如果你喝一点被熄灭的生命的残羹，其中既有狗的狂吠，又有撒落的星星，你就会清醒地感到，延续了三十年的战争就像降临在人间的一场瘟疫；在这些小人物的土屋里有流行的瘟疫，有被吹熄的灯火，有狗的吠叫，也有可怕的寂静。

译注：

① 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武装头目。

法律的披肩

呼吸凝结成水，滴落在黄颜色的澡堂的墙上。桌上放着一只只黑色小碗，里面盛着克里米亚矿泉水，水面上似乎还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它像诱饵一样，等待着卡拉伊姆人和希腊人的红嘴唇上钩。那儿，已经坐了两个人，现在又来了第三个人，而他的背后，又有两个人迟疑不决地跟了过来。受到独特的苍蝇引力的支配，中心雾化了，消散了。人们团团围住这肉眼看不见的中心，嗡嗡作响地盘旋在一小块方糖上面，咬牙切齿地哼着歌赶紧躲开这还未生效的契约。

用灰色纸张印刷的小报《奥斯瓦加》，脏兮兮的，老是像一份没有定稿的校样。它躺在小商贩的柜台上，使人联想起俄罗斯的秋天。

同时，建筑在苍蝇婚礼和一只只火盆上的这座城市，却安排得井井有条。从安息国王的宫殿，也就是从筑在像舞台般的平顶山上的古波斯宫，到防波堤内的狭长沙滩，再到作为严肃而真实的装饰品的公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监狱和集市市场，它像正在飞翔的大雁尽情地张开一对三角形的翅膀，向大地、天空和海洋展示自己是一座和平的桥梁。和

拥有许多圆形露天剧场的大多数南方沿海城市一样，它依山而立，一座座蓝色和灰色的房屋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山坡上，仿佛一簇簇羊群。

这座城市比它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更加悠久，更加美好，更加洁净。它一尘不染。在它美丽的身躯上叮满了虱子，那是一座座监狱和兵营，满街都是披着黑斗篷的库克罗普斯①，一身狼狗味的哥萨克军官和溃退下来的近卫军士兵，他们手里拿着大沿帽，从头到脚仍然闪烁着健康和青春的火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杀害另一些人，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就像洗一个矿泉浴一样轻松。对于这些长着一对孩子般的放肆无礼的、令人生畏的褐色眼睛的人来说，克里米亚不过是一处疗养地。在这里，他们遵守有益健康的行之有效的作息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治疗。齐加利斯基团长照料着一个弱智的、整天哭哭啼啼的妹妹，还有一头生病的老鹰，它很可怜，眼睛瞎了，爪子也被打断了，这是白俄军里的一头鹰。在他的住房的一个角落里，这头浮雕似的老鹰在煤油炉的咝咝声的伴奏下，悄悄地挪动着爪子。在另一个角落里，他的妹妹蜷缩着身体，裹在一件军大衣里，有时包在一条羊毛头巾里，活像一个疯巫婆。快步如飞的年轻人一般不专程去莫斯科出让自己多余的漆皮靴子，而是直接拿到集市上去卖。齐加利斯基天生就是要去照料别人，天生不喜欢打断别人的好梦。他和妹妹好像一对盲人，但是在团长那女人般善良的、又黑又亮的眼睛里充满着领路人的近乎愚昧的决心，而他的妹妹，除了像小牛犊一样感到恐惧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给妹妹吃葡萄和大米，有时从士官学校里带回一份份用纸袋装起来的食品，使人想起库布人②或者从学者之家出来的顾客。

你很难想象，不论是哪一个军队，为什么需要这种人？这种人在生死关头只会拥抱自己的统帅，对他说："亲爱的，不要这

样，最好走到我跟前，一起聊聊吧！"齐加利斯基每天给士官生讲授炮兵知识，就像大学生去上课一样。

有一次，他为自己的嗓子不好感到羞愧，也为煤油炉，为妹妹，为没有卖出去的漆皮靴子和劣质烟草感到羞愧。于是，他朗诵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听起来很不舒服："与沙皇在一起，还是取消王位，我反正都一样。"还有一句是表达他需要什么样的俄罗斯的愿望："用法律的披肩加身。"还有其他一些诗句使我想起彼得堡参政院外面的一尊被雨淋黑的忒弥斯女神③。"这些都是谁的诗？""是我的诗。"

这时，他为我打开一幅梦境般的风景画。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这幅画的中心是一块塌陷地，它正好处在俄国的地理位置上。黑海一直延伸到涅瓦河边，稠得像煤焦油一样的浪涛冲刷着伊萨基辅大教堂的墓石，带着充满悲伤的白沫将参政院的石级击得粉碎。在库尔斯克和塞瓦斯托波里之间的一片荒芜的空间里，法律的披肩好像一只救生圈，在水面上漂浮。一些人正在打捞这种奇怪的国家化妆品，他们并不是白俄军的士兵，而是坐在独木船上的渔民。生活在革命前的这位团长未必知道和预料到会有这件东西。

团长——他是一个穿着法律披肩的保姆。

译注：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② 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部落群。

③ 希腊神话中司法律和秩序的女神，她眼睛蒙着布，一手执天平，另一手执宝剑。

马泽萨·达·芬奇

当轻便马车带着软绵绵的椭圆形的空座位，或者当孤零零的敞篷马车挂着喜庆般的玫瑰色幔帐，走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上城的杂草丛生的郊外的时候，马迈开四蹄用力地敲打着滚烫的石头，冒出点点火星，似乎这里本该有一层层梯子。

这里气候十分干燥，连蜥蜴也会干死。一个穿着凉鞋和绿色短袜的人被轰鸣而过的马车吓了一跳，久久地望着它的背影。他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好像有人把还在应用的阿基米得杠杆运到山上去。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个女小贩的家门口，她把窗口当柜台，就在那儿做买卖。他用茨岗人戴的银戒指敲敲西瓜，让小贩切下一半。可是，走到转角上，他又折了回来，用半只西瓜换了两根自制的卷烟，然后就很快离开了。

在上城，房屋造得跟兵营一样，甚至像一座座五角形堡垒，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和像人的年龄增长一样的自然的感觉。它们把考古学和并不遥远的古代搁置一边，破天荒地把这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城市。

画家马泽萨·达·芬奇的双亲的住宅，羞答答地扭过身去，让忙碌不停的后院对着采石场。沾满油污的，像《圣经》中描写的那种羽绒裤子摊开在地上，在太阳底下暴晒。成群的家兔幻化成消过毒的茸毛，时而跑来跑去，时而像溢出的牛奶向四处散开。在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地方，有一间敞开房门的、随时准备接待宾客的小房子。在斜拉起的一根细绳子上挂着一大串洗好的衣服，被风吹得鼓鼓囊囊。正义的舰队扬起既威武又像母爱般温暖的风帆，在海上航行。可是，属于马泽萨的一翼，以它的素具的鲜艳和完备而使人赞叹不已：黑色和红色的竖领衬衣，像新郎新娘和天使们穿的拖到脚后跟的丝织睡衣，一件是细条纹的，一件是贝多芬式的，当然，这里我指的仅仅是衬衣，一件是穿在燕尾服里面的衬衣，像猴臂一样长长的袖子，并且请人用手工在袖口上绣了花。

在南方，床单一晒就干了。马泽萨径直走到院子里，吩咐把晒在外面的东西都收下来，并且马上把它们烫平。

他的名字是自己选中的。面对好奇者的提问，他总是不情愿似地解释说，他喜欢自己的姓——达·芬奇，在他的姓名的前一半——马泽萨里，他保留了与家族的血亲关系。他的父亲是个彬彬有礼的小人物，开一条机动帆船，把布匹运到喀则。因为他不怕晕船，大家就直呼他马泽斯。就这样，在加了阴性词尾以后，父亲的绰号就变成了他的名字——马泽萨。

谁不知道艺术大师列奥纳多①船上的杂乱无章？物品用具像刮旋风一样地在三个量度长的大工作室里不停地打转。几只鸽子飞进天窗，扔下几颗鸟粪，弄脏了价格昂贵的锦缎被子。艺术大师似乎未卜先知，竟然意外发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日常生活用品，马泽萨不知不觉地从效法他的人那里继承了三个量度长的狂乱，他的卧室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海船。

天花板下面挂着一只大吊篮；白天，马泽萨喜欢躺在里面休息。轻柔的羽绒被褥在宁静的黑夜里显得悠闲自在。被马泽萨任意搬进房间的梯子靠在天花板下面的搁板上。搁板上除了一些日常用具，一件分量很重的青铜灯具十分显眼。马泽萨祖父活着的时候，它曾经挂在卡拉伊姆人的祈祷室里。桌子上放着一只细瓷广口墨水缸，上面刻着犹太教堂里那种神情忧郁的狮子，墨水缸里搁着一支多少年没有醮过墨水的，已经开裂的鹅毛笔。书架上，在丝绒帘子下面放着一大堆书：西班牙文的《圣经》、《马卡罗夫词典》、列斯科夫②的小说《神职人员》、法布尔③的《昆虫记》和贝德克尔④的《巴黎旅行指南》。床头柜上，在一张寄自阿根廷的信封旁边放着一架显微镜，它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马泽萨每天早晨睡醒以后都对着显微镜观察一番。

在这个到处可见见利忘义的小人的小城市里，马泽萨完全不为人注意，生活得很幸福，他散步，吃水果，在免费浴场里洗澡，一直想着到中央联社买一双橡胶底的拖鞋。他和人们，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都是捉摸不定的，都是建筑在捉摸不定、甜美的、意犹未尽的基础上。

他下得山来，在市里挑选供物，一小时，两小时，有时整整六小时花在这上面，然后，无论时间早晚，沿着晒得发烫的曲曲折折的马路，把供物带回家去。于是，他像一只塔兰图拉毒蛛，开始进行某种出于自己本能的见不得人的活动。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到我这里来吧，我们有一座石屋！”可是，石屋里的东西和别的房屋一样：羽绒褥子、玛瑙一样的宝石、一幅幅照片和丝织餐巾。

马泽萨只画自画像，还特意临摹了一幅亚当吃禁果的画。

等到衣服都熨烫好了，马泽萨就动手做晚上出行以前的准备工作。他没有盥洗，却兴致勃勃地坐到姑娘们用来梳妆打扮的

银光闪闪的镜子面前。他的一对眼珠变得暗淡无光，女人般的圆圆的肩膀在不停地哆嗦。

白色的网球裤，贝多芬式的衬衫和运动腰带并没有使他感到满足。他从衣橱里拿出一套常礼服，全副晚装打扮，从凉鞋到绣花小圆帽都无可挑剔，白净的大腿上套着一条黑哔叽的喇叭裤，走到街上；这时，费奥多西亚的月亮像是用羊奶把大街小巷冲洗得莹白如霜。

译注：

① 即著名的意大利画家、雕塑家达 · 芬奇（1452—1519），最杰出的作品为壁画《最后晚餐》和肖像画《莫娜 · 丽萨》。

② 俄国作家（1831—1895）。

③ 法国昆虫学家（1823—1915）。

④ 德国出版商（1801—1859）。

寒冷的夏天

大剧院的四匹骏马……粗壮的陶立克式圆柱……歌剧院广场——像铺上沥青的湖泊。电车驶过划出一点点草黄色的火花——清晨三点，已经被得得的马蹄声惊醒了。

我真想认识你，大歌剧院广场，你是欧洲城市的脐带，即使在莫斯科，你比起自己的姐妹，也是毫不逊色的。

大都会是一座世界级的旅馆，我经常站在它的玻璃遮阳棚下面，在内城街的走廊里徘徊，偶尔也在嵌在墙上的镜子前面滞留一会，或者在放着竹编椅子的宁静的小草地上休息片刻。当我走出这座沾满尘土的旅馆，置身在广场上，太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伟大的革命现实令我目眩，声音高亢的大咏叹调掩盖了汽车喇叭的鸣叫。

在缪尔-缅利里扎对面的彼得罗夫克，站着一些兜售香水的小女孩，她们像一群小鸭子靠着墙脚，一只货摊挨着一只货摊。这支女商贩的小队伍，只不过是一群小鸟。她们这一群莫斯科的小姑娘像长着翘鼻子的小麻雀，其中有的是可爱的小裁缝，有的是卖花女，有的是光着脚板的，她们吃的是残羹剩饭，却在夏天里盛开……

大雨中，她们脱下鞋子，光着脚淌过混浊的小溪，沿着被雨水冲洗过的林荫道的红粘土奔跑，她们把小船般的鞋子紧紧搂在怀里：没有鞋子，一切都完了，因为这是一个寒冷的夏天。寒意，仿佛装在袋子里的冰，怎么也融化不掉，它躲藏在涅斯库奇诺耶浓密的树丛中，并且从那儿向脚蹼形的莫斯科蔓延。

我想起巴比埃①的一首抑扬格诗"当炎热将巨大的石头烧得通红"。在自由诞生的年代里，"这个野姑娘，巴士底的燕子"——巴黎被酷热惹得暴跳如雷；可是，我们这些灰眼睛、翘鼻子的小女孩，却像一群挨冻的小麻雀生活在七月里的莫斯科……

而我喜欢在清晨跑到被雨水冲洗过的洁净的大街上，然后穿过夜里积起好多夏雪的花园，直奔报亭买一份《真理报》。

我还喜欢像小孩子一样，敲着空铁桶跑好远的路去买煤油，我不去附近的小店，而到一处贫民窟。关于这个地方，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踏进门坎，然后向左拐，是一条像修道院里那种简陋的楼梯，上了楼梯就是并排两只露天凉台。很远就能听得见脚步声。快压坍的天花板，被砸得破破碎碎的石板，门上都钉上了毡子，到处拉着细细的绳索，面黄肌瘦的孩子们穿着长袍调皮地朝你奔过来。这是地地道道的意大利大院。从一个堆满破烂的窗口里总有一个希腊女人向外张望，她长得出奇的漂亮。为了描写这样的美女，果戈里曾经不惜调动最夸张、最美好的比喻。

谁不爱城市，谁就不会珍惜它的粗布衣服，它的简陋的居屋，谁就会在黑漆漆的楼梯上喘不过气来，被脚下的瓶瓶罐罐绊倒，被一声声猫叫惊呆，谁就不会在莫斯科高等美工实习学校的院子里欣赏到扎向碧空的刺和机场的那种生动的天然的魅力……

谁不爱城市，谁就不了解它的并不显眼的习性。比如说，当

四轮轻便马车爬上卡缅尔盖尔斯克山脊的时候，马必定是一步一步地走，于是，一群乞丐和卖花女就跟在你的后面。

在大的电车停车站，在阿尔巴特街，乞丐们都冲进正在休息的车厢，为自己搜罗各种贡品。如果驶过来的是辆空车，他们就站着不动，像野兽一样，蹲在电车站的公共厕所的遮阳棚下晒太阳。我曾经见过几个瞎子怎样跟他们的引路人一起玩耍的。

几个卖花女站到一边，朝自己手上的玫瑰花不停地啐唾沫。

傍晚，葱绿苍翠的特维尔街心花园，从普希金大街到季米里亚泽夫斯科耶空地，到处都是青年人在唱歌跳舞，举行各种各样的游艺活动。可是，莫斯科的这些绿色大门溶化了多少意外事件啊！

在放着永不更换的玻璃瓶的抽彩的小桌子旁边，在三个盲人旁边，一些人附和地唱着《护身符》，慢慢地走向聚集在大树底下的黑压压的人群……

树上坐着一个人，一只手高举草编小筐，另一只手拼命地摇动着一根树枝。不知什么东西围着树顶在飞旋。啊，这是一群蜂。它们是从哪儿飞来的，并且在树上安了家。那个从特维尔街心花园来的古怪的养蜂人不停地摇动着树枝，把筐子凑到蜂群飞处。

雷雨天，坐在一路电车里，沿着莫斯科绿色腰带追赶着雨云，这有多好啊。在救世主修道院附近，刷得雪白的阶梯形平台把城市一分为二。刷白的山峦和一条条河流一起闯入了城市。城市的心脏拉起了风箱。接下来，莫斯科开始用粉笔书写。你看到越来越多的房屋的白色骨架。在雷雨天铅灰色的云幕上首先看到的是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白色椋鸟，然后是教养院的丧失理智的石牌卦。这是一块块石灰板和一扇扇窗户，整整齐齐，好像是一只只蜂房，是没有任何壮观可言的体积的堆砌。

莫斯科的这种致命的单调时而伪装成受教育的模样，时而

伪装成种牛痘的模样；它已经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一层层楼房发酵似地膨胀起来。

然而，我不再去寻找这个震撼和燃烧着的城市里的古老的痕迹。莫非婚礼还会在四轮马车上举行，新郎像神色阴沉的小寿星，新娘像穿着白衣的洋娃娃？莫非在酒过三巡的时候，还会端上一小碟渍豌豆，然后走出一位领唱人，像一名身强力壮的助祭和大家一起唱起谁也听不懂的赞美诗？

如今的夏天，当铺里摆着名贵的皮大衣，火红色的浣熊皮和像刚收购进来的光亮如新的貂皮并排放在桌子上，犹如一条条用鱼叉捕到的大鱼……

我喜欢银行，把它当作豢养野兽的笼子，出纳人员坐在铁栅里面，仿佛一头头凶猛的野兽……

女人们脚上的厚鞋子，男人们身上穿的英国式的灰衬衣，红军战士的胸脯像 X 光射线照出一根根深红的肋骨，闪闪发光——这一切都不十分使人赏心悦目。

译注：

① 法国诗人(1805—1882)，所作有《抑扬格诗集》，还著有十四行诗集《雄浑的和弦》。

苏哈列夫卡

苏哈列夫卡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片要冲地势非常开阔，非常平坦，竞争激烈的商家渐渐地被吸引到充满着惊涛骇浪的喇叭口里。木板路变得粗糙起来，街道上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显然，苏哈列夫卡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它把自己的瓶瓶罐罐都扔到了木板路上：摊成扇形的书、玩具、木勺，凡是零零碎碎的、碍手碍脚的东西都统统扔掉。不值钱的杂物，卖不出去的货物……

在离开市场稍远的地方，木桶上坐着几个理发匠，正在替身强力壮的汉子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几条长凳像烧红的木炭，无人问津。

在苏哈列夫卡的塔楼下面，在粉红色砖块砌起的贵妇人塔楼下面，在粗壮的火鸡塔楼下面，一头霍尔莫戈雷牛，像一位四十五岁的女皇，被拴在一棵干枯的小树上。这塔楼都是在17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建造的。彼得大帝做了一个恶梦，受了惊吓，就造起了这塔楼。值得高兴的是，这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在这片菜地里造起了一座非驴非马的建筑物，既不是兵器库，也不是瞭望塔，而是名副其实的一

处在陆地上训练海军的场所。

苏哈列夫卡是一片菜地，即使在上面铺上石块也不碍事，你可以感觉到石块下面有莫斯科稀有的、极不听话的土壤。买卖从泥土下面涌出来，就像土壤本身的产物一样。

市中心的市场呈现一派可怖的景象，在这里，有人为了偷一块煎饼，可以把人撕碎，然后随手一扔，就像扔一个橡皮娃娃一样。在这里，人是面团，不管你是否愿意，有人会冷不防伸出一双暴满青筋的手把你捏住。

苏哈列夫卡像一个肥胖的女人向你扑过来。难怪莫斯科的市场因肥婆的形象出了名。在左右两边一字排开的小客栈中间，是要价凶狠的小摊贩。左边，有几家空着的、不收钱的客栈，房子很单薄，向两边叉开，像一只小姑娘的脚掌。市场像一片田野，分段划界，用一条条小路分割成块，随心所欲地，有时播种黑麦，有时播种燕麦，有时播种荞麦。你闭上眼睛，只要闻一闻散发出来的气味，就可以猜到你走在哪一块畦田里。时而，新鲜的牛羊肉气味像刺鼻的麝香向你袭来——这是一种并不可怕的牲畜尸体的气味，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它的真正意义；时而，闻到一股熟皮子的气味——牛轭和劳动的气味，或者是不那么刺鼻的、有些变味的皮靴子的气味；有时候，菜摊上的香芹和旱芹的气味，或者是一排排奶制品的浓郁的潮湿味，挠得你鼻子发痒。

我见过梯弗里斯的集市广场和巴库的黑市场，这些商贩都是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突厥人，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老奸巨猾，手脚灵活，喜怒无常。他们身上丝毫没有苏哈列夫卡的商人那种举止猥琐、表情单调的影子。他们是黄鼠狼和人的混种，真正的“贫乏的斯拉夫民族的风情”。这些狡黠的眼睛，小小的耳朵，狼一样的前额，面颊上一点点红晕，似乎都平均地印在一卷卷包装纸上。

据说，男人由于跟女人长期共同生活，会渐渐变得像女人。如果你仔细看看，商人很像自己出售的商品。粮栈老板比谁都心平气和，文雅端庄，因为其他一切都变幻无常，只有粮食是永恒的。从肉贩子的脸上可以看到蹩脚外科医生的机灵，他们比别人更复杂，更好动，更仁慈，肌肉的运动必然伴随着他们的工作，屠宰牲口，从肩膀上把肉劈下来，然后目测，再在上面敲上印章。

贩卖针头线脑的工场老板娘总是拉长了脸，抿紧薄薄的嘴皮。

在这里，你不妨仔细欣赏一下哥萨克淘气鬼们的黝黑而开朗的面孔，他们傻乎乎地笑着，在一点点地挖鞋油。

苏哈列夫卡在左右摇晃。它有时暴跳如雷，有时被叫卖声，被鞭笞派教徒的买卖礼节所陶醉。它把一个人从这边抛到那边，他刚从一个旧货市场挣脱出来，又被不三不四的两条腿的小铺子盯上了，把他逼到一条流水潺潺、铺满砾石的小河边，弄得他走投无路。留声机的声音震耳欲聋，他只得穿过煤油炉子，穿过散在地上的小五金商品，穿过一堆堆的书往前走去。

书，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啊！且看看它们的书名：《褐色眼睛多漂亮》、《塔木德经书和犹太人》，还有不值一读的诗集，仿佛传来了十五年前一个孩子的哭声。

这里有一个角落，看上去像个火灾遗址，家具好像被从燃烧的房子里抛到马路上：画着棋盘格子的橡木桌子，式样像戴包发帽和发饰的胡桃木餐柜，绿得刺眼的土耳其沙发，适用于放在骆驼背上的带扶手的软椅，靠背已经折断的很俗气的椅子。

一个好奇的人突然折回身去，差一点一脚踩到像鲜奶油一样的蓬松柔软的白色绣花皱边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陷进拉手风琴的人群中间，他们大概是去参加婚礼的，他们十分有礼貌地向我打了个招呼，又拉起了琴——这时在空中飘荡起呜呜

咽咽的手风琴声。

市场的有些场面是十分奇怪的。成千上万的人，一个个怀抱自己的财物，就像抱着从火中救出的婴儿。市场上经常发生火灾，其他的天灾人祸也是连续不断。难怪有关当局要将市场赶走，把它隔离开来，就像对付瘟疫区一样。如果对市场放任不管，它就会蔓延到城市，城市就会菌毛丛生。现在，集市就像一本突然用纸包起来的灰色小说，像一只只蒲包，一只只小麻袋，它们有时装着圣徒的传记，有时装着传奇故事，而有时装的是早已过时的规章制度。

像苏哈列夫卡这样的俄国集市市场，人满为患，它的残酷和悲哀就在于此。俄国人去赶集，不光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去凑热闹，给在城市里闲得发慌的双手找一点工作，让骂街、骂娘和对天发誓的笤帚揍打自己的背脊。他喜欢买卖时的公鸡般的争斗，紧追不放的大声喊叫。城市里，大家说起话来总是无精打彩；在这儿，说的话非常生动，它是自卫和进攻的武器，就像柜台下面到处乱窜的小艾虎。市场语言就像一头露出小白牙齿的未成年的猛兽。

像苏哈列夫卡这样的集市市场，只有在内陆，比如说，像北京或者莫斯科这样干旱的土地上才有可能生存。只有干旱的内陆土地才能经得起人们不停地跺脚，才能容纳洪水般泛滥的集市贸易，它像一张席子掩盖着这片土地。

突然，传来刺耳的哨声，商贩们把东西都收藏起来，捆扎起来，运到别处去。随着歇斯底里般的忙碌的消失，广场上变得空荡荡的。当布满蒺藜的、令人生畏的扫帚在木桥上横扫而过的时候，木桥也成了无人世界。

亚美尼亚之行

塞 凡 岛

塞凡岛以两处7世纪的具有纪念价值的建筑而著称，同样，一些窑洞也很有名，周围长满了荨麻和飞廉，洞里隐居着身上长满虱子的修道士，不久以前才死掉。这些窑洞比起别墅里的空地窖来，并不使人感到十分可怕。我在岛上住了一个月，领略了位于四千英尺高的湖色风光，看够了三四十个像花圃一样的陵墓，它们分散在修葺一新的各个修道院里。

每天五时正，满湖的鲑鱼就活蹦乱跳起来，好像有人往湖里投入了一把苏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气变化的催眠术，好像一个扶乩者在暂时平静的石灰水里首先放进顽皮的涟漪，然后是鸟的啼鸣，最后是狂暴的、丧失理智的思想。

这时，你无法拒绝自己沿着河滨浴场的小径走上三十步路，那浴场就在居涅河的对岸。

高契卡河流到这儿，形成河峡，有五条涅瓦河那样宽，

哗哗作声的凉风吹拍人们的胸膛，天上的云片移动得越来越快，拍岸的浪涛像一个早期的印刷工迫不及待地在紧锁双眉的天空下，用了半小时就印好了一本厚厚的《圣经》。

岛上的居民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孩子，他们像一头头小野兽在修道院的陵墓上爬来爬去，他们有时把树枝丢进水底，这些树枝在冰冷的水里不停地哆嗦，就像水蛇在游动一样。他们有时从潮湿的贫民区里带来资产阶级的癞蛤蟆和戴着珠宝头饰的游蛇。他们有时把一头绵羊赶来赶去，弄得它惊恐万状，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自己洁白的身体究竟妨碍了谁，于是只能在草地上颤动着自己浑身的脂肪。

生长在塞凡岛山丘的背风处的高高的青草又茂盛、又茁壮，真想用一把铁梳子将它们梳理整齐。

岛上埋着许多尸骨，就像《荷马史诗》里说的一样，它们是虔诚的、五短身材的村民们的残骸。

除此以外，岛上的道路都是用一块块从无主坟墓上取下来的火红色的墓石铺砌而成的，高高低低，摇摇晃晃，支离破碎。

我到了那里没过几天就有消息说，在扎马卡贝尔德的长形沙滩上，一些石匠在灯塔基座下挖坑的时候，挖到了古代乌拉尔图民族埋葬死人的瓦罐。我以前在埃里温博物馆里见过，一只双耳大陶罐里佝偻地坐着一具骷髅，头盖骨上钻了一个洞，说是为了把魔鬼放走。

清晨，我被一阵马达声吵醒了。这声音一直停留在原处。两个机械师在往汽缸里加燃料，要把熄了火的心脏重新点燃起来。可是，眼看快要修好了，发动机却像急口令似地说："没有喝饱，没有吃饱，没有喝饱，没有吃饱。"一下子火又熄了，像被浇灭了一样。

哈恰图良教授，他的脸上似乎绷了一层老鹰的皮，皮下的肌

肉和韧带都编了号码,并且都有拉丁文名称。他穿了一套奥斯曼式样的黑色长礼服,在码头上散步。他不仅是位考古学家,也是位天才的教育家。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那是一所设立在卡尔斯的亚美尼亚中学。他应邀走上苏维埃埃里温的讲坛,也把自己对印欧语系的理论的忠诚和对马尔[1]关于雅弗语的臆想的仇恨带了过来;当然,他同时也把俄语和对俄国的一无所知带了过来,因为他从未到过俄国。

我和卡里扬同志一起坐在一条汽艇上,勉强用德语交谈着,他曾经担任过亚美尼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看起来满面红光,命里注定要无所事事,只配抽抽香烟,读读无聊的小说来打发时间。他对自己的本份工作已经完全生疏了。寂寞无聊在他绯红的面颊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马达一个劲儿地嘟哝着:“没有喝饱——没有吃饱。”好像在向卡里扬同志汇报工作。小岛挺直了驮着八面体修道院的熊背,很快地向后退去。蚊群伴随着汽艇航行,我们在蚊群中飘浮,好像在早晨的果羹似的湖面上被一层薄雾笼罩着。

在坑里,我们果真发现了陶罐的碎片和人体的骨骼,除此以外,还找到了一把刀柄,上面刻着古代俄国商行的标记:N·N·。

同时,我郑重其事地把一只布满窟窿的石灰质的脑颅包在自己的手帕里。

无论在马耳他岛、圣赫勒拿岛,还是在马德拉岛,生活都充满着美好的期待。它既迷人,又有令人不快之处。大家从早到晚都是忙忙碌碌,拖着稍微嘶哑的嗓子,互相关心地问长问短,这比起筑有宽阔公路和享受着被否定的自由的大陆来,要好一些。

人们的耳廓变得很薄,而且产生了新的涡纹。

在塞凡岛上，我有幸结识了许多贵族出身的智叟，其中有德高望重的地方志专家伊凡·雅科夫列维奇·萨加捷里扬，有上面提到的考古学家哈恰图良；还有一位是乐天派的化学家冈巴良。

我认为，与其同青年人进行平淡无味的交谈，还不如加入这些老年人的平静的社会，听听他们香味浓郁的谈话。青年人只知道考试和体育运动，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化学家冈巴良说一口带莫斯科口音的亚美尼亚话。他对自己的俄罗斯化感到很高兴。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可是身体已经干瘦了，尽管如此，他体力充沛，运动很出色。

他全身抹着一层说不出名称的军用橄榄油，仿佛刚刚从部队的教堂里回来。顺便说一下，他从来不同那些杰出的苏维埃人来往。

他对待女人，就像用嘴唇亲吻玛丽亚的骑士马泽帕②，在男人的圈子里，他反对挖苦别人和讲求一味的自尊。一旦他卷入争论，他就会变得暴跳如雷，俨然是一个从法兰克王国归来的剑客。

山上的空气使他变得年轻了，他卷起袖子，奔到排球网前面，张开小小的手掌一下一下地击起球来。

“山上的太阳仿佛用香槟酒浇成的金元，躲藏在一口隐蔽的小橱里。”

一支玻璃的气温计小心翼翼地被传来传去。赫尔茨贝格大夫住在这座亚美尼亚的小岛上，感到寂寞无聊；他使我联想起易卜生戏剧的淡淡的影子和生活在别墅中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孩子们向他伸伸他们狭小的舌头，刹那间，就像伸出一小段熊肉一样。

最后，口蹄疫找上门来了。它是从远处的泽纳卢岸上运来的

牛奶桶里带过来的。在泽纳卢的阴暗的俄罗斯茅屋里，一些轻浮之徒早就停止了娱神活动。

由于成年人的过失，口蹄疫在不信宗教的塞凡岛的孩子们中间传染开了。

头发向上竖的、爱好打斗的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发起了高烧，低垂着脑袋躺在母亲的怀里或者睡在床上。

有一次，冈巴良为了跟一个共青团员比赛，竟然心血来潮，绕着塞凡岛游了一圈。六十岁的心脏毕竟承受不住；那个共青团员也感到体力不支，不得不离开同伴，返回起点，半死不活地扑倒在卵石滩上。塞凡岛内城的火山墙成了不幸事件的见证人，它们当然一点没有想到去营救受难者。

警报响起了。岛上没有小艇，尽管订购单已经寄出了。

岛上的人们到处奔走，都意识到这种不幸已经无法挽救了。手上没有读完的报纸像一张铁皮铿铿作响。塞凡岛仿佛一个孕妇在呕吐。

我们既没有电话，也没有跟对岸通信的邮局。一艘汽艇两小时以前已经开往叶连诺夫卡了，尽管拼命地竖起耳朵，也听不到水面上有一点点的马达声。

当以卡里扬同志为首的救护队带着毛毯、香槟酒和其他物品把冻僵的、然而脸上还挂着笑容的冈巴良从卵石滩上被抬回来的时候，人们都鼓起掌来。这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最动人的掌声，大家欢迎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变成一具尸体。

安排我们去旅行的诺拉杜兹渔船码头上，幸好没有听到合唱队的歌声。有一艘已经完工的平底船使我感到十分惊奇，它被架在船坞的木架上，外表还显得十分粗糙，大小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但是它流畅的、富有乐感的线条使我想起班杜拉琴的琴盒。

四周刨屑在飞旋。盐浸蚀着土地，鱼鳞像一片片石英在闪闪

烁烁。和诺拉杜兹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样，这里的合作社食堂也是用圆木垒起来的，供应的菜是大杂烩的羊肉浓汤。

工人们发现我们没有随身带酒，于是尽地主之谊，为我们每个人倒了一杯。

我从心底里默默地为年轻的亚美尼亚的健康，为它的每一幢橙黄色石块砌起的房屋，为长着一口白牙齿的人民委员们，为骏马身上的淋漓汗水和永不停顿的马蹄声，为亚美尼亚强有力的语言干杯。我们虽不会说亚美尼亚语，可是不该避而不说。

> 水，在亚美尼亚语里叫“朱尔”
> 农村，叫“居尔”

我永远不会忘记阿尔诺里季。

他的腿做过外科矫形手术，所以走起路来有点儿瘸，但是他非常勇敢，以致大家都羡慕他走路的样子。

塞凡岛主管学术的首长们住在莫罗勘教派聚居的叶连诺夫卡的公路两边。那里，在昏暗的科学执行委员会的楼房里，几张喝得醉熏熏的宪兵的嘴脸，像肥大的鲑鱼在一闪一闪。

唉，这些客人啊！

一艘美国快艇，像一把柳叶刀划开水面，打电报似地一下子把他们送上了塞凡岛，这时阿尔诺里季登上了岸，像来自科学世界的雷电，又像手捧一颗善心的帖木儿③。

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在塞凡岛上住着一个铁匠，他替它钉上马掌，并且为了和它一起思考问题，他上了岛。

深入到另一种族的社会中去，这是一件最有意义、更为快乐的事。你尊重他们，同情他们，在一旁为他们感到骄傲。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充实，粗野的温柔，气质高贵的勤劳的筋骨，对一切

形而上学的东西表示出无可名状的厌恶以及对现实世界表现出的不拘礼节的亲切态度——这一切都告诉我:你要振作精神,不要回避自己的时代,不要耍滑头。

是不是因为我置身在以沸腾的生活为光荣的人民中间?他们不是按照车站的时刻表,也不是按照机关的时刻表生活,而是按照日晷的时刻生活的,这种日晷,我在兹瓦特诺茨的废墟上见过,它的样子像天文轮和画在石头上的一朵玫瑰。

阿肖特·奥凡涅西扬

东方人民研究所座落在别尔谢涅夫斯卡亚沿岸街上,在金字塔形的政府大厦旁边。不远处,一个摆渡工在招揽生意,摆一次渡收三个戈比。一只单桅帆船已经载满了客人,水已经溢到桨架边上。

莫斯科河沿岸街上的空气又稠又粘,似乎饱含着淀粉。

一个寂寞无聊的亚美尼亚青年向我走来。在一大堆印着带尖刺字体的雅弗语书籍中间同样也存在着皮肤白嫩的少女,就像停留在仙人掌丛中的一只俄罗斯粉蝶。

我的兴趣没有使别人感到高兴。我请他们帮助我学习古亚美尼亚语,但这个请求并没有打动这些人的心,其中有一位妇女本身也对此一无所知。

由于错误的主观认识,我习惯上把每一个亚美尼亚人都看成语文学家……当然,一部分的看法还是对的。一些人即使在没有打开任何宝藏的情况下,也照样把语言钥匙弄得叮当作响。

我跟一个从梯弗里斯来的年轻研究生谈得很不投机,到了最后,变成了十分拘谨的外交辞令。

我们列举了一些著名的亚美尼亚作家的名字,也提到了马

尔院士，他刚刚从乌德穆尔特州，就是从伏古里斯克州途经莫斯科去列宁格勒。我们称赞了雅弗人的哲学思想，它渗透到任何一种语言的结构深处……

我开始感到寂寞，频频望着窗外一小块荒芜的花园，这时，一个中年人以一副独裁者的架势，神气活现地走进了图书馆。

他那普罗米修斯般的脑袋放射出烟青色的光芒，仿佛一盏功率强大的石英灯……他那一绺乌黑蓬松的头发又粗又硬，就像着了魔法的羽毛，具有树根般的力量。

这位黑皮肤的书呆子始终没有张开大嘴笑一笑，仅仅牢记一个词儿，那就是工作。奥凡涅西扬同志的脑袋具有一种躲开和对方谈话的能力，好像高山之颠，使人偶尔才想起脑袋的形状。可是，他戴了一副蓝色的石英玻璃眼镜，显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倒可以抵得上一丝微笑。

在亚美尼亚语里，脑袋叫“格卢赫耶”，在“赫”的后面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卢”的发音要软一些……像俄语一样，也有词根……那么，雅弗语的规则呢？请看：

看，听，理解——这一切意义都已经汇集在一束语义里。在产生言语的原始阶段里不存在概念，只存在趋向、恐惧和热望，只有要求和害怕。脑袋的概念历经上万年，才从一束模糊的语义里被塑造出来，充耳不闻成了脑袋的象征。

不过，读者，你反正弄不清楚，我也无法让你学会。

莫斯科河南岸市区

不久前，当我在雅基曼卡岛上已经变得灰暗的玫瑰色别墅的楼梯下面翻箱倒柜时，我找到了一本已经破损的西涅克④为印象主义辩护的书。作者在把创作说成是涂涂抹抹的同时，阐述

了“光学混合体规则”,提出了运用光谱色调的重要性。

他的论据就是被他敬若神明的德拉克洛瓦[5]说过的几句话。他常常找出德拉克洛瓦写的《摩洛哥之行》,似乎这本书对于每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欧洲人来说都是必备的视觉教育的法典。

西涅克吹响了印象派最后的集合号。他把北非的士兵、穿着阿拉伯式斗篷的男人和穿着红裙子的阿尔及利亚女人都召唤到色彩明朗的营地里。

当我听到第一声使人神经振奋的理论号角的时候,我感到这种新思想的颤动,好像有人在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觉得,我好像脱下了城里穿的那双沾满灰尘、马蹄般的鞋子,换上了穆斯林穿的平底软鞋。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没有见过比桑蚕还大的昆虫了。

优游自在闯入了我的枯燥乏味、杂乱无章的生活,我觉得生活似乎成了对彩彩不空的抽彩的淡淡的等待,我可以从中抽出所需的一切:一块草莓肥皂、印刷业开山鼻祖邸宅中的档案室里的一只座位或者是一张梦寐以求的去亚美尼亚旅行的车票。

我们本当理直气壮地用十分礼貌的语气和读者们谈谈关于现在的情况,不知为什么我们把这种态度让给了写回忆录的作者。

我认为,这是出于缺乏耐心。我生活中一直缺乏耐心,而且常常更换皮肤的颜色。

娃娃鱼对自己背上的黑色和黄色的斑点从未产生过怀疑。它没有料到,这些斑点或是像两串链子,或是汇合成一条宽宽的带子,都取决于沙子的潮湿程度,取决于饲料箱的裱糊材料的色彩是欢快明亮的还是阴晦暗淡的。

可是,有思维能力的娃娃鱼,如同人一样,能够预测翌日的

天气。人如果能决定自己身上的色彩就好了。

我的邻居是一户当地的居民，全家人都不苟言笑。上帝没有将能点缀生活的和蔼热诚赐于这些人。他们手挽着手走进热气腾腾的消费协会，撕下供应卡上他们已读了无数遍的日期，终于露出了笑容，好像在说："果泥。"

他们的房间布置得像个出售手工艺品的商店，摆着各种各样表示亲族关系的标志、表示长命百岁和忠于家庭的标志。他们还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白象、工艺精美的狗和贝壳。他们也祭祀亡灵，对于不在眼前的人也表露出一定程度的尊敬。原来，这些面孔铁板、毫无表情的斯拉夫人都在照片一样大小的祈祷室里吃和住。

我庆幸自己不是生在这里，仅仅是一个偶尔到莫斯科河南岸市区来的过客，不会把最美好的年华消磨在这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到俄罗斯像挖空的西瓜那样的空虚。莫斯科河上的夕阳的红砖色彩和茶砖的色彩，使我想起了阿拉拉特高炉喷出的红灰。

我真想赶快回去，那里，人的头颅，无论在棺材里，还是在劳动中，都一样的美丽。

但愿在我的周围不要再有住着卑鄙小人的、偷偷挖个窗洞的、但却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屋。就在七十年前，这里出卖女奴，她们会缝衣，会刺绣，又听话，又聪明。

院子里，两株苍老的、干枯的椴树，竖起棕褐色的树杈，它们的树干像炮筒子那样粗，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明白。时间用闪电，用雨水喂养它们。雷雨也好，溴剂也好，它们都无所谓。

有一次，一群定居下来的成年男子决定砍下老椴树，劈开来当柴烧。

他们先在树身上砍出一条深沟，然后斧子对着默默无言的树根一斧一斧地砍去。伐木工的劳动要求熟练的技能。来了很多志愿者，他们手忙脚乱，好像在笨手笨脚地执行一件见不得人的判决。

我把妻子叫过来说："看吧，它马上要倒下了。"

这时，树使出全部力量反抗着，仿佛恢复了全部知觉。它毫不理会凌辱它的人和钢锯那狗鱼般的牙齿。

最后，他们用一根细绳索套到这棵树的枝桠上，开始轻轻地摇动。树摇晃了起来，好像继续躺在牙床上的一颗摇摇欲坠的牙齿。刹时间，孩子们都跑到被推倒的偶像跟前。

这一年，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要求莫斯科大学向它推荐派往埃里温的人选。主要任务是到那里调查胭脂虫的出路问题，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昆虫。如果将胭脂虫烘干并磨成粉末，就可以从中提炼出质量上乘的胭脂红颜料。

很有学问的、年轻的动物学家勃·斯·克终于被大学选中了。勃·斯和他的老母亲住在大雅基芒卡街上。他是一名工会会员，总是昂首挺胸，傲视着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来来往往的人。在学院派的圈子里他只敬重老头儿谢尔盖耶夫，因为他曾经亲手制作了许多陈列动物学图书的高大的红书橱，并且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闭着眼睛，用手一摸，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些书橱是用橡木、桦木还是松木制成的。

勃·斯从来不是啃书的蛀虫。他进行科学研究十分轻松自如，跟以研究娃娃鱼著称的维也纳的教授、后来自尽身亡的卡缅列尔有过某些交往。他最爱听巴赫的音乐，尤其是一首用管乐器演奏的创意曲，它的音乐腾空而起，仿佛一串哥特式的烟火。

勃·斯是一个周游过苏联的经验丰富的旅行家。在布哈拉，在塔什干，都有他穿着野营服的身影，都响起过他的富有感染力

的笑声。他到处广交朋友。不久以前，一个伊斯兰毛拉，后来安葬在山上的信徒寄给他一份用法尔斯语写的正式通知，说他不久即将归天。根据这位毛拉的看法，这个品学兼优的年轻人在耗尽全部精力和繁衍大量后代之后——而决不在这之前——应当跟他会合在一起。

光荣属于活着的人！任何劳动都是可敬的！

勃·斯磨磨蹭蹭地做着去亚美尼亚的准备工作。他到处奔波寻找用于搜集胭脂虫的麻袋和木桶，抱怨有些官员耍滑头，故意不给他包装材料。

生离和死别是一对姐妹。为了让人承认命运因果，且看在送别的路上，在婚礼的欢乐里，就往往蕴含着不幸。

外面的门不停地呯呯嘭嘭，关上了又打开，从狭小的楼梯上陆绎不断地来了客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是苏联航空学校的学生——一群无忧无虑的空中骑士，来自远方的生物实验站的研究人员，研究山顶湖泊的专家，曾经到过帕米尔高原和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其他都是一些年轻人。

一只只酒杯里斟满了莫斯科葡萄酒，女人和姑娘们婉言推辞。蕃茄汁四溅，大家乱哄哄地交谈，谈到航空，谈到越拉越紧的死扣，谈到当你一不注意被别人打倒在地的时候大地就会像一块巨大的褐色天花板砸在你的头上，谈到塔什干的物价飞涨，谈到萨沙大叔患了流行性感冒；反正海阔天空什么都谈……

有人说，在雅基芒卡街的底下躺着一个残缺不全的青铜人，他现在还活着：喝酒，看报，兴致勃勃地玩骨牌，到了晚上就卸下一条木腿，枕着它睡觉。

第二个人拿雅基芒卡的第欧根尼⑥和封建时代的日本女人作比较；第三个人大声嚷道，说日本是间谍和自行车的王国。

谈话的主题稍纵即逝，仿佛一枚悄悄传递的戒指。棋盘上的

马总是被搁在一边，成了餐桌上谈话的主宰。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年轻的女旅行家外出进行科学考察，五天五夜躺在塔什干火车的硬铺上，她非常通晓拉丁语，在拉马克主义者和后成论者⑦的争论中有自知之明，对佐料，对掌声和寂寞都毫不介意，那么，这个女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魅力。

桌子上充斥着结构华丽的句子，它们前后颠倒，字母罗列，语法错误，就像一株株杂乱无序的野花，就像植物存在的学前形式渗和到全元音的诗选中。

童年时，我出于愚蠢的自尊和虚伪的傲气，从来不去采蘑菇，也不弯下腰去拾蘑菇。我更喜欢哥特式尖顶似的松针和戴着僧帽的虚情假意的橡实。我抚摸着松针，一根根刺立刻竖了起来。它们是善良的，赢得了我的信任。它的外刚内柔的性格和漫不经心的几何图形，使我学到了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后来，这个建筑艺术的魔鬼伴随着我的一生。

我几乎没有机会去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坐着汽车沿着斯摩棱斯克公路，驶过用圆木垒起的胖乎乎的农舍，一直到乌兹科耶村，路上不知要花多少时间。我看见农舍旁边堆放着菜农们储备的蔬菜，它们活像一颗颗插上绿色导火线的圆形炸弹。这些大量囤积的浅绿色的蔬菜炸弹，远远看去就像韦列夏金⑧单调乏味的画面上的用骷髅垒起的金字塔。

今非昔比，大转折时期到了，一切都为时已晚。

那还是去年的事情。我住在亚美尼亚的塞凡岛上。我一边在长得齐腰高的草丛中散步，一边不禁为火红的罂粟花所倾倒。它鲜艳得如同创口上流出的血。它的花容仿佛是向人们展示貌似科季里昂的舞姿，它的花朵对于我们这个星球来说，实在太大

了。它们好像一只只不怕火焚的咧开大嘴的螟蛾，生长在令人厌恶的毛茸茸的茎干上。

我羡慕孩子……他们在草丛中兴高采烈地追逐罂粟的翅膀。我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去……双手捧起一团火，就像有一个铁匠借给我一捧通红的炭。

有一次我在阿布哈兹看见满地散落的北方草莓。

在海拔一百英尺的高处，一片片幼林盖满了山丘。农民们在耕耘甜美的红土，挖出一个个小坑，准备栽种秧苗。

当我见到北方夏天里的珊瑚般的钱币，我心里真的十分高兴。一串串含有丰富铁质的成熟的野果，像三弦琴、五弦琴一样，挂满了枝头，对着乐谱齐声歌唱。

就这样，勃·斯，您带头离开这里走了。由于种种情况，我还不能与您同行。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变。

您在斯潘达里扬街 92 号落了脚，住在殷勤好客的捷尔-奥甘扬的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我冒着年轻的埃里温出名的建筑工地上呛人的尘土，沿着斯潘达里扬街跑来找您。阿拉拉特谷地到处高高低低，到处都在进行规模宏大的整修，整个城市好像被自来水管道工们彻底翻了个身。这里的人嘴巴很大，深陷的眼窝好像就在脑壳上钻了两个洞，那就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我对这一切感到新鲜好奇。

我走过干涸的抽水站，走过音乐学院，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排练四重奏。只听见一位教授生气地叫着：减弱，减弱！这就是说，你们的动作要由强到弱，转入柔板。我正走近你们的门口。

那不是大门，而是祖屋里又长又阴凉的地道，走进里面，就像走进一支单筒望远镜。长满青草的小院子微微泛出油油的绿

光，按理现在的季节不应该这样暗淡，小院好像被硫酸灼伤了一样。

这里缺少盐。你想找一些板框油墨，可是找到的都是用来涂油墨的皮垫。这就是亚美尼亚。

在小阳台上，您拿出一只波斯产的文具盒给我看，上面用金里透红的颜色漆着一幅风景画。房间里空荡荡的，显得很寒碜，我真想闻闻令人肃然起敬的、然而散发出霉味的墙壁；这里曾经是酋长们的法庭，不需几分钟就能作出剜目的判决。

过了一会儿，您又走进捷尔-奥甘扬家昏暗的房间，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支试管，给我看了里面放着的胭脂虫，它们像一粒粒火红色的豌豆躺在一小块棉花上。

这管试样您是从离埃里温二十公里的鞑靼人居住的农村萨尔凡拉尔搞到的。从那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阿拉腊山。在边境线的严峻气氛里，您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成了一名走私贩子。您一面笑着，一面对我说，在萨尔凡拉尔有一户对您非常友好的鞑靼人家，家里有一个长得很漂亮、但十分贪吃的小姑娘……她的调皮的小脸蛋上总是抹着一层酸奶，小手指被羊酪涂得油光光的……尽管您对饮食从不挑剔，但是在他们家里吃饭的时候，您还是悄悄地为自己留了一片面包，因为那个嘴馋的小姑娘把两条小腿安在面包上，就像踩在凳子上一样。

我端详着您额头上的异教徒的皱纹像拉手风琴一样，一会儿收紧，一会儿展开，这是您身体上最能表现崇高精神的部分。这些似乎被羊皮帽子磨出来的皱纹是对每一句意义深刻的话的反映。它们在额头上精神十足地、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我的朋友，在您的身上有一点戈东诺夫⑨和鞑靼人的影子。

为了对您进行评价，我做了一番比较，我更加深入领会了您的反达尔文主义的实质，研究了您那长长的、比例不相称的手臂

所表示的生动的语言，您的一双手天生就是用来在危险时刻同别人握手以及在走路时用来激烈反对自然选择的观点。

在歌德[10]的《威廉·麦斯特》里有一个小人物，名叫亚尔诺，是一个好嘲笑人的人，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一连几个星期躲在示范世界的大庄园里，在塔楼的房间里过夜，睡在冰凉的床单上，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从内心善良的城堡的深处走出来。

这个亚尔诺是大地主奥塔尔建立的秘密团体的一员，旨在用《浮士德》第二部中所展示的精神去教育同时代人。这个团体拥有庞大的情报网，一直扩展到了美国，它还有一个接近于耶稣会的组织。它有一本秘密的操行簿，把触角伸向四处，网罗各方人士。

亚尔诺正是接受委托对麦斯特进行观察的人。

威廉带着可怜的玛丽安娜的儿子菲利克斯到处漫游。苦修的戒条规定，在同一个地方不得连续住三昼夜以上。脸蛋红扑扑的费利克斯是个严格按照教学法行事的孩子，他采集植物标本，大声地叫着：告诉我，父亲。一刻不停地向父亲提出各种问题，他掰下一块块岩石，还结交了许多点头朋友。

一般说来，歌德的作品里有许多自甘寂寞、品行端正的孩子。歌德笔下的孩子们都是埃罗斯[11]这样的小爱神，有求知的欲望，肩上背着箭袋，里面装着有的放矢的问题。

在山上，麦斯特遇见了亚尔诺。

亚尔诺从麦斯特手里夺走了三天期限的许可证。往前或往后，等待他们的都是分离。那就更好啦！在森林大学里，地质学家讲课的回声就会更加响亮！

这就是为什么口头训诫射出的温暖的光线、清晰明了的教学方式和友好的交谈，大大胜过书本的规劝和教诲。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在埃里温的一次谈话，那次谈话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可是到了今天已被我个人的经验证明是毋庸置疑的，它具有可信性，有助于我们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传说中的境界。

那是关于"胚胎场理论"的一次谈话，这个理论是由古尔维奇教授提出来的。

金莲花的叶芽呈斧钺状，或是像被拉长的二尖瓣的子囊，然后渐渐变成叶舌。它也像旧石器时代的燧石箭头。但是，叶片周围的强大的张力把叶片改变成五瓣全裂片。就像洞穴顶端的边缘产生一种呈弧形的拉力。

请你取任何一点，并且用坐标束把它和一条直线联结起来，然后延伸坐标，从各个角度等距离地截断直线，再将各段直线联在一起，就形成凸变。

然而，力场接下去就开始改变自己的运动，向几何极限——多角形的形式演变。

植物，它用一种用音棒敲奏出来的声音，微微发出颤动的音波。它是宇宙中永远轰鸣着的雷雨的使者，和岩石、和闪电亲密无间！世界上的植物，是事件、变故、利箭，而不是蜗行牛步似的发展！

不久以前，一个作家[12]公开忏悔，说他曾经是个故意卖弄词藻的人，至少也是一个不遗余力向这方面刻意追求的人。

我认为，但丁[13]式的地狱已经在它的第七层里为他预定下了位子。那里生长着流着鲜血的黑刺李。如果有一个旅行者出于好奇想去折断这个自杀者的枝条，它就会用人的声音说："别碰我，你会给我带来疼痛！难道你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我们曾经是人，而现在是树……"

黑色的血，在一滴滴地落下来……

是哪一个巴赫，是哪一个莫扎特在变奏着金莲花叶片的主题？……最后，突然冒出来一个句子："绽开的金莲花的荚果的世界速度。"

谁不对象棋棋手产生羡慕？你站在棋室里会看到那是使失败者浑身寒栗的独特战场。

这些用象牙做成的波斯骑兵已经沉浸在力量的溶液里，它们的遭遇就像莫斯科生物学家叶·斯·斯米尔诺夫园圃里的金莲花，就像古尔维奇教授的胚胎场一样。

在充满着急风暴雨的国际象棋比赛中，每下一步棋都对所有的棋子构成威胁，棋盘紧张得瞪大了眼睛，当一束灯光集射到棋子身上的时候，它们一下子变得高大了，犹如初秋的疝疼乳菇一样。

纸上谈兵，或者关在研究因果关系的黑屋子里，都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而是应该走到印象派中间，走到爱德华·马奈和克劳德·莫奈[14]的充满空气、阳光和荣誉的殿堂里。

我们的血能放出分生射线，这种射线被德国人收集到录音片里，据说，它能更有力地促进纤维的分解。这是真的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都成了重大的胚胎试验的载体，要知道，以记忆的胜利而结束的回忆过程，跟人的生长现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什么地方，幼芽、胚胎——面孔的特征，或一部分性格、一部分声音、名字的结尾、唇音、上颚音、舌头打转时发出的甜甜的颤音——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本身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而是对别人的邀请的回答，是为了证明自己在等待而迎面相立。

我希望能把勃·斯这些过时的观点作为一部分礼物送给你们，因为我妨碍了你们在埃里温的棋赛。

苏呼米[15]

4月初，我到了苏呼米，这是一座穿着丧服、弥漫着烟草和芳香植物油气味的城市。从这里开始应当好好学习高加索语的字母表，它的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a”，阿布哈兹人的语言很有力，都是全元音，上喉音和下喉音混在一起，特别重，使得发音很困难。可以这么说，这些音都是从长满毛发的喉咙里滚出来的。

虽然，我设想在遥远的将来学习高加索语的学校一定会遍布全球，但是我仍然担心能教我学话的那头叫巴卢的善良的熊还没有出世呢，它曾经教会来自热带丛林的男孩毛格利说十分动听的阿普斯内语。欧洲和美洲的语言矿藏快要开采完了。它们的矿层是有限度的。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在读译成世界语的普希金作品。各有所爱。

可是，这是多么严重的警告啊！

从一座名叫契尔尼亚夫斯基的山头上，或者从奥尔忠尼启则广场上看去，苏呼米一览无遗。它地形平直，建造着许多殖民地疗养院的胸脯上下起伏，将弯成弓形的大海抱在自己的怀里。

苏呼米位于山脚下，仿佛一支圆规插在一片天鹅绒上，它刚刚描好海湾和山丘的眉弓，就合上了两条细腿。

虽然在阿布哈兹的社会生活里有许多天真的粗野和舞弊行为，但是这个不大的沿海国家表现在行政和经济上的优美雅致使我流连忘返。它为自己拥有珍贵的土壤、黄杨树的森林，在新阿丰上的盛产油橄榄的集体农庄和特克瓦尔切利斯克的优质煤炭而感到自豪。

玫瑰的刺穿过手帕螫人，长着像古老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常被捉弄的幸运儿的灰色嘴脸的温驯的小熊尖声地叫着，叫声划破了玻璃窗。一辆辆崭新的汽车从海上滚滚而来，用它们的轮胎切开四季常青的山坡……用棕榈树皮拉成一丝丝灰色的韧皮纤维，用来做舞台上的假发。在公园里，龙舌兰像一枝枝五普特重的蜡烛，每天以一俄寸的高度往上长。

列伊慷慨激昂地宣传吸烟的种种害处，用父亲的口气数落一个花匠。有一次，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问题：

"在1919年的基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想援引马克思在波列和弗吉尼亚的窝棚里写下的《资本论》里的话。

我在几个沉默寡言的拉脱维亚人的伴同下，步行了二十俄里，一路上，心里展开了对当地地形的遐想。

主题：一溜慢坡的火山丘陵直奔海边，专供步行。

变奏：绿色的山泉从一个山头流到另一个山头，而每一道新的水畦都把凹地紧紧地锁住。

我们下山向德国人那边走去，进入火山口，几条警犬冲着我们狂吠。

我曾经在高加索语文爱好者协会会长贝利亚家里作过客，向他转达了塔尔塔林和军械技师科斯捷卡里德对他的问候。

他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普鲁旺斯人啊！

他抱怨创造阿布哈兹语的字母十分困难。他怀着敬意对我说起彼得堡的叶夫列伊诺夫，他在阿布哈兹的时候，对把山羊当作偶象崇拜十分感兴趣。贝利亚还抱怨说，由于离梯弗利斯很远，在这里，认真的科学研究很不普及。

男人们爱听桌球的坚脆的撞击声，就像女人们爱听象骨织

针在编织时的节拍一样。肆意捣乱的桌球杆击碎了球台上的三角，四个布柳赫尔军团的勇士，像兄弟一样聚到一起，一面爽朗地笑着，一面轮流击球，表现出非凡的技巧。

几个老共产党员也不甘心落在他们后面。

站在阳台上，透过军用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见像桌球台上的绿呢一样的、游移不定的浸水草地上的小路和看台。一年一度的考验耐力的跑马比赛就在这里举行。谁都可以参加。

一群骑马的长老簇拥着获胜的小伙子。

分散在方圆几俄里的同族的乡亲们非常熟练地用长竿把一块块湿巾挑给大汗淋漓的骑手们。

在远处的浸水草地上，一座灯标像钻石一样在闪烁。

有一次，我见到发出磷光的瓢虫跳着死亡和交尾之舞。乍看上去，似乎是飘忽不定的细烟卷上的火星，可是，它们在空中划出的龙飞凤舞的字体是那么大胆、任性和粗犷。

天知道，它们会飞向何处！

走近一看，那群浑身通电，狂飞乱舞的蜉蝣在互使眼色，在不停地颤动身子，在慢慢地爬行，在吞噬着眼下最不值钱的、已经腐烂的书页。

如果我们不在自己身后留下自身存在的物质证明，那么我们结实而沉重的躯体也会像它们一样腐烂，我们的活动也会像这样，变成一片混乱的信号。

生活在只有感叹号和感叹词的世界上是多么可怕啊！

一个举着玩具哑铃的无名大力士长着圆圆的脑袋，他是个温厚的、喝过几滴墨水的铁匠，不能说他是铁匠，而是一个鸟贩子，甚至也不是鸟贩子，而是一个贩卖拉普[16]汽球的人，他的背越来越驼，总是用自己的一双碧眼盯着别人。取之不尽的歌剧剧目在他的喉头翻腾。花园音乐厅中，仿佛高加索矿泉一般的激情

始终和他形影相随。他是心中藏着曼多林琴的懒汉，躺在浪漫曲的琴弦上，心儿在留声机的唱针伴奏下，轻轻歌唱。

法　国　人

我拉长视线，将眼睛浸泡在大海的酒杯里，让眼里的沙子和泪水都能流出来。

我拉长视线，就像抻长一副鞣皮手套，并且将它紧紧地套在楦头——蓝色的大海上。

我带着封建的狂怒，用狡黠的目光匆匆打量着视野所及的领地。

于是，我把眼睛浸入斟满海水的大酒杯里，让沙子流出来。

我开始懂得，色彩的这种义务，赋于淡蓝色和橙黄色的背心以蓬勃的朝气，这种色彩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起跑的感觉，它被距离涂上颜色，并且被归结为容量。

博物馆的时间走得像沙漏一样。偶尔出现几块残砖，小酒杯里已经没有酒了，而在那里，从上边的小书橱到下边的玻璃瓶都吹着一缕缕金色的西蒙风[17]。

你好啊，塞尚[18]！可敬的老人！你是伟大的劳动者。你是法兰西森林中最好的槲实。

他的写生画放在乡村公证人家里的橡木桌上，被证明是真的。他是坚定的，如同头脑清醒时凭着牢靠的记忆写下的遗嘱。

可是，我对老人的静物画却情有独钟。玫瑰花应当是早晨采摘的，尤其是刚刚绽放的芳香月季更显得丰满、壮实。黄澄澄的奶油冰淇淋球和真的一模一样。

因此，我不喜欢马蒂斯[19]，他是富豪们的画家。他的油画上的红颜料发出苏打的吱吱声。他不知道果实成熟的快乐。他的

如椽之笔不能治愈他的视力，只能给予他公牛般的力气，所以他的眼睛一直流着血。

这些棋盘似的地毯和宫女真叫我看了生气。

这些巴黎教师就像波斯国王那样的苛刻！

梵高[20]的廉价颜料是化了二十分[21]的钱偶然买到的。

他咯着血，就像一个从带家具的出租房间里走出来的自杀者。夜咖啡馆里的地板在疯狂的电光中，像一条水槽在下倾，在流淌。桌球台狭窄的木槽就像一口棺材。

我从未见过这种狗吠似的色调！

他的那些菜园的风景画啊！他们就像刚刚用湿布将市郊火车上冒出的油烟从画面上拂去。

被人间灾难涂得一塌糊涂的油画就像一份直观教材——贝尔里茨中学里的地图，十分引人注目。

参观者像走在教堂里一样，移动着小碎步。

每一个展室都有自己的气候，在克劳德·莫奈的展室里弥漫着河上的空气。你望着雷诺阿[22]的河水，会感到手掌上似乎有被船桨划破的涟漪。

西涅克[23]创造了玉米的太阳。

画展的讲解员带领着一群群众文化工作者参观。

你一看就会说，这是一块磁石，把一只只小鸭吸了过去。

奥藏方[24]的创作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在黑色的石板上用红粉笔和白石笔画出玻璃吹嘴和脆薄的实验室器皿。

除此以外，毕加索[25]的蓝色的犹太人和皮萨罗[26]的灰红色的林荫道也在向你致意。那林荫道仿佛举着鞭竿的马车拖着抽彩的轮盘转，在那摊亭和栗树上是向四处飞溅的脑髓的碎片。

难道这还不够吗？

总结已经在敲着门。

我建议一切从幼稚的现实主义的无害的瘟疫中解救出来的人们用这种方法去观看这些画作。

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进入小教堂，不要麻木，不要变得冷漠，不要粘在画布上……

要像在林荫道上散步一样——完全彻底！

要冲破油画空间温度起伏的大浪。

要保持平静，不必急躁，要像鞑靼男孩们在阿卢什塔河给马洗澡一样，将月光投入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里，并且记住眼睛是高尚的，然而又是固执的生命体。

站在画作前面，你还来不及把它跟你的视线的温度进行比较，那晶状体还没有为它找到唯一合适的调节作用，如同站在双层玻璃窗外穿着皮大衣唱小夜曲一样。

只有当取得平衡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修复图画的第二阶段：清洗、揭去陈旧的、被后人弄得粗糙不堪的表层。这表层就像一切物质一样，把画和太阳凝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

眼睛是具有音响效果的器官，它能提高形象的价值，增加令自己感到遗憾的感觉，它守着这种感觉，就像守着彩画的袋子一样。它带着微妙的酸性反应把画举到前面，因为一幅风景画在极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分泌现象，这是和统觉，也就是和外部知觉相比较而言的。

风景画的材料收支基本平衡，和大自然的区别就在于此；然而，印数的概率和它的可行性却成反比。

深入了解图画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与构思的面质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眼睛就像一个旅行家，把自己的外交证书交给了感觉。这时，在观众和图画之间订立了一个类似保守外交秘密的无形条

约。

我从绘画使馆里走到街上。

我走在法国人后面，立刻感到那是正在消失的日食状态下的阳光，太阳似乎被裹在一张银箔里。

合作社门口站着母子二人。儿子面容憔悴，十分恭敬，两人都戴着孝，母亲正把一串四季罗卜塞进手提包里。

街的尽头，仿佛被望远镜压扁了一样，变成一条线。这一切多么遥远，多么不真实，一古脑儿被塞到了绳网里。

在自然科学家周围

拉马克手持长剑为大自然的荣誉而战斗。您以为他会轻易跟 19 世纪的科学野人——进化论者握手言和吗？我认为，为大自然感到羞愧的火焰在拉马克黝黑的面颊上燃烧。他不会宽恕被称作物种变异的对自然界的胡说八道。

前进！Aux armes！[27]让我们洗刷掉自己身上的进化论的耻辱。自然科学的分类学家们(林耐、布丰、帕拉斯[28])的著作对人的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使眼光变直，使心灵矿化、石英化，变得异常平静。

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帕拉斯描绘的俄罗斯：农妇们从含矾的桦树叶中挤出染料。椴树皮自己剥落下来，露出了内皮，编成树皮鞋和箩筐。农民们把稠稠的煤油当成药用油使用。楚瓦什人扎在辫子上的坠子丁当作响。

谁不喜欢海顿、格鲁克和莫扎特[29]，谁就根本不理解帕拉斯。

他把德国音乐中的立体的浑圆和热情移植到俄罗斯的平原上。他用首席乐师的白净的手采摘俄罗斯的蘑菇。受潮的麂皮，

腐烂的丝绒，如果把它们撕开，里面是一片碧空。

现在来谈谈生理学的问题。这似乎是内容丰富，永远谈不完的，然而又是禁止人们谈论的一个主题。在一切物质中，书本是唤起人们最大信任的物体。放在阅览室书桌上的书本就像绷在木框上的画布。

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活动里去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去欣赏自己同类的特点，似乎为自己各年龄阶段的分级感到分外高兴。

如果林耐、布丰和帕拉斯将我的成熟染上颜色，那么，我将感谢鲸鱼，因为它唤起我对于科学的幼稚的惊讶。

在动物博物馆里：
滴滴……滴滴……滴滴……
——猫哭红了经验主义的试验。
还是请你们把龙头拧紧吧！
够了！

我和达尔文订立了休战协定，将他放到假想的书架上，让他和狄更斯[30]并肩而立。如果他们在一起用餐的话，那么匹克威克先生一定会加入进去的。我不能不被达尔文的善良所吸引。他不是一个故意装出来的幽默家。他天生能根据情况制造幽默（幽默总是伴随着他）。

然而，难道善良就是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感受生活的确当方式吗？

沿着生命的阶梯，和拉马克逆向而行的有伟大的但丁。有机

体存在的最低级的形式，就是人的地狱。

蝴蝶的灰色长须具有多芒的结构，活像法国院士服领口上缀的小树枝，或者是放在灵柩上的银色棕榈。发达的胸脯像只小船，脑袋长得像猫头一样小。

它的一对鲜艳夺目的翅膀是用老海军上将专用的上好丝绸做成的，它参加过切什梅湾的特拉法尔加的海战。

于是，我突发奇想，用这头怪物画出的眼睛看一看大自然。

拉马克感觉到在生物纲目之间存在着鸿沟。他听见进化过程中的停顿和切分音。

拉马克把眼睛哭得像放大镜一样。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是唯一的莎士比亚式的人物。

看吧，这个满脸通红，不怎么值得尊重的老人沿着生命的梯子往下跑，就像一个受到部长亲切接见或是得到情妇青睐的年轻人。

没有人，甚至包括臭名昭著的机械论者在内，把生物体的发育过程看成外部环境变化无常的结果。因为这种观点实在太狂妄了。外部环境只是促进生物体的成长。它的作用表现在某种有利于生物体的倾向上。这种倾向逐渐地、不断地被联系着生命体的，同时又将死亡馈赠于它的严酷现实所扑灭。

因此，生物体对于环境而言，是一种可能、期望和等待，而环境对于生物体而言，是一种促进力量。与其说是外壳，不如说是挑战。

当乐队指挥用小棒延长音乐主题时，他并不是声音的物理原因。音响早就体现在交响曲的总谱和演奏者们自发的默契上，早就存在于坐满听众的大厅和各种乐器的布局里。

拉马克拥有寓言中的野兽。它们适应生活环境，像拉封丹[31]的寓言里描写的一样。白鹭的双肢、鸭和天鹅的头颈、食蚁兽的

舌头、某些鱼类的对称和不对称的眼睛结构。

可以这么说，拉封丹奠定了拉马克学说的基础。他那卖弄聪明，劝人为善，深明事理的野兽是进化论最生动的材料，它们已经在相互分配进化论的委任状。

偶蹄目哺乳动物的理性给自己的爪趾套上圆形的角状物。

袋鼠用符合逻辑的跳跃移动自己的步伐。

拉马克描述的这种带口袋的动物是由原谅自己无能软弱的前肢和坚信自己重要性的发达的后肢，以及强有力尾巴构成的。

孩子们已经摆开阵势，要在克雷洛夫[32]爷爷，不，要在拉马克-拉封丹的进化论的山脚下玩堆沙子游戏。进化论在卢森堡花园里为自己找到了避难所，它的四周滚满了皮球和羽毛球。

我喜欢拉马克怒发冲冠的样子，瑞士人的一切枯燥无味的教学法被砸得粉碎。《马赛曲》闯进了《自然界》的概念。

雄性反刍动物脑门碰脑门。他们头上还没有角。

愤怒引起的内部感觉把“精神流质”注入脑门的胚芽，这种流质能促进角质和骨质的形成。

我脱下帽子，请我的老师走在前面。他那善辩的口才仿佛阵阵春雷，是永远不会停歇的！

“还将”和“已经”是拉马克思想的两个闪光点，也是进化论的卫士们、形态形成学说的信号手和倡导者们的两个闪光点。

他属于老一代的调音师，他们总是在别人的房子里用瘦骨嶙峋的手指丁丁冬冬地弹着钢琴，他只被允许弹奏半音阶的音符和童声的琶音。

拿破仑御准他把大自然的弦调准，因为他认为大自然是他皇上的私有财产。

在描述动物界的过程中，林耐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继承关

系和对集市上的圈养动物的某种依赖性。流动售货棚的老板或者被雇佣来的敲边者千方百计展示商品的正面。这些吆喝者很少想到，他们将不得不在古典自然学流派的产生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他们到处肆无忌惮地制造谎言，胡说什么自己吃不饱肚子，并且为自己的这种花言巧语所陶醉。职业经验和手艺的坚实传统也许会使他们时来运转。

林耐小时候住在乌普萨拉小镇上，非去赶集不可，耳朵里总要听到流动动物园的宣传。他和别的孩子一样，站在穿着高筒皮靴、手持皮鞭的有学问的强壮小伙子面前，站在挥动着红红的大拳头、对美洲狮赞不绝口的离奇的动物学博士面前。

当我将瑞士自然科学家的重要创造和市场上吆喝者的花言巧语联系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有打算去贬低林耐。我只想提醒诸位，自然科学家是职业说书人，是各种新奇形态的公开演示者。

林耐所著的《自然系统》里着色的动物照片可以和描写七年战争的油画，和描写浪子的石印画挂在一起。

林耐用最柔和的色彩涂在猴子身上。他把自己的画笔蘸上中国颜料，画出棕色和红色的辣椒、番红花、油橄榄和樱桃汁。他完成这项任务十分得心应手，感到非常愉快，像一个正在替小市民先生刮脸的理发师，或者像一个把大肚子研钵放在膝盖上磨咖啡的荷兰主妇。

林耐的猴舍亮如白昼，令人神往。

亚当将巴格达的魔术师和中国的和尚召到自己身边，请求他们帮助，给哺乳类动物颁发奖状。

波斯的小型彩画斜睨着受惊的扁桃状的大眼睛。

它，纯洁无邪，却肉欲强烈，深信生活是宝贵的，是不可剥夺

的恩赐。

我爱伊斯兰的珐琅器皿和浮雕宝石！

我继续自己的比较：美人炽热的丹凤眼温存地斜睨着读者。晒焦的手稿像苏呼米的烟叶，发出喀嚓喀嚓的脆裂声。

为了这种娇气，不知道流了多少血啊！征服者竟拿它来恣意取乐！

豹长着受处罚的中学生的狡猾的耳朵。

垂柳弯成一个圆球，在迂回，在飘浮。

亚当和夏娃穿着最新的迷人时装，在一起商讨问题。

地平线已不复存在。没有远处的景色。令人迷醉的不可捉摸性。狐狸爬坡的优美步姿和园丁依赖自然景色和建筑物的感觉。

昨天，我读了菲尔多西[33]的诗作，仿佛看见有一只熊蜂正在吮吸着这本书。

在波斯的诗篇里吹着中国送来的风。

它用银色大勺舀取长生不老之水，赠给想活三千年或五千年的人。所以，捷姆迭特王朝[34]的帝王都像稻草人一样长寿。

菲尔多西最喜爱的人在不知做了多少年的好人之后，受到肆意妄为的虚构的驱使，突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坏蛋。

在《王书》中，大地和天空都得了巴塞杜氏病——眼睛都突得很出，十分迷人。

我向亚美尼亚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马米康·阿尔捷米耶维奇·格沃尔基扬借菲尔多西的作品，他给我送来了一大叠蓝色封面的书，大概有八本。译文是优美的散文体，字里行间沁透着玫瑰油的芳香，这是摩勒发行的法国版本。

马米康咬了咬耷拉下来的下嘴唇，用难听的骆驼叫声似的声音哼了几句用波斯文写的诗句。

他口才很好，聪明、热情，学识非常渊博，语言十分丰富，说起话来像律师。

读者们不得不在馆长办公室里，在他亲自监督下，去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

放到这位督察桌子上的书都有一股红腹金鸡肉、鹌鹑肉、肥壮的鹿肉和狡兔肉的味道。

阿什塔拉克[35]

我有幸看到阿拉拉特平原上空的云彩。

当它们落进盛满红茶的杯子里，化成许多鬈曲的绒球，这时你可以看到乳脂不停地上下浮沉。

不过，阿拉拉特平原上的天空并没有为万军之主[36]带来多少欢乐：它是远古无神论者假想中的山雀。

马车夫山覆盖着一层耀眼的白雪，能一眼看到边的田野像要故意挖苦人似地种满了尖尖的石头，还有一间间编上号码的工地简易宿舍和挤满旅客的小汽车——这就是埃里温的市郊。

突然，小提琴被肢解成音板、琴马、琴颈、弦轴，拿到了花园里，拿到了各家各户，放在一排排架子上。

阿什塔拉克村悬在潺潺的河水上，就像吊在钢丝架上一样。一座座花园仿佛是用石块砌起的筐子，是给花腔女高音最好的纪念礼物。

出于无奈，我们在一个被没收了土地和财产的富农分子的家中过夜。房子很宽敞，有四间卧室。集体农庄管委会没收了他的家具，在这里开设了乡村旅馆。在能够住得下亚伯拉罕全部后裔的凉台上，只有一只挤奶池在形影相吊。

果园，是为树木开设的舞蹈学校。苹果树像小学生一样地胆

怯,红色的樱桃树有一股书生气……您不妨看看它们跳的卡德里尔舞,演奏的前奏曲和回旋曲。

我听着集体农庄拨动数字的潺潺声。山上下着瓢泼大雨。村街上一条条小溪汇成汪洋,流得比平时更快。

河水淙淙,在阿什塔拉克到处泛滥,淹没了所有的房屋,它能使骆驼穿过针眼。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你写了十八页,字体又直又大,好像一溜白杨树。现在答复如下:

第一次通过感性的方式接触了古亚美尼亚教堂。

我用眼睛寻找它的形式、思想,等待它的出现,却意外发现受潮发霉的大自然面包和像石块一样硬的煎饼。

当你第一次看到亚美尼亚教堂时,你那视觉的牙齿会断裂成碎片。

亚美尼亚语是永不磨损的,就像石靴一样。当然,每一个字都是一堵厚墙,每一个半元音里都有空气的间层。难道全部魅力仅在于此?不!吸引力从何而来?如何去解释?能领会吗?

我感受到发音的快乐,这些语音是不允许俄罗斯人从嘴巴里发出来的,它们受到歧视,甚至还因此感到羞耻。

铁皮茶壶里的开水很好喝,突然,有人把一撮香气袭人的红茶丢到里面。

我就是这样学亚美尼亚语的。

我训练自己的第六感觉——阿拉拉特感觉,这是一种被高山吸引的感觉。

现在,无论我到哪里,这种感觉已经抽象化,一直与我同在。

阿什塔拉克小教堂是最普通不过的,也是亚美尼亚最安静

的地方。这些小教堂都戴着六边形的法冠，沿着屋檐有粗线条的装饰图案，在有许多缝隙的小窗口的上方也画着一条条粗线，像眼睛上的眉毛。

门，又安详，又柔顺，我踮起脚尖朝里面张望，可是那里除了圆顶，还是圆顶！

真正的圆顶啊！就像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一样，在它的屋顶下有成千上万的人群和棕榈树，有蜡烛的海洋，也有一副副担架。

那里，在半圆形壁龛的深处，人们在唱歌，就像是一座贝壳形的露天音乐厅。那里有四名面包师，分立在东西南北，用刺人的目光盯着漏斗形的壁龛，在仔细搜寻炉灶和炉灶之间的空地，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是谁出的主意，要把空间锁进可怜的地窖，锁进这贫困的监狱，并在那里举行向它表示敬意的唱圣歌的仪式？

当磨坊主睡不着觉的时候，连帽子也顾不上戴，就走到木墙下看磨盘。有时，我半夜醒来，就默默地背诵马尔语法书上的变位法。

教师阿绍特被砌在自己的墙面平整的房子里，就像雨果小说中不幸的主人公。

他用一只指头敲击着航海晴雨计的小盒子，走到院子里的水池旁边，然后在一张方格纸上画上降水量曲线图。

他经营着一片产量不多的果园，约十分之一公顷土地，还有一个裹在阿什塔拉克硬梆梆的葡萄蛋糕里，被烤干了的小小的花园。集体农庄嫌他好吃懒做，把他开除了。

在五斗橱的抽屉里保存着大学文凭、中学毕业证书和一叠饱含水份的水彩画——它是个性和才能的天真的尝试。

从他的身上可以听见并不完美的过去时代的轰鸣。

他是一个穿着黑色衬衣，敞开着演员一样的脖子，眼里冒着

烈火的劳动者。他回到历史风景画的远景中，走向苏格兰的蒙难者，走向斯图亚特王朝[37]。一部关于缺少教养的悲剧的小说还没有最后完成。我觉得，乡村教师的一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案头必读，就像很久以前的《韦尔泰尔》一样。

阿什塔拉克有很多村落，村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窝。它比许多欧洲的城市更加古老。这里的收割节和民间歌手的即兴吟唱都是远近闻名的。这些在葡萄园下面长大的人们喜欢追逐女人，善于交际，爱开玩笑，但是心胸狭窄，喜欢无所事事。阿什塔拉克人并不是一个例外。

从天上掉下来三只苹果：第一只苹果送给讲故事的人，第二只苹果送给听故事的人，第三只苹果送给听懂故事的人。大部分亚美尼亚的民间故事的结尾都是这样的。其中许多故事都是在阿什塔拉克记录下来的。在这个地区有一座亚美尼亚民间文学的宝库。

阿拉加茨山[38]

你希望生活在哪个时间？

“我希望生活在命令形动词的将来时间，生活在被动态里——也就是说，生活在‘应当成为’这样的语法形式里。”

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就是这样爱我所爱的。有一种巴斯马奇叛乱分子[39]的马背上的荣耀。因此，我很喜欢一个很动听的拉丁词语“格龙季符姆”[40]，这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动词。

是的，当古罗马的天才又年轻又贪婪的时候，创造了动词命令式的形式，成为我们整个文化的雏形，不仅创造了“应当成为”，而且创造了“应当成为大受吹捧的”这样的句式——lau-

daturaest，即，受到喜欢的那样东西……

当我骑着马漫步在阿拉加茨山的自然景区和辽阔的天然牧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语言和自己交谈的。

在埃里温，阿拉加茨山高高耸立在我的眼前，就像“你好”和“再见”一样的平常。我看见山脊上的积雪每天都在消融，如果天气晴好，尤其在早晨，它那抹上白雪的峭壁像一块块油炸的干面包毕剥作响。我透过桑树林和一片片泥屋顶，远远地望着它。

在旅馆里，一块阿拉加茨的山石与我相伴。不知为什么，一块分量很重的、黑色的火山玻璃——黑曜石的样品懒洋洋地躺在窗台上。这张一普特重的名片大概是哪一个地质勘探队遗忘在这里的。

阿拉加茨山，尽管高达一万四千英尺，但是爬上去并不很累，也不用骑马。熔岩已经凝成一个个泥团，走在上面很滑。

我住在埃里温旅馆的五层楼上，从房间的窗口遥望阿拉加茨，心中展开了完全不切实际的想象。我想象中的阿拉加茨山是座一柱擎天的山峰。实际上，它是地质上的褶皱结构，是逐渐形成的。随着高度的增加，闪长岩构成的岩层渐渐变得松散，仿佛手摇风琴在演奏阿尔卑斯山的华尔兹舞曲一样。

于是，艰苦劳累的一天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心有余悸。我心绪紊乱，就像被紧紧裹在从老祖宗雅各[41]箱子里拿出来的长袍里一样。

比尤拉坎村是以打野鸡出了名的。它们像一只只黄色的小球在地上滚动，似乎注定要当我们这些大胃口的人的牺牲品。

有一个到处打工的木匠和我们一起住在一所小学里。他见多识广，手脚麻利，他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对我们说，他既不想参加劳动组合，也不想参加工会。他手艺出众，到哪里都受款待，

都有活干。他不用求助职业介绍所就能找到雇主，靠自己的感觉和听来的消息就能料到哪里有活干。

他好像是捷克人的后代，酷似身系木笛的捕鼠者。

在比尤拉坎，我买了一只用来装盐的大陶罐，由此而引起了很多麻烦。

你不妨想象一下做工粗糙的木模——一个穿着筒裙或筒式连衣裙的村妇，长着一只猫头一样的小脑袋，在衣服的正中张着一只能从容伸进一个手掌的圆圆的大嘴巴。

从一户有钱人的家里能找到这样一件东西，实在是很幸福的。然而，体现在它身上的原始想象力甚至也引起了城里人出于肤浅认识的注意。

到处可以见到农妇们哭丧着脸，拖着两条腿艰难地走路，红红的眼圈，布满裂纹的嘴唇。她们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好像生了水肿病，或者扭伤了筋。她们好像是用破衣烂衫叠起来的一座座小山，每移动一下步子，就用下摆清扫着地上的尘土。

苍蝇叮在孩子们的身上，一串串地爬在他们的眼角上。

上了年纪的亚美尼亚农民的笑容有说不出的可爱。在他们的笑容里蕴含着高尚的气度、饱尝痛苦的人格和一种很重要的已婚男人的魅力。

马群驰骋在沙发上，行进在枕头上，踩在椭圆形的靠枕上。你一边骑着马，一边感觉到在自己的口袋里有一张到帖木儿山口的请帖。

我看见一座规模大得出奇、巨人般的库尔德人的坟墓，我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今天早晨在比尤拉坎村，一只被宰杀的、还没有去毛的母鸡

在我的鞍桥上摇摇晃晃。

马时而俯身草地，它的颈脖表现出对比古罗马公民还年长的人的顺从。

乳白色的平静已经降临，寂静的琼浆在渐渐凝固。奶黄色的小钟和大大小小的暗红色的铃铛在低声细语，在丁丁当当的奏乐。在每一个村子旁边都有卡拉库尔绵羊的集会。几十个小马戏班的班主都在长满虱子的高地上匆匆忙忙地搭起篷帐和戏台，他们没有料到会拥来大批观众，在毡房里忙得团团转，把挤奶桶撞得丁当作响，把一只只小羊羔塞进羊舍里，然后把其余的、在喧闹的城市里奔波了一天、头上冒着热气、浑身湿漉漉的牲畜分门别类地关进它们自己的领地。

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毡房在陈设方面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些建在阿拉加茨凉台上的牧民定居点，是在自己选中的地方建造起来的别墅式的游牧营地。

砌边石上刻着一幅平面图：一顶帐篷，紧挨着一个小院子，小院子的围墙是用厩肥堆起来的。丢弃的或者空关着的一座座毡房像一片火场。

从比尤拉坎雇来的向导很乐意到卡马尔拉去投宿，因为他在那里有亲戚。

一对膝下无子的老夫妻让我们留下来过夜。

老太婆无精打彩地拖着两条腿，慢慢地张罗着，替我们准备热气腾腾的晚饭和铺在床上的毛毡。

“来，把毛毡拿去！来，把被子拿去……说点儿莫斯科的事吧。”

主人打算去睡觉了。油盏照着高高的、像是火车车厢上的铺位。老太婆拿出一件干净的、草绿色的粗平纹布衬衫给丈夫穿

上。

我觉得有些拘谨，好像置身在宫殿里一样。

一、阿尔沙克王[42]的躯体没有洗干净，他的大胡子向四面散开。

二、沙皇的指甲已经断裂，脸上爬满了潮虫。

三、寂静使他的耳朵变得迟钝，可是很久以前他曾聆听过希腊的音乐。

四、由于吃了狱卒送来的食物，舌头上生了疮，可是过去，它曾经把一颗颗葡萄挤碎，而且像长笛手的舌尖一样灵敏。

五、阿尔沙克王的后裔已经穷困潦倒，他的嗓音变得十分细微，就像羊咩一样……

六、"沙皇沙布赫，"阿尔沙克想，"战胜了我，但是最糟的是，他夺走了我的空气。"

七、亚述利亚人对我耿耿于怀。

八、他是我一切——从头发到趾甲——的主宰。他让我留起胡须，吞食我的唾液。他对我被关在安纽什要塞里的事已经习以为常。

九、贵霜王国[43]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沙布赫。

十、他们在不设防的地方，像剪断丝带一样地冲出国境线。

十一、贵霜人民的进攻像一根睫毛落到眼睛里一样，刺痛了沙布赫，使他寝食不安。

十二、敌对双方闭起了眼睛，都不想看到对方。

十三、有一个人叫达尔马斯塔特，在阉人中最有学问，最有礼貌，他站在沙布赫军队的中间，为骑兵统领打气，搏得了统治者的欢心，终于像下棋一样，使他脱离了险境，于是，他的地位变得引人注目。

十四、在阿尔沙克用丝绒般柔和的嗓音下达谕旨的年代，他是安德赫省的省长。

十五、昨天是沙皇，今天掉进了缝隙，像母胎里的婴儿蜷缩着身子，用虱子取暖，以疥疮解闷。

十六、达尔马斯塔特听到要领赏，就把能使人隐隐作痛的请求像笔一样塞进亚述里亚人的尖耳朵里。

十七、请赐给我一张到安纽什要塞去的通行证。我希望阿尔沙克王能够多活一天，能像以前在狩猎场上寻欢作乐和热心于种植树木时那样，听到悦耳的歌声，吃到可口的菜肴，闻到沁人的香味。

在牧民的定居点里，我睡得很轻松。被旅途折磨得精疲力尽的身体渐渐回暖，伸得笔直，好像在测量路程的长度。脊柱般的小径在打着寒战。丝绒一般的草场挠得眼皮发痒，怪不舒服，沟壑的褥疮渐渐蔓延到两侧。睡梦渐渐将你封砌起来。我产生最后一个念头：必须骑马绕过某一道垅岗。

译注：

① 原苏联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1864—1934)。

② 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中的男主人公。

③ 中亚帖木尔帝国的缔造者，军事统帅。

④ 法国画家(1863—1935)。

⑤ 法国画家(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派主要代表人物。

⑥ 古希腊犬儒哲学家，奉行极端禁欲主义，自称是世界公民，传说他住在一个大木桶里。

⑦ 拉马克主义是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创立的关于生物进化的最早、最完整的学说；后成论是胚胎发育的学说之一，认为胚胎的器官和各部是由受精卵的无结构物质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⑧ 俄国画家(1842—1904)。

⑨ 源出于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

⑩ 德国作家(1749—1832),最著名的作品是悲剧《浮士德》。

⑪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⑫ 指马·埃·科扎科夫。

⑬ 意大利诗人(1265—1321),他的长诗《神曲》分三部分,即《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

⑭ 爱德华·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主要代表人物。

⑮ 原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

⑯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

⑰ 指北非和阿拉伯半岛沙漠区的干热风。

⑱ 法国画家(1839—1906),后期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

⑲ 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1869—1954)。

⑳ 荷兰画家(1853—1890),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其著名油画是《夜咖啡馆》。

㉑ 荷兰等国的货币单位名称。

㉒ 法国画家、雕塑家(1841—1919)。

㉓ 法国画家(1863—1935),新印象画派代表人物和理论家。

㉔ 法国画家(1886—1966),纯粹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㉕ 法国画家(1881—1973)。

㉖ 西班牙征服者(1470—1541)。

㉗ 法文,意为:拿起武器。

㉘ 林耐(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帕拉斯(1741—1811),俄国自然科学家。

㉙ 均为18世纪奥地利作曲家。

㉚ 英国作家(1812—1870),著有幽默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以及长篇小说《艰难时世》、《大卫·科普菲尔》等。

㉛ 法国作家(1621—1695),作品有童话、寓言等。

㉜ 俄国寓言作家(1769—1844)。

㉝ 波斯和塔吉克诗人(约 940—1020)著有长诗《王书》。

㉞ 公元前 4 世纪末在伊拉克巴比仑附近。

㉟ 在亚美尼亚,卡萨赫河畔。有酿酒厂。

㊱ 犹太教中上帝耶和华的称号之一。

㊲ 指苏格兰(1371—1714)和英格兰(1603—1649、1660—1714)的王朝,著名人物有玛利·斯图亚特、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查理二世等。

㊳ 位于亚美尼亚西北部。

㊴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中亚一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

㊵ 此词的意思是"形动词"。

㊶ 亦名以色列。《圣经》神话中以撒和利百加的孪生子中的次子。

㊷ 即公元 62—428 年亚美尼亚王朝,创始人为特尔达特一世。

㊸ 古代国家。包括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可能还有新疆)的大部领土。

第四散文

一

维尼亚明·费奥多罗维奇·卡甘①是用古星相家和敖德萨的牛顿的神计妙算来处理这件事的。他那阴谋家的活动是建筑在无穷小的基础上的。卡甘从乌龟爬行的速度看到了救治定律。他让自己从教授的小房子里走出来,随时随地走到电话机前面,一不发誓,二不推托,主要是竭力延缓病势恶化。

在通过被称为到处奔走的、易于被人理解的纯微积分的途径挽救五条人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中,教授和数学家的参与使大家感到十分满意。

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得了像猩红热这样的传染病,容易传染给别人;因此,最好把他——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一枪打死。他到处奔波,却毫无结果,四处求医,恳求他们尽快进行消毒处理。

如果允许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有外出的自由,那么

他一定会叫一辆出租汽车，盲目地、毫无计划地跑遍整个莫斯科，他想象中的葬礼就是这样的。

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总是惦记着说，他把妻子留在了彼得堡。他甚至请来了一位亲戚当他的女秘书，她生得很瘦小，表情严肃，精明能干，一直照料着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的日常生活。总之，他在不同的时间求助于不同的人，似乎在为自己接种预防吃枪子儿的疫苗。

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所有的亲戚都死在犹太人的桃木床上。有些彼得堡资产者都当过贵族血统的神职人员。通过翻译，伊赛跟阿纳托尔·法朗士②有过初步接触，他们像土耳其人朝圣黑色的克尔白石殿③一样，拜谒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④去过的疗养地，以便用治疗的方式让自己渐渐地进入彼岸世界。

在彼得堡，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的生活方式完全像一个道地的法国人，吃自己做的法国菜，专挑一些不得罪人的人做朋友，就象挑吃清汤里的炸面包块一样；如果外出，也一定跟自己的职业有关，他只去两个旧货收购商那儿。

在战争动员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说在刚刚响起战斗警报的时候，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表现得还算好，可是后来，他褪色了，变蔫了，吓得伸出了舌头，亲戚们一起把他送到了彼得堡。

我向来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资产者怎么会染上苛刻挑剔的恶习，而且美其名曰“高贵”。所谓高贵，就是使资本家和动物相接近的东西。

许多共产党员在资产者的世界里乐而忘返，其原因就是成年人迫切需要跟两颊绯红的孩子们交往。

资产者，当然比无产阶级更天真无邪，他们和母腹内的世界更加亲近，和婴儿、小猫、安琪儿和长翅膀的小天使更加亲近。在俄国，这种天真无邪的资产者是很少的，这对于真正革命者的消

化会产生不良影响。应当使资产阶级保持天真的面貌，应当让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业余比赛，哄他们在普尔曼式火车车厢的弹簧床上好好睡觉，把他们裹在火车上的雪白色睡梦的襁褓里。

二

一个脚蹬山羊皮靴子，身穿波里斯绒紧腰长外衣，头上留着鬓发的小男孩站在几个大婶大娘和保育员中间，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厨师和一个赶马车的男孩。这一群嘁嘁喳喳哄着、闹着的大天使簇拥着小少爷说：

“打他一下，瓦辛卡，打他一下！”

瓦辛卡马上打了他一下；于是，几个老处女、丑八怪你推我搡，轻轻按住身上长满疥疮的赶马车的男孩说：

“打他一下，瓦辛卡，打他一下，我们现在把这卷毛头按住了，我们现在围个圈子跳个舞……”

这是什么？是魏涅齐阿诺夫⑤的风俗画吗？是农奴写生画家的习作？

不，这是共青团里的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家伙，在搞宣传的大婶、大娘和保育员的指导下进行排练活动，让他，瓦辛卡跺一下脚，让他，瓦辛卡打一下，而我们把一个小黑皮轻轻按住，在周围跳起舞……

“打他一下，瓦辛卡，打他一下……”

三

一个跛脚姑娘从没有一辆电车的街上向我们走来，那条街很长很长，仿佛漫漫长夜。她把拐杖放到一边，急急忙忙坐下来，

想跟大家一样。这个单身女是谁？——轻骑兵。

我们一面彼此向对方要香烟，纠正自己学到的中国人的习俗，一面将伟大的、被禁止的阶级意识译成肉体胆怯的公式。肉体的恐惧敲击着打字机，肉体的恐惧在一张张手纸上像写中国字那样涂涂改改，接连地写着告密信，揍打倒下的人，要求处决俘虏。我们的成年伙伴像孩子们当众把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在大转折时期拚命地挤压黄油。“嘿，用力压呀，挤呀，别让人见到在挤谁”——这就是施私刑者的明火执杖的准则。

掌柜把女工高高吊起——打死他！
女会计算错了五个戈比——打死他！
经理一时糊涂说漏了嘴——打死他！
农民将黑麦藏进谷仓——打死他！

姑娘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向我们走来。她的一条腿被截去了一段，笨重的假鞋像一只木制的马蹄。

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是些不要读书的中学生。我们是任性放肆的共青团员。我们是无法无天的捣蛋鬼。

菲利普·菲利佩奇牙齿疼，已经有好几天不来上课了，今后几天也不会来上课。我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就像马蹄装在腿上一样，觉得是多余的，可是这一点没有使我们感到羞愧。

我来找你们，我的偶蹄类的朋友们，是为了用木蹄敲打黄颜色的社会主义商业长廊，它是逞强好胜的负责人基别尔凭着狂妄的想象创办的，它包括开设在特维尔街的豪华旅馆、夜间电报亭或是电话服务站，出自缔造全人类幸福的理想而建造的带小吃部的剧场休息厅、有着向你频频致敬的办事员的事务所和空气干燥得使你嗓子发痒的邮电所。

这儿，在二等车站的黄澄澄的灯光下，会计室度过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这儿，就像普希金的童话故事一样，大家在给犹太人和青蛙举行婚礼，也就是说，不停地进行着一个用舞台动作扔着鱼子酱的，长着细腿的花花公子和从同一个澡堂里出来的，浑身冒着热气的，手脚不干净的人的婚礼。后者是莫斯科的编辑、棺材匠，专门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报纸棺材。他把白纸尸衣揉得沙沙作响，他为基督年的月份：一月、二月、三月……打开血管，这些月份至今仍保留着古希腊的名称。当时代之马的黑血喷涌而出的时候，他非但是一个可怕的、不能挽救事故和生命的庸医，反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

四

我是在离开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一排板棚以后，直接到《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社去工作的。那里只有十二副耳机，几乎都是损坏的，还有一个由教堂改建而成的阅览室，但是没有图书，大家像蜗牛一样睡在一只只圆圆的小沙发椅上。

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女工作人员非常恨我，因为我天天带着小草篮去，还因为我不是教授。

白天，我常常去看河水上涨的情况，坚信莫斯科河的汹涌的洪水一定会淹没科学家们聚居的克拉彼特金斯卡亚沿岸街，于是用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电话叫了一只小船。

每天早晨，我在街上直接对着长颈瓶喝几口消毒酸奶。

我常常从供教授们使用的木架上拿走别人的肥皂，每天乘夜深人静洗个澡，从来没有被人抓住过。

这里的人有的来自哈尔科夫，有的来自沃罗涅日，都想到阿拉木图去。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替我出主意，到哪一个共和国去

更合算。

晚上，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大门紧闭，像一座要塞一样。我用棍子敲着窗户。

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打电话给每一个有地位的人，到了晚上，工作人员就发给他们一张便条，就像给神父的荐亡表一样。作家格林也住在那里，一个女工作人员常常替他刷衣服。我和大家一样，也住在那里，从来没有人来干涉我，一直到仲夏，我自己离开了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

在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皮大衣横着放在四轮轻便马车上，一个长期住在医院里的出院病人或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有这种习惯。

五

说到文学创作，我只知道生肉，只知道疯长的赘疣。

天空中翱翔着一只苍鹰，
它的哀鸣刺痛了狭谷的心。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我把世界文学作品分成两类：获准文学和非获准文学。第一类是废物，第二类是偷来的空气。我鄙视那些写事先获准的作品的作家，真想用棍子揍他们的脑袋，让他们坐到赫尔岑之家的桌面上，除了给他们每人端上一杯警察局的茶水以外，还给他们每人一份高伦费尔德的能力分析。

我要是能禁止这些作家结婚，不让他们生儿育女就好了。他们怎么可以有孩子呢？要知道，孩子们应当为我们把最主要的话

说下去，直到说完为止——他们的父辈早已在三代之前被预售给花脸魔鬼了。

这就是文学的一页。

六

我没有手稿，没有笔记本，没有文献资料。我没有留下笔迹，因为我从不写字。我一个人在俄国吃开口饭，而四周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坏蛋在写。我算什么作家，见鬼去吧！滚开，蠢货们！

因此，我有许多铅笔，五颜六色，全是偷来的，可以用“热列特”牌剃须刀片把它们一支支削尖。

这个牌子的刀片边缘虽然有些毛，但我总觉得它是我们钢铁工业的杰作之一。优质的剃刀很好使，像割草一样不费力，有很强的弯曲度，拿在手里不会断裂——不知是火星人的名片，还是身体中间钻了个小洞的彬彬有礼的魔鬼送来的便条。

“热列德”牌刀片是毫无生机的托拉斯的产品，美国和瑞士的狼群是这个托拉斯的股东。

七

我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我。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拉木图去，那里的人，眼睛都像葡萄干；那里的波斯人，眼睛大得像煎蛋；那里的萨尔特人，眼睛又圆又鼓。

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塞拜疆去吧！

我有过一个监护人，他就是人民委员姆拉维扬-穆拉维扬，是犹太人家园的小妹妹——亚美尼亚土地上像蚂蚁一样终日辛劳的人民委员。他打给我一份电报。

我的监护人，姆拉维扬-穆拉维扬死了。埃里温的蚁穴里从此少了一位黑色的人民委员。他天真好学，就像一个从土耳其农村里出来的神父，再也不能坐上国际列车到莫斯科去了。

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塞拜疆去吧！

我有一封写给人民委员姆拉维扬的信。我找到座落在莫斯科最整洁的使馆街上一幢亚美尼亚别墅，把这封信交给了秘书处。我差一点被老教育人民委员派到埃里温的一所寒碜得像个修道院一样的大学里去，给在那里读书的、长得圆头圆脑的大学生上课。

如果我真的去埃里温，那么我将三天三夜接连不断地跑到车站的小卖部，去吃黑鱼子酱夹面包。

愚蠢的哈尔德人啊！

我要一路上阅读左琴科⑥最优秀的作品，会像一个偷了一百卢布的鞑靼人那样喜形于色。

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塞拜疆去吧！

我要在装满一大堆散发着衣服碱液味的草筐里再放进自己的勇气，而将我的皮大衣挂在金色的钉子上。我将一只手挽着皮大衣，一只手执着手杖——我的犹太人的权杖，走出埃里温火车站。

八

有一首优秀的俄罗斯诗歌，我曾在散发着狗毛味的莫斯科的夜晚反复地吟诵过，它仿佛长角的魔鬼，充满着迷惑力。猜一猜吧，朋友们，这首诗，他用滑木写在雪地上，它像锁孔中的钥匙吱吱作响，它像冰雪敲击着房间：

……没有向监狱中的不幸者射击……

这就是信仰的象征，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死敌的真正典范。

在赫尔岑之家，有一个只吃乳制品的素食者，是个语言学家，长着一颗中国人那样的小脑袋，他属于这样一类人，当一个个人头落地的时候，他会一边踮起脚尖，一边打着哈哈，若无其事地走在淌满鲜血的苏维埃大地上。还有一个叫米切卡·勃拉戈伊的人，是个贵族学校的败类，布尔什维克准许他从事科学研究。他现在在专门博物馆里看守着吊死谢尔盖·叶赛宁⑦的绳子。

我对他说，找他的中国人去，到他的上海去，找他的那些中国通去，那儿有他的容身之地！比作母亲的语文学过去是什么东西，现在又变成什么东西……它曾经是鲜血，是毫不妥协，而现在成了能忍受一切的可怜虫……

九

在谋杀俄国诗人的凶手或候补凶手的名单中加上了高伦费尔德这个不光彩的名字。这个患瘫痪症的丹特斯⑧，这个住在巴谢伊那亚街上的毛尼亚大叔宣传道义，宣传国家观念，完成他一无所知的政体的订货，他几乎把接受这种订货看作消化不良的表现。

因高伦费尔德而死是愚蠢的，如同因被自行车撞了一下或者因被鹦鹉啄了一下而死一样的愚蠢。然而文学凶手也可能是鹦鹉。比如说，我曾经差一点被艾伯特⑨国王陛下和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柯罗连科⑩的鹦鹉啄死。我很高兴，我

的凶手还活着。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寿命比我还长。我给它吃砂糖，兴趣盎然地听它反反复复地说乌伦什皮格尔的诗句，一会儿是“灰烬敲着我的心”，一会儿又是“世界上语言最痛苦”。一个能将自己写的书起名为《语言的痛苦》的人，他的额上生来就有文学凶手的烙印。

我和高伦费尔德只见过一面。那是在一家小杂志社的肮脏的编辑室里，编辑室就像克维西桑的小饭店，到处都是憧憧人影。当时还存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还不知向谁告状。当我回忆起孤苦伶仃的生活——我们竟然活下来了！沉重的泪珠在我的眼眶里滚动……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两条腿的批评家，我同他握了握手。

高伦费尔德大叔，你为什么要到《交易所新闻报》，即《晚间红色报》去告状，而且是在苏维埃的1929年？你还不如对着身穿干净的犹太文学背心的普鲁彼尔先生哭一顿，你还不如向穿着晨服，患有坐骨神经痛的银行家诉说一番自己的痛苦……

十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有位女秘书，是个一句假话也不说的诚实姑娘，完完全全像只小松鼠，是只小啮齿动物，和每一个来访者一起啃核桃。她急急忙忙赶去接电话的姿势，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母亲赶过去照看生病的婴儿。

有一个坏蛋对我说，诚实，希腊语就叫“姆里亚”。

这只小松鼠——用希腊字母大写的真正的诚实。同时，这位姑娘——残酷的党的处女，还意味着另一种诚实——党的诚实……

女秘书胆子很小，却很有怜悯心，像一个护士，与其说她在

工作，不如说她生活在办公室外边的有电话的脱衣间里。备有电话和经典报纸的穿堂间的可怜的“姆里亚”姑娘啊！

这位女秘书与众不同，她像一名坐在政权门槛上的助理护士，像护理重病人一样护理着政权的代表者。

十一

不，请让我进行诉讼，请让我把诉讼载入记录！……

请把我，怎么说呢，归入案卷。我恳求你们，不要剥夺我出庭的权利……诉讼程序还没有结束，我可以大胆向您保证，它永远不会结束。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前奏。女歌手鲍齐奥将在我出庭的时候登台歌唱。一群戴着方格厚毛围巾的，长着大胡子的大学生混在穿短斗篷的宪兵中间，在一只领头羊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地走在出殡的行列里，抬着一口警察局的棺材，里面放着从烟雾腾腾的地方法院里调来的我的诉讼案件的残骸。

爸爸，亲爱的爸爸，
哪儿有你的妈妈？
可怕的天花，
已从福斯普身上赶走啦。
你的妈妈瞎了一只眼，
用死亡的针线缝着案件的破褂……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请允许我介绍自己……好像在您的家里……您作为主人，请多少给我一点回答……

是否能允许我出国？……这儿正发生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老爷！怎么办呢?！我能向谁去

倾诉!

十二

在我一生中的某一年,一些成年男子曾企图为我举行一个肮脏卑鄙的宗教仪式,这些人,我从心底里痛恨他们,决不想在今后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给仪式起了个名字,叫做文学割礼,或称文学强奸。据说这样做,符合作家部族的习俗和教历的需要,同时由族长挑选,谁来充当牺牲品。

我坚持认为,文学创作应当保持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形成的那种形式,它和我引以为自豪的犹太人的光荣称号是不相容的。我的身上有牧羊人、大牧首和沙皇遗留的血统。它反对作家部族的奸诈狡猾的茨岗风格。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到处流浪的、肮脏的茨岗人的大篷车队把我抢走了。多少年来,他们到处厮混,费尽心机将他们唯一的手艺,也就是唯一的艺术——偷窃传授给我。

文学创作,这是皮肤的恶臭和最肮脏的烹饪方式的混种。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躺在被从城市里清扫出来的自己的呕吐物上过着游牧生活,在农村里也不受欢迎,然而无论到哪里,它和官方非常亲热,官方把它当成妓女,为它在黄色区里让出一个位子,因为文学无论在哪里,使命只有一个——帮助法官大人镇压注定要灭亡的人。

作家,他是鹦鹉和神父的混合体。他具有神父这个字的最崇高的意义。如果他的主人是法国人,他就说法国话,如果他被卖到波斯,他就说波斯话:“神父—傻瓜”或者“神父想吃砂糖”。鹦鹉没有年龄,不知道白天和黑夜。如果主人玩腻了,就用一块黑布将它盖上,对于文学来说,这是黑夜的代用品。

十三

从前有谢尼耶两兄弟[11]，可鄙的弟弟把一生献给了文学，后来被处决的哥哥自己也处决了文学。

狱卒们比任何人都爱读小说，他们需要文学。在我一生中的某一年，一些戴着有角皮帽，长着大胡子的成年男子抬起石头般沉重的脚，踩在我头上，以便把我阉掉。我断定，这些人都是本部族的司祭，他们身上有一股洋葱味、葡萄酒味和羊肉味。

一切都很可怕，就像小孩子做梦一样。在我的人生旅途中[12]，在人生旅途的中段，我被一伙自称为法官的强盗拦截在苏维埃的密林里。这些老人长着青筋暴起的脖子和经受不住岁月重负的瘦长的小脑袋。

我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需要文学。它揉我，摸我，捏我，一切都很可怕，就像小孩子做梦一样。

十四

我对《土地与工厂》出版社未能和译者高伦费尔德和卡里亚金达成协议，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是熟制名贵毛皮的工匠，差一点被文学的毛皮熏得喘不过气来。我也要对下面这件事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我曾向彼得堡的无耻之徒暗示，希望像借用诽谤性的趣闻一样借用一下果戈理的温暖的外套；一天晚上，在广场上，这件外套突然从最老的共青团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13]的肩膀上滑落下来。我从自己身上脱下文学的外套，并把它

踩在脚下。我穿了一件上衣，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来回三次跑过莫斯科林荫环行道。我不顾致命的感冒，从共青团主办的精神病医院中逃出来，只求再也看不到特维尔林荫道上的藏污纳垢的房子里十二扇灯火通明的犹太人的窗户，只求再也听不见银币的叮当声和计算印张的声音。

十五

从特维尔林荫道走出来的尊敬的小说家，我们曾在一起写过您甚至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小说。我非常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官方的公文里，出现在法院执行员的传票上和其他硬性的文件里。在这种地方，名字听起来更加公正，声音听起来更觉新鲜，应当说，十分有趣。我自己有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不这样做。我，多少年来应当做些什么的曼德尔施塔姆，一天到晚躲躲闪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他还能逃避多久？这样下去对我没有好处，别人的名声与日俱增，而我却相反——时光在倒转。

我做得不对。这里不可能存在两种意见。我没有从错误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无法偿清这笔帐，只能用逃避来拯救自己。我又能逃避多久呢？

当我收到无情的传票、或是某一个社会组织发来的像古罗马文字一样简单的提示式通知的时候，当他们要求我交出同伙，停止鬼鬼祟祟的活动，并且说出我从哪里弄到伪钞的时候，当他们要我写下不从预先决定的边境线出国的保证书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意了，而且立刻感到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又开始躲躲闪闪，永无止境。

首先，我从什么地方逃走，他们就一定会搜寻我，把我抓回

去，送回原处。其次，他们把我当成了别人，没有精力来证实我的身份。我的口袋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张去年用密码写的字条，几个已经去世的亲戚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些不知是谁的地址。第三，我跟韦尔泽乌尔，也可能和国家出版社，在撒过像金刚砂一样的辣椒芥末的绘图纸上签订了一份内容广泛的，然而却无法履行的协议。上面规定必须双倍返回获得的利润，按四倍计算吐出非法所得，连续十六次完成或是不可能做到的，或是不可思议的，或是唯一能证明我是正确的事情。

年复一年，我变得越来越坏了。我全身好像被一把电车售票员手中的钢钳打满了窟窿，盖满了自己名字的印章。当有人叫我父名的时候，我每次都禁不住打哆嗦——怎么也听不顺耳——多么荣幸啊！哪怕一生中有人叫我一次伊凡·莫伊谢奇也好！……哎，伊凡，替狗去挠痒吧！曼德尔施塔姆，替狗去挠痒吧！对法国人，称呼亲爱的老师，可是对我，却直呼曼德尔施塔姆，替狗去挠痒吧！人人各得其所。

我，一个日渐衰老的人，用一颗残缺的心替主人的狗挠痒——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嫌不够……俄罗斯作家用温柔的狗眼看着我，恳求我：去死吧！他们怎么会产生这种奴才的狠毒，这种对我的名字的刻意的蔑视？茨冈人还有马与之相伴，而我一个人，又有马，又有茨冈人……

铁皮传票压在我的枕头底下……没有花环，只有四十六份协议；没有蜡烛，只有十万支点燃的香烟……

十六

无论我干得多么卖力，即使把马背在身上，即使我把磨盘转个不停，我也始终成不了劳动者。我的劳动，无论拿什么来表示，

都被当成顽皮淘气，胡作非为和偶然的行动。然而，这就是我的意愿，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举双手赞成。

方法有各种各样，对我来说，面包圈中间的窟窿更为重要。那么做面包圈的面团怎么办呢？面包圈可以吃掉，中间的窟窿留着。

真正的劳动是布鲁塞尔的花边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上面的花纹：镂空，刺绣，抽丝。

可是，老弟，劳动对我没有好处，它不会将我列入工龄计算的。

我们有一本劳动圣经，可是大家并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是左琴科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把他为我们塑造的唯一的劳动者的形象踩在脚下。我要求在所有的城市里，在苏联的全部国土上，为左琴科建立纪念碑，至少也要在夏花园里建一座像克雷洛夫爷爷那样的纪念碑。看，谁的手里有旷工单，看，谁的手里有布鲁塞尔的花边织物！

伊林卡的晚上，当国营百货公司和托拉斯都已入睡，说着家乡的中国话的时候，一件件趣闻也在伊林卡悄悄流传着。列宁和托洛茨基互相拥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只小水桶和一根君士坦丁堡的钓鱼竿。两个犹太人走在一起，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一个人提问，一个人回答，一个人不停地问啊，问啊，一个人不停地转啊，转啊，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一个背着手摇风琴的德国流浪乐师，是个失败者，是个寄生者……Ich bin arm[14]. 我很穷。

睡吧，亲爱的……爱姆-爱斯-佩-奥……

"维"[15]在红场上读电话号码簿，请朝我睁开你的眼睛……替我接中央委员会……

一群从埃里温来的，带着染过色的新鲜鲱鱼的亚美尼亚人

在路上走着。Ich bin arm. 我很穷。

在阿尔马维尔的城徽上写着：狗在吠，风在吼。

译注：

① 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869—1953)，微分几何学学派创始人。

② 法国作家(1844—1924)。

③ 麦加圣寺内的石殿。

④ 均为19世纪俄国作家。

⑤ 画家(1780—1847)，俄国风俗画奠基人之一。

⑥ 俄罗斯作家(1895—1958)，著有《蓝书》、《返回的青春》、《日出之前》等小说。

⑦ 俄罗斯诗人(1895—1925)，作品有诗集《母亲的来信》等。

⑧ 杀害普希金的凶手，法国保皇分子。

⑨ 比利时国王(1875—1934)。

⑩ 俄国作家(1853—1901)，作品有《马卡尔的梦》、《盲音乐家》等。

⑪ 两兄弟均为18世纪法国诗人。大谢尼耶创作的哀歌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小谢尼耶除写有许多短诗以外，还创作悲剧，反对暴政和宗教狂热。

⑫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⑬ 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外套》里的主人公。

⑭ 德文。意思即：我很穷。

⑮ 民间传说中的魔鬼头领。

普希金和斯克里亚宾[1]

（片　段）

普希金和斯克里亚宾——同一个太阳的两种形态，同一颗心脏的两种形态。艺术家的两次死亡，动员了俄国人民，在他们的上空点燃了太阳。他们表现出一个俄罗斯逝者的崇高榜样，他们死得完美，如同他们生得完美一样。他们虽然死了，但升华为全体人民的象征。逝者如太阳般的心，永远处在苦难和名望的顶峰。

我想说说斯克里亚宾之死，这是他创作活动的顶峰。我认为，不应把艺术家的死排除在他创作成果的链条之外，而应将它看成最后一个结论性的环节。根据基督教的观点，斯克里亚宾的死是令人惊异的。他的死在群众的心目中是十分完美的，好像艺术家在死后仍然神奇般地活着，而且成为这种创作的源泉，它的目的论的根源。如果撕去盖在创作生活上的死亡外衣，那么创作生活就将从自己的根源——死亡中自由地流出来，将它团团围住，就像围住自己的太阳，吞掉它的光芒一样。

普希金的葬礼是在晚上偷偷地举行的。大理石的以撒[2]——壮丽的石棺——没有等到诗人太阳般的身躯。晚上,人们将太阳放进棺材,运来为诗人做安魂祈祷的雪橇滑木,在一月的凛冽寒风中吱嘎吱嘎地响着。

我回忆普希金葬礼的情景,是想让你们记得黑夜太阳的形象,记得欧里庇得斯[3]创作的最后一部古希腊悲剧的形象——不幸的费德拉的幽灵。

在决定命运的大清洗和暴风雨的时刻,我们把斯克里亚宾高高举起,他那太阳般的心在我们的上空燃烧,可是,唉!这不是赎罪的太阳,而是罪恶的太阳。费德拉-俄罗斯确认斯克里亚宾是自己在世界大战时期的象征,她……

……时间可以倒流:最新历史的全部进程能证明这一点,它以回天之力从基督教转向佛教和神智学。

统一是不存在的!"世界众多,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上帝统治着另一个上帝。"这是什么?是梦呓还是基督教的末日?

个人是不存在的!"我"——这是暂时的状态,你有许多灵魂和许多生命!这是什么?是梦呓还是基督教的末日?

时间是不存在的!基督纪元正处在危机之中。公元纪年正在消亡,时间在呼啸声中飞驰般地向后倒退,就像被阻挡的洪流一样,新时代的俄耳甫斯[4]把自己的竖琴丢进咆哮的大海,从此艺术就消失了。

斯克里亚宾,在普希金之后使俄国的希腊化时代又上了一个台阶,他进一步系统地揭示了希腊化时代的俄罗斯精神的本质。对于俄国,对于基督教,斯克里亚宾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狂妄的古希腊人。通过他,埃拉多斯[5]和自焚于棺材中的俄国分裂派教徒攀上了亲。无论怎么说,总要比和西方神智学家们

的关系来得亲近。他的锡利亚式的狂想是纯俄罗斯的对拯救的渴望;其中有古希腊的内涵,那就是丧失理智,他就是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渴望的。

基督教的艺术向来是建筑在伟大的赎罪思想上的一种行动。它在自己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漫无止境地模仿基督的形象,始终回归到为新世纪奠定基础的唯一的创作活动中去。基督教艺术是自由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任何一种必要性,甚至是最高的必要性都不能使光辉的内在自由黯然失色,因为它所描摹的原型本身就是基督为世人赎罪。所以,既不是牺牲品,也不是艺术上的赎罪,而是自由地、愉快地模仿基督,这就是基督教美学的基本思想。艺术不可能成为牺牲品,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不可能成为赎罪的工具,因为整个世界连同艺术家在一起已经被用来赎罪了。那么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和上帝的愉快交往,就像天父与孩子们玩灵魂捉迷藏的游戏!包含在基督教艺术中的神奇的赎罪幻想正可以用上帝和我们所做的游戏来解释。上帝允许我们在神秘剧的小路上迷失方向,其目的是让我们净化自己的灵魂,经受艺术上的赎罪考验,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向赎罪发起进攻。基督教的艺术家们就像是从赎罪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奴隶,而不是失去自由的奴隶,更不是传教士。我们两千年的全部文化出于基督教的宽容仁慈,成了一张免罪证,允许世人游戏,抒发内心的快乐,可以自由地"模仿基督"。

基督教对艺术采取完全自由的态度,这是空前绝后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宗教敢于这样做。

基督教滋养了艺术,赋于它自己的肉体,向它提供最现实的赎罪事实作为牢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却从不要求回报。所以,内心空虚的危险对基督教文化并不构成威胁。它永不枯竭,源远

流长，因此，它超越时代，一次又一次地将绚丽的祥云赐于人间，向大地普降生命的甘霖。毋需用多余的笔墨来指出如下的这一情况：欧洲文化所以具有永远清新和永不枯萎的个性，应当感谢基督教对待艺术的宽容态度。

包括音乐在内的基督教文化的力度，也就是作为以赎罪为最基本的自然原素的艺术中的精神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在古代，音乐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因素。古希腊人害怕长笛和弗里基亚调式，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具有诱惑力的声音。泰尔潘德罗斯⑥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去获取基萨拉琴的每一根新的琴弦。他们对待音乐的强烈的不信任态度，就像对待一种受怀疑的黑暗势力一样，以致国家不得不将音乐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宣布自己对音乐拥有垄断的权利，而音乐调式则是支持政治体制和国内和谐的工具和样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人在赋予音乐独立性方面仍然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他们认为歌词应当是必不可少的解毒药、忠诚的卫士和音乐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古希腊人不懂得纯音乐是完全属于基督教的。仅仅到了把希腊融入欧洲的大转折以后，基督教音乐这个山中湖泊才得以保留下来。

基督教不惧怕音乐。基督世界笑着对狄奥尼索斯⑦说："不妨试试吧，吩咐女祭司把我撕碎，我全身完好无损，我是个完整的个性，我全身是联结在一起的整体！"这种对完整的、未受损伤的个性的最终胜利的信心，在新音乐里表现得十分强烈。我可以这么说："这种对自我拯救的信心以泛音渗入了基督教音乐，它使贝多芬宏亮的声音更富有色彩，仿佛被称为西奈光荣的白色大理石雕塑。"

声音，这是人。钢琴，这是塞壬⑧。斯克里亚宾自从停止歌唱以后，就醉心于诱人的钢琴音乐，这标志着基督教个性和音乐中

“我”的丧失。没有一句歌词的普鲁米修斯合唱曲同样是一个迷人的塞壬。

贝多芬表现出的天主教徒式的快乐，第九交响曲的合成，那种“白色荣誉的胜利”，斯克里亚宾对这一切都是不能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脱离了基督教音乐，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希腊悲剧的风格在音乐中得到了复苏。音乐在转了一个圈子以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费德拉又在呼唤乳娘，安提戈涅⑨又在请求祭奠自己的亲爱的兄长和掩埋他的尸体。

音乐里发生了一件事。一阵风折断了干枯的、能发出声音的音乐芦苇。我们需要合唱曲，芦苇的无休止的絮语使我们感到厌倦。我们一直在玩弄音乐，却没有注意到其中隐藏的危险性；也许，出于暂时的寂寞，我们虚构了一个神话，以使我们的生存丰富多彩一些。音乐向我们扔出了一个神话，它不是虚构的，而是天生的，天生白的，天生红的，出身于帝王之家，是古代神话的合法继承者，是关于被遗忘的基督教的神话。

……老狄奥尼索斯的葡萄园：在我的想象中，他闭着眼睛，向上微微抬起的小脑袋显出轻松和得意的神情。这是轻盈的记忆女神摩涅摩辛涅，环舞中的领舞者。忘却的面具从他柔嫩的脸上滑落下来，容貌于是变得十分清晰。记忆取得了胜利，让死亡变得有价值。死亡意味着回忆，回忆意味着死亡……无论如何是需要回忆的！要战胜忘却，即使要付出死的代价——这就是斯克里亚宾的座右铭，这就是他艺术上的勇敢的追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斯克里亚宾的死是他艺术创作的最高峰，他的死将突如其来的耀眼光辉洒到他的身上。

……烽火正旺的战争结束了。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的人现在都理应捍卫自己的阵地，就像两千年前一样。世界的希腊化，不可能像重新油漆房子一样一蹴而就，基督教世界是个有机体，是活生生的躯体。当前世界的细胞组织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得以恢复，我们必须同新生活的野蛮行为展开斗争，因为在生机蓬勃的生活中，死亡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世界上存在死亡，希腊化时代一定会来临，因为基督教正在将死亡希腊化……用死亡浇灌了希腊化，这就是基督教。死亡的种子播在希腊的土壤里，花盛叶茂，我们的全部文化都源自这一粒种子，我们的纪年从这个时刻开始，就像希腊的土地接受这一纪年方法一样。整个罗马却颗粒无收，因为罗马是多石土壤，因为罗马是失去天惠的希腊。

斯克里亚宾的艺术与基督教的我称之为死亡希腊化的历史使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由此产生了深刻的意义。

……有一种音乐，它包含着我们生命的原子。处于纯正状态的旋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只存在于希腊的唯一的个人感觉，因为和谐的声音对于基督教以后时期的“我”的感觉，是十分典型的。和谐的声音对与堕落无关的世界而言，则是一只禁果。形而上学的和谐的实质，以最紧密的方式与基督教的时间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晶体状的永恒，它的全部都处于时间的横断面，，即处在只有基督教理解的时间横断面里。……神秘论者在接受只有虔诚教徒们才能理解的横断面，和确认这种永恒乃是六翼天使用剑劈开的时间范畴的同时，竭力使时间的永恒性改变方向。斯克里亚宾音乐的重心建筑在声音和谐的基础上：和谐的艺术结构……

译注：

① 俄罗斯作曲家和钢琴家(1871—1915)。

② 《圣经》神话中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

③ 古希腊诗人、剧作家(约公元前480—前406)。

④ 希腊神话中的色雷斯歌手以美妙的歌声打动神灵和人们，使狂暴的大自然驯服。

⑤ 古希腊人对其国家的自称。

⑥ 古希腊诗人、歌手，以基萨拉琴伴唱。

⑦ 希腊神话中酒和葡萄之神。

⑧ 半人半鸟的海妖，住在海岛上，以歌声诱惑水手，使之灭亡。

⑨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的女儿。她违反叔父克瑞翁的命令，将自己的兄长波林尼克的尸体埋葬，因而被囚禁在墓穴中，自缢身死。

文学的莫斯科

莫斯科—北京;这是大陆的胜利,中央王国的精神,这儿,铁路上沉重的绳索犬牙交错,打成一个死结,这儿,欧亚大陆正在庆祝自己永恒的命名日。

谁在中央王国不感到寂寞,谁就是莫斯科期望的客人。有人需要大海的气息,有人需要和平的气息。

这儿,马车夫一个个像希腊的哲学家,在小饭店里喝着茶;这儿的夜晚,摩天楼平坦的屋顶上正在演出美国的侦探剧;这儿的林荫道上,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为了换取一些饭钱,吹奏着汤豪舍①的咏叹调,可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老派画家只要花上半小时就可以替你画一幅肖像,足以使你获得一枚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这儿,一群群嘴里叼着香烟的孩子,就像君士坦丁堡街头的狗,也许是无与伦比的。雅罗斯拉夫人在卖煎饼,哥萨克人坐在食品店门前乘凉。要是他不是全俄作家协会会员,没有人会在夏天到这里来参加文学讨论会。至少可以这样说,多利泽②的心早已飞到了阿祖尔凯特山,十二年以前他就打算到那儿去避暑。

当马雅可夫斯基③在综合技术馆里为诗人们纠正发音的时候，听众里有一群被召集来的年轻人，为了减轻马雅可夫斯基的负担，现在该轮到他们朗诵了。这种事只有在莫斯科才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只有在这儿才有人像什叶派教徒一样，时刻准备着躺到地上，让载着洪亮声音的马车从自己的身上碾过。

在莫斯科，赫列布尼科夫④像一头森林里的野兽，能够躲过人类的眼睛，不知不觉地将坚硬的莫斯科宿营地换成绿色的诺夫哥罗德的坟墓；可是，伊·阿·阿克肖诺夫在莫斯科的一次小得不能再小的文学集会上把一只精致的、分析性的批评的红色花环放在伟大的拟古主义诗人的墓碑上，他运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原理来阐述赫列布尼科夫的古典风格，揭示他的创作艺术和16、17世纪古俄罗斯道德典范之间的联系。当时以彼得堡为例，开明的《文学导报》只能用一篇观点愚钝、态度傲慢的短文对巨人的殒落作出反应。旁观者看得更清楚，彼得堡的情况不是很好，它已经不会用时代的野蜂蜜的语言来说话了。

莫斯科的最可悲的标志就是玛丽娜·茨韦塔耶娃⑤的圣母的手艺，她与彼得堡女诗人安娜·拉德洛娃的捉摸不定的庄重风格遥相呼应。文学莫斯科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女性诗歌。近年的经验证明，以新的缪斯的身份出现于诗坛的唯一女性，是由波捷布尼亚和安德烈·别雷⑥首先提出的，后被形式主义学派的艾兴包姆、日尔蒙斯基和什克洛夫斯基⑦奠定基础的俄国诗学。无论是从它的真正意义，还是从它的字面意义来说，大部分的谐模诗文都出自女诗人的笔下。无论是从诗歌的创新方面，还是在诗歌的怀旧方面，女性诗歌是无意识的谐模诗文。大多数的莫斯科女诗人都迷恋于隐喻。可怜的伊西达⑧注定要永远去寻找失去的诗歌比喻的第二部分，它应当把自己最初的统一体归

还给诗歌的形象——俄西里斯[9]。

阿达利斯和玛丽娜·茨韦塔耶娃都是预言家，还应该加上索菲娅·帕尔诺克。预言好像是一种家庭手工。当时，男性诗歌的激昂的写作风格，无法容忍的浮夸的词藻已经让位于正常的发音手段，而女性诗歌仍继续在最高音区颤动着，历史的、诗歌创作的敏感器官使人听不下去。玛丽娜·茨韦塔耶娃那些以俄罗斯为主题的、伪人民性的和伪莫斯科的诗歌的乏味性和历史的虚假性比阿达利斯的诗歌不知要低下多少倍。阿达利斯的声音有时还具有男性的力量和真实性。

创新和怀旧意识在诗歌创作上并肩前进。怀旧，也是创作，是怀旧的创作者。莫斯科文学鉴赏力的痼疾是忽视了真实的两面性。莫斯科竭尽努力在学习新的创作方法。

诗歌创作与口、耳，与怀旧、创新息息相关，必须做一个游方苦行者，以便只用一种呼吸方法取得生存。对通过怀旧进行诗歌创作呼吸的渴望，从莫斯科以极大的兴趣欢迎霍达谢维奇的光临中表现出来了。谢天谢地，他已经写了二十五年的诗，可是一夜之间却变成了诗歌创作的新手。

如同从塔干卡到普留希哈一样，从《玛弗》到《抒情诗人》形成了广阔的文学莫斯科。它的一端是创新，它的另一端是怀旧，马雅可夫斯基、克鲁切内赫、阿谢耶夫[10]站在一端，另一端却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必须求助于彼得堡的食品店，以便标出自己的端线。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谈谈作为莫斯科现象的《抒情诗人》杂志。

在纯创新的营垒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无所作为的、咬文嚼字的克鲁切内赫被驱逐出去，完全不是因为他是左派，是极端分子，因为世界上的确有这种荒唐分子（尽管如此，克鲁切内赫对诗歌创作的态度是绝对的热情，绝对的专一，把创作变得像人一

样的有意义），在这里，马雅可夫斯基最后解决了最基本的但又十分伟大的问题——“创作为大众，不为才能出众的人”。诗歌创作空间在数量上的扩展有赖于诗歌文化的精耕细作和丰富的思想。马雅可夫斯基十分精辟地阐述了世界诗歌创作的丰富多彩和它的复杂性，树立了自己的“创作为大众”的思想，理所当然地让一切难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听众在有了最起码的诗歌修养以后才能听懂的东西都见鬼去。然而要让诗歌面向完全没有这方面修养的听众是一件难以取得成效的任务，就像让自己插在木橛子上一样。如果一个人毫无诗歌修养，对诗歌一窍不通，或者诗歌本身脱离了任何文化，那么，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到那时，按照人的奇特的自然属性变成了无限量听众都能接受的东西。马雅可夫斯基写诗，他的诗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奇巧精致的洋片调，被繁冗的对称分割开的诗段，充斥在每一行里的过分夸张的隐喻和单调而短促的停顿。因此，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必要丢掉自己的特色。他面临着变成女诗人的危险，实际上，他的一半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体现了对大众化的追求，那么在阿谢耶夫的诗里表现出当今时代的有组织的激情。他那闪光的、充满理性的形象性语言给读者带来某种鼓舞人心的新鲜印象。实质上，18 世纪的鼻烟壶味的诗歌和阿谢耶夫的 20 世纪的诗歌写作机器并没有丝毫差别。前者是伤感主义的唯理性主义，后者是组织上的唯理性主义。纯理性主义的、机械的、电机的、放射性的和一般技术性的诗歌创作不可能同出一源，即诗人和机械师都熟悉的那种因素。唯理性主义的，或是机械的诗歌创作不会积聚能量，也不会增加能量，就像自然的、非理性的诗歌创作一样，而只会丧失和消耗能量。旋转得越快，松动得也就越快。弹簧付出的力不可能比它预先知道的多。这就是为什么阿谢耶夫

的唯理性主义的诗歌创作是非理性的，没有成效的，是无性的。机器虽然具有深刻意义和崇高精神，然而种子正由于机器的存在而趋于消失。

目前，莫斯科的诗歌创作热已经消退，许可证已经得到验证，新的申请书早就没有了。创新和怀旧的真实的两重性，就像面包一样不可缺少。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没有一个真正的诗歌创作的流派，没有一个生机勃勃的诗歌创作小组，因为所有的集体不是站在被分割的真理这一边，就是站在它的另一边。

创新和怀旧是推动帕斯捷尔纳克[11]诗歌创作的两股力量，我们希望，他的诗歌将在最短的时间里被人们所熟悉，并且不要对这些作品无休止地发表看起来情调十足，实质上却是十分荒谬的意见，就像从勃洛克开始的，所有的俄国诗人所遭遇到的那种情况。

巴黎、莫斯科、伦敦这样的世界大都市，对文学的态度是异常宽容的。它们允许文学躲在某一道夹缝里，或者完全销声匿迹，允许文学毋需注册登记，毋需居住的地址，也可以借用别人的名字。说起莫斯科的文学是很可笑的，就像说起世界文学一样。第一种文学仅仅存在于评论家的想象之中，而第二种文学仅仅存在于可尊敬的彼得堡出版社的名称上。一个事先没有得到暗示的人会觉得莫斯科完全没有文学。如果他偶然见到一个诗人，他就会摆摆手，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急匆匆地赶路，然后消失在林荫道的绿色大门里，嘴里叼着香烟的孩子们在他身后说了一些赞许的话，他们比任何人都善于评价一个人和预测出这个人的潜在的才能。

译注：

① 德国游唱歌手(1205—1270)。

② 原苏联导演(1903—1983)。

③ 俄罗斯诗人(1893—1930),作品有长诗《穿裤子的云》、《列宁》、《好!》等。

④ 俄罗斯诗人(1885—1922),尝试运用未来主义手法写诗,著有长诗《苏维埃诞生前夕》。

⑤ 俄国女诗人(1892—1941),诗集《里程标》和《手艺》表现了诗人浪漫主义的最高纲领。

⑥ 波捷布尼亚(1835—1891),乌克兰及俄国斯拉夫语文学家;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主要作家之一。

⑦ 艾兴包姆(1886—1959),俄罗斯文艺学家;什克洛夫斯基(1893—),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日尔蒙斯基(1891—1971),俄国语文学家。

⑧ 古埃及神话中管理天、地、黄泉三界的女神。

⑨ 古埃及宗教中的水和植物之神,神话中的冥府之王。

⑩ 俄罗斯诗人(1889—1963),在长诗《布琼尼》、《二十六个》中表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精神。

⑪ 俄罗斯作家(1890—1960),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创作的诗歌有诗集《生活,我的姐妹》、《重生》等。

文学的莫斯科

——情节的诞生

一

修士们无暇在凉快的哥特式建筑的修道院的公共食堂里一面品尝多少算是素食的滋味，一面聆听诵读者朗读《月书》[①]中的在当时算是很优秀的散文。朗读《月书》不光是为了对修士们进行教育，而且也作为饭桌上的音乐，使共同进餐者的精神得到恢复。诵读者所加的佐料维护了公共食堂的和谐气氛和良好秩序。

无论哪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团体企图恢复席间朗读的传统，于是邀请一个朗诵者为大家朗诵，那个朗诵者拿起一本安德烈·别雷的《彼得堡》读了起来，这时，你不妨想象一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有的人的喉咙里鲠了一块肉，有的人用刀拿鱼吃，有的人被芥末灼疼了舌头。

用安德烈·别雷的散文作品当作伴奏，如此的场景，如

此的工作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共同努力，是难以想象的。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时期被认为是土撒拉世纪[②]，和现实没有丝毫联系。可是，舍赫拉扎达的故事据说可以讲 366 天，每个闰年的晚上讲一个，而迭卡缅伦每天和日历相伴，顺从日夜的交替，你啊——迭卡缅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极好的席间读物，如果不是在现在，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将它当作纯文学的东西来对待，就会第一次去读它，理解它，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不会再因读他的作品而痛哭流涕，就像女仆们读了巴尔扎克及其他通俗小说以后一掬同情之泪一样。

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取出金字塔——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不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事情。这好比胃里的一根探杆，它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手术。自从心理实验的溃疡渗入文学意识以后，散文作家就成了手术师，而散文就成了临床的灾难，从我们的审美观点看，这种灾难当然是令人不快的。我一千次地拒绝阅读安德烈耶夫[③]、高尔基、什梅廖夫、谢尔盖耶夫-倩斯基[④]的心理小说以及扎米亚京[⑤]替杰出的美国作家哈特[⑥]翻译的 90 年代一个不知名的大学生的作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什么话也不说，手脚并用，一下子把他推下楼梯，然后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到一个陌生的女人身边。"

这个大学生现在何处？我担心他徒然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过去而感到羞愧，而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将自己交给心理学家们作活体解剖；当然，他们已经不是《知识文集》教学医院里给知识分子做一次拔牙小手术就会引起血液感染的笨手笨脚的蹩脚医生，而是拥有一切印象派抗菌手段的安德烈·别雷门诊部的优秀手术师。

二

梅里美[7]的《卡门》是随着说吉普赛方言的家庭状况为主题的语文学的推论而落下帷幕的。奔放的激情和紧张的情节是通过突如其来的长篇大论来完成的，它接近悲剧合唱中的长短句抒情诗："到处都充满致命的激情，无法抵御注定的命运。"这一切都发生在普希金以前。

如果皮利尼亚克[8]或是谢拉皮翁兄弟[9]把札记本、建筑工程预算、苏维埃通报、报纸上的公告、年鉴的摘录以及其他只有天晓得的东西塞进自己的长篇大论里，我们是不会感到吃惊的。这是些不属于任何人的散文作品。实质上，它们是没有自己名字的。这是有组织地将文字任意结合起来的群众运动。散文作品的要素是积累。它从头至尾是结构和词汇。

现在的散文作家经常被人称之为折衷主义者，也就是收集家。我认为，这说得很好，并没有委屈他们。任何一个真正的散文作家都应是折衷主义者和收集家。应当把个性推到一边去，把路让给没有姓名的散文。伟大的散文作家都是庞大的文学构思的承包者，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构思不属于任何人，而是由集体完成的，无论是拉伯雷[10]的《巨人传》，还是《战争与和平》都是如此。这就是这些作家的名字变成神话的原因。

没有名称的"折衷主义的"散文的追求正与我们的革命要求相吻合。诗歌创作的本身需要散文，由于没有散文，诗歌创作就丧失了空间。它所取得的繁荣是不健康的，并且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无法避开作者的个性，避开(抒情诗人)偶然的、个人的、灾难性的因素，去参加纯粹的文学创作的群众性活动。

为什么革命才能积极地复兴俄国散文作品？这是因为革命

推出了无名的散文作家、折衷主义者、收集家的典型，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建造文学创作的金字塔，而是做一个卑微的法老，监督着进展缓慢的，然而是脚踏实地的现代金字塔的建筑工程。

三

只有当出现了一个不听从于安德烈·别雷的散文作家以后，俄国的散文创作才能前进。安德烈·别雷是俄国心理散文的顶峰，他以惊人的力量展翅高飞，虽然运用自由奔放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也仅仅达到了他的前人——小说家的斧凿水平。

难道他的学生，谢拉皮翁兄弟和皮利尼亚克要重新回到小说家的怀抱，走在这个旋转体的后面，一心等待《知识文库》的恢复吗？在《知识文库》中，创作心理和日常生活将使自己的旧小说——手推独轮车的苦役犯的小说得到恢复。

情节一旦消失，日常生活就会接踵而来。以前，茹尔丹[11]没有想到他会用散文说些什么；以前，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这是死的情节，腐烂的情节，这是苦役犯的独轮车，创作心理拖着这辆独轮车朝前走，因为它需要有所依靠，即使没有活的情节，那么死的情节也不妨拿来用用。日常生活，这是洋化的东西，始终是虚假的异国情调，这种所谓的日常生活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只会注意到最必需的东西，而且也是顺便而已；旅行家，外国人（小说家）那就另当别论了，他们会瞪大眼睛去注视一切，并且不论场合地到处乱说。

当今的俄国散文作家，如谢拉皮翁兄弟、皮利尼亚克，也是

像在安德烈·别雷之前的和革命前的先人们一样，都是心理学家。他们不谈情节，他们不适宜在席间朗读。他们的心理学钉在另一辆苦役犯的独轮车上，也就是说，不是钉在日常生活上，而是钉在民间创作上。我想详细谈谈这种区别，区分日常生活和民间创作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日常生活——盲目地看待一切事物，民间创作——自觉地保存和积累民族风俗的语言材料。日常生活使情节僵化，而民间创作使情节得到发展。如果你细心听听民间创作，就会听到含有情节的生活在里面蠢动，情节在起伏，在每一个民间创作的记录里都存在着情节，这里产生兴趣，孕育情节，一切都被情节挑逗起来，受到它的威胁，变得令人好奇。老母鸡坐在草堆上咕哒咕哒叫着，民间创作的散文作家也在咕哒咕哒叫着，谁感兴趣，就去听听。事实上，他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孵化情节。

谢拉皮翁兄弟和皮利尼亚克（他是他们的兄长，没有必要把两者分开来）无法使认真的读者感到满意，他们因写作趣闻逸事受到人们的怀疑，也就是说，他们以情节来威胁别人。当时，根本无人提及情节，即大规模的叙事体的创作风格，然而趣闻逸事却像一根根触须从每一条缝里钻出来胳肢读者，就像赫列布尼科夫[12]诗中所写的：

山雀用金色的书信装点娇嫩的翅膀
它把许许多多的青草和信念
装进大肚子的箩筐

皮利尼亚克、尼基京、费定、科济列夫[13]等，还有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利金[14]，为什么没有参加他们的团体，还有扎米亚

京和普里什文[15]都有“许许多多的青草和信念”。可爱的趣闻逸事是情节的第一次自由的、快乐的起飞，是从阴暗的悲伤的心理学的僧帽中获得精神的解放。

四

我们目前只能挖好战壕隐蔽自己。民间创作仿佛一辆贪婪的坦克向我们身上压过来。见闻、观感、诠释、短文、闲话，像成群的蝗虫在到处爬行。无孔不入的伽玛射线，大规模的入侵，丰收田野上的雷雨。从此情节和民间创作在文学上有了合法的顺序排列。民间创作产生情节，就像贪婪的坦克吞掉渺小的螟蛾一样。如果说，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种交替，那是因为民间创作没有努力保存自己，从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它作为一个积累和大举入侵的时期，走到了情节的繁荣时期的前面去了。它不想急于进入文学，被人们所承认，而仍然留在私人信件和民间说书人的故事里，留在发表的日记和回忆录里，留在呈文和官府的报告里，留在审判笔录和公告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赞同皮利尼亚克的推论，说什么列斯科夫[16]和第一批铁路工人一起消磨时间，并且借他们之口想说些什么。而我觉得，皮利尼亚克的全部作品中，助祭在公共澡堂里和一个叫德拉乌贝的人的平淡无奇的谈话最为亲切。他们谈话的题目是宇宙的意义，其中没有用一个“好像是什么”，也没有用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抒情色彩的比喻，而是运用表现情节的最基本的技巧。你们一定记得，果戈理的作品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坐着马车，靠近普留什金的时候，一下子弄不清“他究竟是男还是女，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

在散文创作中，除了民间创作这条线之外，同时存在着纯日

常生活的作品。我们对谢拉皮翁兄弟、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普里什文、科济列夫和尼基京之间存在的差异应当给予原谅，因为民间创作的共同特点和对生活气息的保证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每一部作品都是民间创作的真正儿子，都变得像趣闻逸事。只有弗·伊凡诺夫[17]完全不在此例，他应该属于上面提到的叙述日常生活的作家。

如果你仔细听听民间创作繁荣时期的散文作品，那么，你就会听到停留在空中的山雀的雄浑的声音，这就是当代俄国散文作品的共同声音，我不想打乱这声音，因为它不是钟表匠的臆造，而是用装上翅膀的无数青草和信念编织起来的。在不可避免的发动进攻的时代里，在民间创作繁荣的时代里，山雀此起彼伏的叫声将被云雀——民间创作的清脆歌声所取代，到那时，云雀将会在高空啁啾啭鸣，对此有诗为证：

婉转、欢快、清脆、响亮，
他颤动着我的心房。

译注：

① 按教会纪念每个"圣徒"的日子逐月编写的圣徒传汇编。

② 士撒拉，《圣经》神话中挪亚的父亲，共活了969岁。

③ 俄罗斯作家（1871—1919），作品有《我们生活的日子》、《人的一生》等。

④ 什梅廖夫（1873—1950），俄国作家，作品有《公民乌克列伊金》、《饭店来的人》等；谢尔盖耶夫-倩斯基（1875—1958），俄罗斯作家，作品有革命史诗《俄罗斯的改观》等。

⑤ 俄国作家（1884—1937），作品有《县城种种》、《岛上居民》、《我们》等。

⑥ 美国作家（1836—1902），著有短篇小说《加利福尼亚故事》等。

⑦ 法国作家(1803—1870),短篇小说大师。

⑧ 俄罗斯作家(1894—1941),作品有《荒年》等。

⑨ 1921年在彼得格勒成立的文学团体,其宗旨是探索新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和进行形式方面的实验,摈弃文学中的原始派和“招贴画”风格。

⑩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1494—1553),其五卷本长篇小说《巨人传》是一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百科全书。

⑪ 法国元帅(1762—1833),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

⑫ 俄罗斯诗人(1885—1922),尝试用未来主义手法写诗,作品有长诗《苏维埃诞生前夕》等。

⑬ 尼基京(1824—1861),俄国诗人,诗体故事倾诉穷人的厄运;费定(1892—1977),俄国作家,作品有《城与年》、三部曲《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篝火》等;科济列夫,生平不详。

⑭ 俄国诗人、作家(1894—1979),著有小说《两种生活》、《北方》、《朝花园开着的窗户》等。

⑮ 俄罗斯作家(1873—1954),作品有日记、随笔、散文诗等。

⑯ 俄国作家(1831—1895),作品有《走投无路》、《神职人员》等。他是语言大师,又是运用叙述故事手法的巨匠。

⑰ 俄罗斯作家(1895—1963),著有中篇小说《游击队员们》、《铁甲列车14—49》、《有色的风》等。

急风暴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国诗歌作为“现代派”的产物，具有语意双关和亦庄亦谐的特性，从总体上说，已经不能为现在的读者所接受，他们仅仅把它看作诗歌而已。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种诗学体系和两个诗歌创作时代的脊柱的融合。

俄国读者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已经历过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的诗歌创作的革命，或多或少学会了及时从周围的多样化的诗歌创作中抓住客观上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无论是浪漫派、象征派，还是未来派，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总是不顾外部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加吹捧，夸大各自的特殊作用。每一种流派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急风暴雨”时期。只是到了最后，一般在每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逐渐丧失新鲜感和工作能力的时候，他们在文学中的实际地位和他们创造的客观价值才能显示出来。这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汛期，文学潮流不由自主地受到约束，进入自然的河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界限和特征。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俄国诗歌创作经历了两次截然

不同的“急风暴雨”时期，一次是象征派，另一次是未来派。这两种主要潮流都希望永远保持高潮的状态，但是它们都失败了，因为历史已将另一个浪头推到浪脊上，在预定的时间里迫使它们走向落潮，回到共同的母亲——语言和诗歌创作主要因素的怀抱中去。然而，象征派和未来派的诗歌创作高潮虽然在历史上互为补充，但本质上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当把象征派的“急风暴雨”看成俄国文学强烈地、炽热地向欧洲和世界诗歌创作靠拢的现象。所以，这种急风暴雨的现象在本质上具有吸收外部文化的意义。早期的俄国象征主义仿佛是从西方吹来的最强劲的穿堂风。俄国的未来派更接近于浪漫主义，在它们身上具有恢复民族诗歌的一切特征，同时，民族的语言和深厚的诗歌创作传统获得进一步的提炼，这就使它接近了浪漫主义，而区别于外来的俄国象征派，后者曾被称之为“文化使者”，将诗歌文化从一块土壤移植到另一块土壤的传播者。根据象征派和未来派的这种本质区别，我首先举一个追求外部特征上的典型，其次是追求内在特征的典型。象征主义的核心是偏爱重大题材，如世界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题材。早期的俄国象征派是重大题材和“大写的”概念的王国，这些内容都是从波德莱尔、爱伦·坡、马拉梅、斯温伯恩、雪莱①等作家那里直接借用过来的。未来派主要注重的不是诗歌题材，而是它的创作方法，即某种与语言浑然一体的内在的东西。象征派作家首先把题材提到前面，就像一块遮挡创作手法的盾牌。勃留索夫和巴尔蒙特②等作家的早期作品的题材显得尤为鲜明。未来派作家的题材很难与他们的创作手法分开。缺乏经验的眼睛，即使在赫列布尼科夫的著作中也只能看到纯创作手法和赤裸裸的玄虚。

对象征派时期作一个结论要比对未来派时期作一个结论要容易一些，因为后者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也没有像被敌对的影

响所吞没的象征派那样，从那种固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它几乎悄悄放弃了“急风暴雨”的极端做法，继续按照语言和诗歌创作的共同历史传统，把其中客观上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出来。相对来说，对象征主义作出结论比较容易。早期象征派的大题材，像患水肿病一样，肌体臃肿，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巴尔蒙特的气势雄伟的颂歌显得幼稚无力，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同样显得束手无策。勃留索夫是作为城市歌手步入诗坛的，他的著名的大都市主义也历史性地失去了光彩，因为勃留索夫的语言材料和形象材料远远不能适应他所喜爱的题材。安德烈·别雷的先天诗学理论无法使形而上学思想不受保守的陈腐观点的影响。维·伊凡诺夫[3]的复杂的拜占庭-古希腊世界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他作为实际上的拓荒者，像其他的象征派作家一样，是属于拜占庭和古希腊的，而不是一心要去战胜别的国家，他公正地看到在这些国家里有着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源头。然而，由于象征派作家都缺少诗歌的韵律感，维·伊凡诺夫只能不可思议地以拜占庭-古希腊的各种艺术形象和神话使自己的诗歌过于累赘，从而使他的诗歌大大降低了价值。我想特别提一下索洛古勃和阿年斯基[4]，因为他们从未参加过象征派的“急风暴雨”。勃洛克的诗歌创作的命运是与19世纪的俄国诗歌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他也应当特别提一下。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年轻的象征派或者说是阿克梅派[5]的活动，他们不希望像早期象征派那样，再患大题材水肿病。他们清醒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摈弃了早期象征派的狂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表现手法是否丰富多样，叙事是否清晰明了，这样，取得的成功就不完全一样。

没有一种文学遗产，像象征派的作品那样，在短时期里就变得陈旧过时。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俄国象征派，如何滥用大题材和不恰当地使用抽象概念，我们不妨把俄国象征派称为伪

象征派更确切些。所有的伪象征派的东西，也就是说，象征派作家所写的大部分作品保留下来的仅仅是文学史上的某种有局限性的意义。客观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一堆伪象征派的破道具掩埋了。俄罗斯的最热爱劳动的、道德最高尚的一代诗人向时代，向文化工作献出了沉重的贡品。让我们从俄国象征派之父巴尔蒙特开始说起吧。完整保留下来的巴尔蒙特的作品为数很少，大概只有几十首诗歌，然而都是十分优秀的，无论是语言的鲜明性，无论是音节节奏的强烈感，都能与晦涩难懂的诗歌的最优秀的典范相媲美。如果一些要求不高的读者硬要把他的诗歌创作方向引入歧途，这不是巴尔蒙特的责任。巴尔蒙特在他的优秀诗歌《啊，夜晚，请与我相伴》和《老房子》里，从俄罗斯诗歌中汲取新的、优美的外国语音里以后不会再重复出现的声音。在我们看来，这是由于巴尔蒙特的诗歌具有特殊的语音特性，即奇特巧妙地运用了辅音。他的诗歌创作力量的源泉就在这里，而不是凭借粗俗的音乐性。在勃留索夫优秀的(非大都市主义的)诗作中使他成为最彻底的、创作水平最高的俄国象征派作家的那些特点始终没有变得过时。这些特点就是处理题材的胆略，并且充分地驾驭题材——善于从题材中提炼它能够和应该提供的一切东西，并且将题材贯穿到底，为题材找到一个适合的、容量大的盛放诗段的容器。他的最优秀的诗歌作品是绝对驾驭题材的典范，如《俄耳甫斯和欧里狄克》、《忒修斯和阿丽安娜》和《自杀的精灵》。勃留索夫教会俄国诗人如何像他一样尊重题材，在最后的作品《远方》和《最后的幻想》中就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在这些作品里，他向我们提供了诗歌容量的典范，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把意义极为丰富的字神奇般地安排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安德烈·别雷在《骨灰盒》中展示了哲学术语里的带有讽刺意味的语音，从而用德国形而上学词典里的尖锐的散文语句丰富了俄

国抒情诗。在诗集《灰烬》里，作者巧妙地引进了复调音乐，即多声部，类似涅克拉索夫⑥的题材具有独特的音韵结构的诗作。别雷在音乐上的民粹主义思想逐渐变成伴随着伟大的音乐题材具有造型艺术的乞丐的手势。与其他的俄国象征派的作品相比，维·伊凡诺夫的作品更有人民性，在将来也更为读者所接受。他作品中的激昂的旋律所产生的魅力大部分与我们在语文学上的无知有关。维·伊凡诺夫的诗作《沉默的夜晚　寂静的夜晚》和《梅纳达》里充斥着词汇的喧哗和民间语言的大钟此起彼伏的轰鸣，而在其他象征派诗人的作品里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感觉过去，如同感觉未来，这使他和赫列布尼科夫接近起来。维·伊凡诺夫的古代风格并非来源于题材的选择，而是由于他不善于进行相对思维，即进行时间的比较。维·伊凡诺夫的那些具有古希腊风格的诗歌的创作时间不是在希腊诗歌作品之后，也不是与它们同步，而是在它们之前，因为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对粗俗的俄罗斯方言具有强烈感情的人。

这就是俄国象征派的奠基人。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即使在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也是如此。现在再来谈谈他们的同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犯下别人所犯的历史错误，也没有参加第一批象征派的酒宴上的沁人肺腑的狂欢和加入索洛古勃和阿年斯基的行列。

索洛古勃和阿年斯基早在90年代就悄悄开始了各自的创作活动了。阿年斯基对以后的俄罗斯诗歌创作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他首先将刻划心理的俏皮话写进了俄罗斯的新抒情诗里，然后又把这种揭示心理状态的结构传授给未来派。索洛古勃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但纯粹是反面的影响。他用高度的纯理性主义将包括纳德松、阿普赫金和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在内的衰落时期的俄国旧抒情创作手法引向极端的朴素和完美，清洗这

些创作手法中的猥亵的感情的杂质，然后再染上一层与众不同的爱情神话的色彩。他进行各种复旧的尝试，都未能成功，事实上，没有人仿效他这样做。结构的平庸，用词的死板，索洛古勃树立了毫无生气的、陈旧过时的公式的偶像，以便使作品获得美好的，却又是最后的生命。索洛古勃的早期诗和诗集《火圈》是对诗歌创作的旧程式的恬不知耻和毫不手软的摧残，这不是令人羡慕的例子，而是对那些今后企图创作类似这样诗歌的勇敢者的警告。

阿年斯基也像勃留索夫一样，执拗地把历史上的客观题材引入诗歌创作，将心理描写的结构主义引入抒情诗。他虽然怀有向西方学习的热切愿望，但是找不到与自己肩负的任务相称的老师，于是他不得不佯装成一个仿效者。阿年斯基的心理描写既不是一种随意性，也不是敏锐感的闪光，而是真正的严密结构。从阿年斯基的《钢蝉》到阿谢耶夫的《钢夜莺》之间是一条直路。阿年斯基学会了利用心理分析手段作为创作抒情诗的工具。他是俄国未来派中运用心理描写结构的真正先驱，而帕斯捷尔纳克是这方面的出色带头人。阿年斯基至今未被俄国读者所接受，大家只知道他把阿赫马托娃⑦的方法庸俗化了。这是一部俄国诗歌的真本，我真想把《静静的歌》和《柏木雕花箱》完整地收进诗集里。

俄罗斯象征派拥有自己的维吉尔和奥维德⑧，也拥有自己的卡图卢斯⑨，这个排列不是按照年龄的次序，而是按照他们创作的类型。这里必须提一下库兹明和霍达谢维奇⑩。他们是典型的年轻诗人，具有年轻诗人所特有的清纯优美的语音。在库兹明的心目中，老一代的世界文学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对老一代的文学具有先天的偏见，同时又把新的一代奉为经典，认为没有任何作品能超越哥尔多尼⑪的喜剧和苏马罗科夫的抒情歌

谣。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十分成功地培育了用法语词语和波兰词语过分点缀的，语言运用上的有意识的粗放和愚拙。他狂热地崇拜西方的新诗歌，即使像缪塞[12]的《新的罗拉》，他也十分喜爱，他给读者一种错觉，认为俄罗斯诗歌语言已经人为地过早地衰老了。库兹明的诗歌使俄罗斯抒情诗过早地露出了老态的微笑。霍达谢维奇完善了巴拉丁斯基[13]的题材：《我的赠品十分微薄，我的声音十分柔弱》，并且竭力把不成熟的题材进行改写。他心目中的新一代，即普希金时代和普希金以后时代的二流诗人的诗作，只不过是类似罗斯托普契娜伯爵夫人和维亚泽姆斯基[14]那样的业余诗人而已。霍达谢维奇在从俄罗斯根底浅薄的诗歌创作的最佳时期中走出来的时候，在从家庭纪念册和鸿雁传诗中走出来的时候，在从日常的讽刺短诗中走出来的时候，甚至把令人费解的、粗俗的莫斯科方言带到了 20 世纪。上个世纪充斥着老爷作风的文学圈子里曾经使用过这种方言。他的诗作十分大众化，很有文学性，写得十分精致。

对俄罗斯整个诗坛的强烈关注——从笨拙的杰尔查文[15]到写作俄国抑扬格诗的埃斯库罗斯[16]——丘特切夫，都发生在未来派形成之前。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所有的老一代诗人突然变得焕然一新。他们突然十分积极地对不公正的历史和健忘症进行重新评价和草率的纠正。实际上，当时整个俄国诗坛充满着新的求知欲望，它的莫名其妙的诗作给广大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过去进行革命性的重新评价走到了创造性革命的前头。可是，十分遗憾的是，回忆和现实很快就分道扬镳，没有继续并肩前进。未来主义者和过去主义者很快就出现在相互敌对的营垒里。未来主义者不加区分地否定过去，不过，这种否定不过是一种规定的食谱。他们出于卫生的考虑，禁读旧诗人的作品，或者只能偷偷地阅读，绝不在公开场合

下承认自己的这种行为。过去主义者同样为自己登记了这种食谱。我可以断定，许多有名望的文学家直到现在，除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没有读过他们同时代人的作品。我认为，文学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不可调和的仇恨和相互不理解。与现在在俄国出现的鸿沟相比，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的仇恨不过是一场儿戏。可是，不久就产生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两代诗人之间的激烈争论的标准：一个不理解新东西的人就不会了解旧东西；相反，一个了解旧东西的人就一定会理解新东西。如果让“昨天”取代根深蒂固的真正的过去，这将是最大的不幸。这个“昨天”是一学就会的诗歌创作，是被隔绝的鸡窝，是家禽们无拘无束的小屋，这与其说是推敲文字，不如说是工作之余的休息。现在大概只有阿赫马托娃或是勃洛克才能分清安适休闲世界和生气勃勃的诗歌创作之间的界限，这不是因为阿赫马托娃和勃洛克在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必要的挑选之后，自己也变坏了；要知道，他们两人向来没有带着逐渐消失的语感面向人们的。如果他们的时代语感死亡了，那么也是死得光荣。这就是“我们用高尚的羞耻心召唤理性生物中的痛苦”，而决不是一贯的批判家和崇拜者根深蒂固的麻木和极端的无知。阿赫马托娃运用当时最纯洁的文学语言，最坚决地采用俄罗斯的，不光是俄罗斯的，而是所有的民间诗歌的传统创作方法。在她的诗作中至今没有发现反常的心理描写，而是典型的民间诗歌的排偶法，其特点是两个相近主题的鲜明的不对称，如“城里有接骨木，基辅有叔叔”。从这里可以看到两个诗节到了末尾突然加强了力度。她的诗接近于民间诗歌，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本质上，始终是一首首哀歌。诗人十分注意使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含混不清的文学语汇，这种特征使她的诗变得格外有趣，使我们在20世纪爱好文学的俄国女性中能辨别出谁是农妇、谁是村姑。

勃洛克是最为复杂的文学折衷主义现象，他是19世纪因历史原因流失在各处的俄国诗歌的搜集者。同时代人对勃洛克从事的搜集俄国诗歌的伟大工作还没有充分认识，他们仅仅下意识地感觉到勃洛克是善于歌唱的力量。勃洛克爱好搜集的天性，他对搜集诗歌和语言的渴望就像历史上的莫斯科活动家们的政治嗅觉。这是一只强有力的手伸向一切方言土语：一切为了莫斯科，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一切为了在历史上用国家强权拥护者的传统语言创作的诗歌。未来主义充分体现在方言土语里和皇室的横行专制里，体现在民间创作和民族学的不协调里。你们可以到勃洛克的诗作里去找一找！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和历史背道而驰，并且证明语言王国过着一种特殊的生活。

实际上，未来派不应当把矛头针对象征派的纸糊城堡，而应当去反对活着的、构成真正危险的勃洛克。如果未来派没有这样做，这仅仅由于他们特具的对文学的虔诚和恭谦。

未来派使勃洛克和赫列布尼科夫相互对抗。他们互相要说些什么呢？他们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不论是勃洛克，还是赫列布尼科夫都已不在人世的今天。像勃洛克一样，赫列布尼科夫把语言想象成一个国家，但绝不是空间上的，也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时间上的概念。勃洛克是彻头彻尾的同时代人。尽管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崩溃，将被完全遗忘；然而，他作为一个同时代人，将永远留在与他同一代人的思想里。赫列布尼科夫不知道什么叫同时代人。他是全部历史的公民，是语言和诗歌的公民。他仿佛是一个患有痴呆症的爱因斯坦，分不清究竟是铁路桥离我们近，还是《伊戈尔远征记》[17]离我们近。赫列布尼科夫的诗作显得痴呆，这是从这个字的真正的希腊语里的意义上来说的，没有一点贬意。同时代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原谅他为什么在他自己的诗作中没有一点时代的激情。当一个人根本

无视自己的对话人，丝毫不能区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几千年的历史，同时又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像普希金一样的知识广博，出口成诗的创作天才，这将是多么可怕啊。赫列布尼科夫在说笑话，可是没有一个人在笑。赫列布尼科夫悄悄地做着巧妙的暗示，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他所写的大量诗歌只不过是轻松的诗的闲话，就像他自己所说，好比《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插笔，或者好比普希金另外写的一句诗："去到特维尔买一块干酪，再煎一个鸡蛋。"他创作了滑稽剧《颠倒乾坤》和荒唐悲剧《死亡小姐》。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它们既富有纯情，但又令人费解，就像孩子的说话，都是从脑子里挤出来的形象和概念的堆砌。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一篇新的长诗的开头。每十句诗里总有一句恰到好处的格言。赫列布尼科夫所写的甚至不是一般的诗，也不是长诗，而是一部恢宏的全俄罗斯的圣礼书，只要谁想读它，谁就可以从中获益，世世代代取之不尽。

似乎为了形成反差，可笑的命运化身把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具有健全思想的诗作放在赫列布尼科夫的旁边。健全的思想存在于一切诗作之中。然而，特殊的健全思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教育方法。学校教育方法为了把众所周知的道理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里，经常需要直观性，也就是运用诗的武器。充满激情的健全思想是学校教学法的一部分。马雅可夫斯基在用诗歌完善学校教学法工作上的贡献，就在于他为了教育群众运用了直观教学的强大手段。他像一个中学教师随身带着地球仪和其他的图形标志。他用一所朴素的、健康的学校去代替一张谁也看不懂的近代的低级报纸。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名伟大的报纸革新家，极大地简化了句法结构，把名词放在句中的光荣的首位，从而在诗歌语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语言的力量和准确使马雅可夫斯基接近于传统的滑稽草台戏的拉洋片者。无论是

赫列布尼科夫，还是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属于平民的。民粹主义，即随意加了点糖的民间创作是不能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尽管如此，这种民间创作的风格继续反映在叶赛宁[18]的诗作中，也反映在克柳耶夫[19]的一部分诗作中。这些诗人的意义在于他们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从而使他们和这一时代的主要追求目标更加靠近了。

阿谢耶夫[20]完全站在远离马雅可夫斯基的另一边。他编纂了一部专业技术人员的字典。他是一个工程师诗人，是专家，是劳动的组织者。在西方，像他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工程师、无线电技师、机器发明家在诗歌创作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或者只读读弗兰斯·柯普[21]的书。阿谢耶夫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认为机器好像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装备，被他当作诗歌的基础，而这些诗完全和机器无关。抒情电流的开启和闭合使人产生瞬间引起燃烧和强烈的感情放电的印象。阿谢耶夫在用词上特别有抒情色彩，头脑也特别清醒。他从不故意诗化，而是运用必要的材料，像一名好的接线工一样，接通一条抒情的电流。

现在，人为地阻挡诗歌语言发展的屏障已经崩溃了，任何一种矫揉造作的制服式的革新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反动的。

诗歌的创造性时代本身并不是发明时代，而是模仿时代。圣礼书完成之日，就是作日祷之时。最后出版的面向大众生活的，用诗写成的圣礼书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我的姐妹》。从巴丘什科夫[22]时代开始，在俄罗斯诗歌中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新颖的、如此成熟和谐的声音。帕斯捷尔纳克既不是精于虚构的人，也不是魔术师，而是俄罗斯诗歌新风格新结构的首创者，这样的新诗是与语言达到的成熟性和创造性相适应的。可以用这种新的和谐的声音说出要想说的一切；无论是否愿意，大家都将会使用它，因为它现在已成为所有俄罗斯诗人的共同财产。至今为止，

句子的逻辑结构已经和诗歌本身趋向消失，也就是说，和最简单的诗歌构思的表达方法一起趋向消失。习以为常的逻辑发展过程已经从常用的诗歌创作方法中被渐渐抹去，成为像以上所说的不易觉察的东西。句法结构，即诗的血管循环系统逐渐被硬化症破坏。这时，走来一位诗人，他使句子的逻辑结构的未被发掘的力量重新崛起。普希金惊讶地发现，这位诗人正是巴丘什科夫，而帕斯捷尔纳克正等待着自己心目中的普希金的出现。

译注：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先驱；爱伦·坡(1809—1849)，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温伯恩(1837—1909)、雪莱(1792—1822)，均为英国诗人。

② 俄国象征派诗人(1867—1942)。

③ 俄国诗人(1866—1949)，象征主义的理论家及代表。

④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诗集《火圈》有颓废派情调；阿年斯基(1855—1909)，俄国诗人，有抒情诗集《柏木雕花箱》、《遗诗》等。

⑤ 1910—1919 年俄国诗歌的一个流派，主张诗歌摆脱趋向“理想境界”的象征主义激情，摈弃多义和变幻不定的形象以及复杂难解的比喻，要求返回物质世界实体、“自然”势力和用词含义准确。

⑥ 俄国诗人(1821—1878)，作品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

⑦ 俄罗斯女诗人(1889—1966)，作品心理描写充分，充满对历史的敏锐感，著有诗集《光阴的飞逝》等。

⑧ 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古罗马诗人，著有英雄史诗《埃涅阿斯纪》，它是罗马古典长诗的顶峰；奥维德，古罗马诗人，有醒世长诗《爱的艺术》、《爱的医疗》。

⑨ 古罗马诗人，他的爱情诗以坦诚直言和感情真挚著称。

⑩ 库兹明(1875—1936)，俄罗斯作家、作曲家。早期倾向象征派，后

来转向阿克梅派；霍达谢维奇，生平不详。

⑪　意大利剧作家(1707—1793)，意大利民族喜剧的创始人，作品有《一仆二主》、《狡猾的寡妇》、《女店主》等。

⑫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1810—1857)。

⑬　俄国诗人(1800—1844)，与普希金过从甚密，写有哀诗、赠答诗，诗作凄楚哀婉，心理描写深刻，富于哲理。

⑭　罗斯托普契娜(1811—1858)，俄国女诗人；维亚泽姆斯基(1792 — 1878)，公爵，俄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⑮　俄国诗人(1743—1816)，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

⑯　古希腊诗剧作家，“悲剧之父”。

⑰　12 世纪古俄罗斯文学作品。

⑱　俄罗斯诗人(1895—1925)，著有诗集《伊朗情怀》、《母亲的来信》、《致卡恰洛夫的狗》，是典雅抒情诗的范例。

⑲　俄罗斯诗人(1887—1937)，作品有《松涛轰鸣》、《农舍和田野》等。

⑳　俄罗斯诗人(1889—1963)，写有长诗《二十六个》、《马雅可夫斯基正在开始》等。

㉑　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家(1817—1892)。

㉒　俄国诗人(1787—1855)，俄国阿那克里翁诗体抒情诗的倡导者。作品有《欢乐的时刻》、《我的老家》等。

人道主义和当代生活

有这样一种时代，它们说，现在还无暇去关心人，而是要像使用砖瓦水泥那样去使用他们，用他们去建造东西，而不是为了他们。社会建筑学是以人的规模来衡量的。有时，它对人持敌视的态度，以人的屈辱和渺小换得自己的伟大。

亚述利亚的俘虏们像小鸡一样，被巨人般的沙皇踩在脚下。军士们作为国家仇视人的强大力量的化身，用长矛刺死被捆绑的俾格米人①。埃及人和埃及的建筑师们将人民群众当作应当抢过来的多多益善的建筑材料。

但是也有另一种社会建筑学，它也是用人的规模作为衡量标准的，可是它不是用人做材料，而是为了人。它的伟大不是建筑在个人渺小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与自身要求相适应的崇高目标的基础上。

大家都感觉到逐渐向我们靠近的社会建筑学的巍峨。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山峰，可是它已经向我们投来自己的影子。由于我们早已对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形式感到陌生，而习惯于19世纪法制国家平淡乏味的生活，因此，我们现

在怀着恐惧和疑惑走向这片影子，不知道这是什么，是渐渐降临的夜幕的翅膀，还是我们应当进入的故土的阴影。

简单的大机器和单纯的数量都对人怀有敌意。诱惑我们的不是新的金字塔社会，而是哥特式建筑的社会：重心和力量的自由表演，而是被想象成复杂的建筑密林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合情合理，个性鲜明，每一个局部都在大声呼唤。

社会建筑学的特具的意识，即形式庞大丰富的生活结构似乎远远超出人的直接需要，然而却是人类社会固有的本质，这不是凭空向它提出的苛刻的要求。

一旦你把社会建筑学拒之于门外，那么，最简单的，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建筑就会倒坍，人的住房，人类的居所就会倒坍。

在受到地震威胁的国家里，人们建造低平的住房，他们追求低平，不接受建筑学。从法国革命开始，历经 19 世纪的法制生活，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地下的震动和社会的撞击。

可是，地震并没有放过低平的住房，一个混乱的世界突然闯进英国人的 home，德国人的 Gemüt②；混乱在我们俄罗斯的炉火上歌唱，敲打着火炉的风门和烟筒的风档。

怎样才能使人类的住房免遭强烈地震的破坏？哪里才能保证房屋的墙壁不受来自地下的历史的震荡？谁又敢说人类的住所，人的自由之家不应当建在地上，而且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最坚固的建筑呢？

最新一代制定的法律看来在保护它应保护的东西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它绞尽脑汁，但仍然枉费心机。

无论是人权法，也无论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再也不能保护人类的居所，任何房屋都不能躲过灾难，不能给人以信心和保障。

英国人较之其他人在关心个人的法律保障方面显得尤为虚假,他忘记了在他们的国家里,在许多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家的概念,它是一个革命的概念,自然地证明欧洲第一次社会革命是正确的,就它的类型而言,它比法国革命更加深刻,更加接近我们的时代。

正在向我们走来的社会建筑学的博大精深受到其自身使命的制约,即在适应人的需要的世界家庭经济的基础上组织世界经济活动,把家庭自由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让每一处的炉火汇合成燃遍全球的熊熊火焰。

只有那些不理解它的人才会感到未来世界的寒冷和可怕,可是当代的人道主义者会感到未来世界蕴含的温暖,感到合理性、经济性和目的论焕发出的温暖,就像今天火红的炉膛里冒出的热气一样。

如果不把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注入未来的社会建筑学的基础,那么这种社会建筑学定将把人压死,就像亚述利亚和巴比伦的情况一样。

现在,人道主义已经不值钱了,它似乎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被束之高阁。这并不是一个凶兆。人道主义的价值仅仅不见了,躲起来了,就像一枚金币一样,可是就像储备的黄金一样,它能够保障当代欧洲的思想交流,并且不为人知地、更加有力地支配着它。

向金本位过渡,那是将来的事情。在文化领域里,面临着流行于一时的思想更替——将纸币换成欧洲人道主义遗产的黄金铸币。精致美观的人道主义的佛罗伦[3]并没有在考古学家的铁锹下叮当作响,它们将会看到,总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硬通货,在人们的手里传来传去。

译注：

① 非洲的部落。

② home，英文：家；Gemüt，德文：情感。

③ 旧时佛罗伦萨的金币或银币，后来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

阿克梅派的早晨

一

尽管艺术作品会引起感情异常激奋，我希望关于艺术的谈话仍能保持非常克制的态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它渗透着艺术家的处世态度。同时，对于艺术家来说，处世态度是武器，是工具，就像石匠手中的锤子，而唯一现实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本身。

存在，是艺术家的最高自尊心。除存在之外，他不想要别的天堂。当别人对他谈及现实时，他只是苦笑一下，因为他深知有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艺术现实。一个数学家能不加思索地算出一个十位数的二次幂，这种场面足以令人咋舌。然而，我们却对一个诗人也能求出某一现象的十次幂常常视而不见。艺术作品质朴的外表常给我们以假象，使我们无法看到它所具有的高度浓缩的真实性。诗歌中的这种真实性，就是词的本身。比如现在，我尽可能地用准确的，但绝不是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我并不是用词语，

而是用意识去说话。聋哑人能很好地彼此理解。铁路上的扬旗并不借助词语，却能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因此，如果把含义当作内容，那么势必将词语中的其余的一切视为阻碍迅速传递思维的简单的机械附加物。“词的本身”的生成是十分缓慢的。逐渐地，一个接一个地，词的所有成分都融入形式的概念，只有意识的含义，即逻各斯①至今仍被错误地、随意地奉为内容。这一毫无必要的吹捧只会使逻各斯声誉扫地。逻各斯只求与词的其他成分平等相处。未来派无法将有意识的含义当作创作材料，轻率地将它扔出船舷，实质上，他们是在重蹈前辈复辙。

对于阿克梅派来说，词的有意识的含义和逻各斯都是一种极好的形式，就像音乐对于象征派那样。

如果说，词在未来派那儿还在四脚着地地爬行，那么，在阿克梅派那儿它第一次获得了与之相称的直立姿态，并且跨入了它生命中的石器时代。

二

阿克梅派的锋刃不是颓废派的匕首和针芒。阿克梅派对于那些充满建设精神的人来说，并不畏缩地拒绝应负的重担，而是愉快地挑起这副重担，以便唤醒这沉睡中的力量，并将用于建筑。建筑师说，我在营造，这就是说，我是正确的。我们最珍惜的就是诗作中的这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意识。与此同时，轻蔑地摒弃未来派的钓鱼玩具，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根编织针去钩起一个难词，就是最高的享受，而我则将哥特式结构引进词与词的关系，就像巴赫在音乐作品中确立哥特式结构一样。

说不定哪一个疯子才会在不相信材料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同意建造，因为他必须克服材料的强度不足。卵石在建筑师手中变

成了实体。对于一个不是天生的建筑师来说，凿碎石头的凿子发出的声音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证明。面对灰白的芬兰漂砾石，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曾预感到异样的恐惧。巨大的花岗岩的沉默的语言犹如恶毒的魔法使他惶恐不安。然而丘特切夫的石头仅仅是一个词，它“从山上滚下，躺在山谷，也许是自己滚落，也许是被一只思维的巨手推下”。在这意外的坠落中，物质的声音就像清晰可辨的话语一样响起。只有建筑学才能回答这一呼唤，阿克梅派虔诚地抬起神秘的丘特切夫的石头，并为自己的大厦奠基。

石头似乎渴望另一种存在。它自己发现自身中潜在的动能，像是在恳求成为“十字形拱”，与同类一起愉快地互相支撑。

三

象征派是一些不安分的深居简出者。他们喜欢旅行，但又感到不习惯。在自身机体的斗室中，在康德借助自己的范畴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的斗室中，他们都感到不舒服。

顺利进行建筑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对三维空间顶礼膜拜，不把世界视为累赘和不幸的偶然，而将它视为上帝赐予的宫殿。事实上，您说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客人，他靠主人养活，利用主人的好客，但内心却蔑视主人，想方设法算计他。建筑只能是为了实现“三维”，因为它是一切建筑的前提。正因为如此，一个建筑师应该深居简出，而象征派是蹩脚的建筑师。建筑，意味着与空廓战斗，为空间催眠。哥特式塔楼上漂亮的尖顶心怀叵测，因为它一心想刺破青天，指责它的寥廓。

四

人的独特性，即使人成为单独的生物体的东西，由我们体现出来，并进入一个更为重要的机体概念。阿克梅派与生理上具有天赋的中世纪分享对机体和人体的爱。在对精致的追逐中，19世纪丧失了真正复杂性的秘密。在18世纪被视作机体概念的逻辑发展，如哥特式大教堂，如今变成美学上的怪物——Notre Dame②是生理上的节日，是它的酒神节的狂欢。我们不希望在“象征的森林”中用散步来排遣，因为我们拥有更茂密的处女林——神妙的生理组织，我们神秘的、无比复杂的机体。

中世纪以自己的方式确定了人的比重，意识到和承认每一个人，而完全不问其功劳之大小。人们极其乐意、毫不犹豫地接受师长的封号。最卑微的手艺人和最底层的小职员也具有秘密的、颇有分量的重要性，具有这一时代独特的笃信宗教的美德。是的，当抽象存在和没有任何色彩的个人存在被推崇为功勋时，欧洲已经穿过了薄如蝉翼的文化迷宫。由此可见，将所有的人联结在一起的贵族阶级的暧昧关系与大革命的“平等和友谊”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没有平等，没有竞争，只有世间万物为反对空廓和虚无而结成的同谋。

爱事物的存在甚于爱事物本身，爱自身的存在甚于爱自己本人——这就是阿克梅派的最高戒条。

五

A＝A：一个多么精彩的诗歌主题。象征派因同一律而感到苦恼，感到烦闷；阿克梅派却将它作为自己的口号，并用它取代

未必真实的 a realibus ad realiora③。

善于大惊小怪，是一个诗人的主要美德。然而，对于最见成效的规律——同一律怎么能不感到惊奇呢？谁在这一规律面前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惊奇，谁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因此，承认同一律的独立性，诗歌便可无条件地、无限制地终身拥有世间万物。逻辑是意外性的王国。逻辑思维意味着不断地大惊小怪。我们开始爱上了论证法的音乐。逻辑联系对于我们来说，并非是做游戏时唱的儿歌，而是一部由管风琴和声乐组成的交响曲。这交响曲如此难奏，又如此充满灵感，以致指挥不得不发挥自己的全部才华，好让演奏者们唯命是从。

巴赫的音乐多么令人信服！论证法的力量多么巨大！论证，论证，再论证：不加思索地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信以为真，这很容易做到，却很乏味……我们并不在空中飞翔，我们正在攀登那些我们自己能够建造的塔楼。

六

对于我们来说，中世纪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界限感和隔阂感，它从不将不同的层面相混淆，并且十分克制地对待彼岸世界。理性和神秘论的高尚混合体以及将世界视为一个活的平衡体的感觉，使我们接近了这一时代，并且唤醒我们从产生于1200年左右的罗曼语系的土壤里汲取力量。我们这样证明自己的正确：让整条因果链从头到尾为之颤栗，我们将学会“更轻松自如地穿戴活动的存在镣铐”。

译注：

① 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既指“词”（“句子”、“陈述”、“言

语”),又指意义(“概念”、“判断”、“根据”)。在基督教中,逻各斯即三位一体中的圣子。

② 法文,即巴黎圣母院。

③ 拉丁文,意为“从真实到更真实”,这是维·伊凡诺夫提出的象征主义的公式。

词与文化

彼得堡街道上的青草是覆盖当代城市的处女林的最初萌芽，这明亮、温柔、异常新鲜的绿茵属于新的、富有灵性的大自然。彼得堡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不能用地下铁路和摩天高楼来丈量当代生活的步伐，即速度，而应该用从城市的石缝中钻出来的快乐的小草。

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国家体制——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新的自然界，普叙赫①的自然界的温馨的存在中得到延续。在这没有人的灵魂的王国里，每一棵树都将是森林女神，每一种现象都将谈论自己的变态。

制止吗？为什么？当太阳归心似箭，套着短短的挽具向着自己的家园飞驰而去的时候，谁能制止它？向它献上颂歌，难道不胜过向它乞求施舍吗？

他什么也不明白，
像孩子一样懦弱和胆怯，
为了他，陌生的人们，
用网捕获了野兽和鱼……

谢谢你们，"陌生的人们"，感谢你们感人的关怀，感谢你们对旧世界的温柔的护卫，那旧世界"已非现世"，它已经完全沉浸在未来的变态的渴望和准备之中：

我只要想起那最忧伤的夜晚，
那是我城中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只要想起道路上的分离，
伤心的泪水就会涌出我的眼眶②。

是的，旧世界"已非现世"，但它比任何时候都有活力。文化成了一个教会。出现了教会文化和国家的分离现象。上流社会的生活不再和我们相干。我们吃的不是精致的食物，而是公共饭堂里的大锅菜；我们住的不是宽敞的房间，而是修道院里的单人小室；我们穿的不是漂亮的时装，而是粗布衣服。我们终于获得了内心的自由，真正的内心欢乐。我们喝着陶罐里的水，就像在饮酒，比起豪华的饭店，太阳更加喜欢留在修道院的公共饭堂里。苹果、面包、土豆从今以后不仅解除肉体的饥饿，也解除精神的饥饿。基督教徒，现在一切有文化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是肉体的饥饿，只是精神的食粮。对于他们来说，词即肉体，普通的面包即快乐和秘密。

现在，人们分化成了词的朋友和敌人，在这一分化面前，社会差别和阶级对立都黯然失色。这是真正的小羊羔和公山羊。我几乎闻到了来自词的敌人的羊身上的膻腥。即使在发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的对手气味难闻。

文化和国家分离，这是我们革命中最突出的事件，国家体制世俗化的进程，并未像法国大革命理解的那样，因政教分离而中止。社会转折引起更深刻的世俗化。现在，国家对文化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这种态度用“忍耐”二字来加以概括是最合适了。与此同时，国家与文化间的新的相互关系的有机体类型却与各封邑的王公同修道院的关系十分相似。王公们持有修道院是为了让他们给自己献计献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对文化财富的超然态度，使它完全依赖于文化。文化财富装饰国家体制，给予它颜色和形式，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还能给予它性别。国家的大厦、陵墓和门楼上的题字，能保护国家免遭时间的摧毁。

诗歌是一把犁，它能翻耕时间，把时间的深层和黑土都翻到上面。但是也有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怀念时间的深层，像个农夫似的，渴望时间的处女地。艺术革命不可避免地导致古典主义。这不是因为大卫③夺走了罗伯斯庇尔④的收获，而是因为土地本身想这样做。

常常听到这样说：这样虽然好，可惜是昨天。而我说：昨天还没有降生，还未有过真正的昨天。我想得到今天的奥维德⑤、普希金、卡图卢斯⑥，而历史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已经不能使我满足。

令人吃惊的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跟诗人纠缠不清，而且怎么也解不开来。仿佛是——读过了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啃过了。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且听卡图卢斯的银号角：

我们渴望明亮的亚洲城市⑦

比任何未来主义的谜语更折磨人，骚扰人。这句话不是俄语，但应该是俄语。我引用拉丁文的诗，因为俄国读者显然会将它作为

必需的范畴接受过去：诗句中的动词命令式听起来格外响亮。但是，这也是一切诗歌的特性，因为诗歌是古典的。它应被理解为应该成为的东西，而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

因此，过去没有出现过一个诗人，我们摆脱了回忆的重负，迎来了多少罕见的预感：普希金、奥维德、荷马。当一个情人在寂静中被一连串温柔的名字扰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一切都已有过：词语、头发和那只在窗外啼叫的公鸡，它已经在奥维德的三行诗中叫过，这时，他的心中充满着旧景重现引起的欢乐，令人头晕目眩的欢乐：

> 犹如饮着污浊的水，我饮着搅浑的空气，
> 时间被犁铧翻耕，玫瑰成为土地。

于是，诗人不再害怕重复，古典主义的美酒很容易地将他们灌醉了。

凡一个诗人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对于所有诗人来说同样也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去创建任何一种流派。没有必要去杜撰自己的诗学。

适合于词、变化和形式的分析法，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和周密的手段。近年来，破坏成了艺术的纯形式的前提。解体、腐朽、腐烂——这一切都甚于 décadence⑧。然而，颓废派曾经是信奉基督的艺术家，是一群苦难圣徒。腐朽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复活的音乐。波德莱尔诗作中的 charogne⑨是基督徒绝望的最高典型。有意识的形式破坏应该另当别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至上主义。现象正面的否定。出于好奇，打算去自尽。既可以拆开，也可以折起：似乎形式正在接受试验，而实际上，思想正在腐烂，腐

化。(顺便一提,在举波德莱尔为例的时候,我想说,他是一名苦修者,是 martyre[10]这个词的最本质的基督教的含义。)

在词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词就是肉体和面包。它分享面包和肉体的命运:苦难。人在挨饿,国家也在挨饿。但时间比它们更觉饥饿,它想吞食国家。杰尔查文镌刻在石板上的威胁仿佛嘹亮的号声。谁能拾起词并将它展示给时间,就像祭司展示圣餐一样,他将是约书亚[11]第二。没有什么东西比现代国家更饥饿的了,而饥饿的国家比饥饿的人更加可怕。怜悯一个否定词语的国家,这是当代诗人的社会道路和功绩。

我们颂扬致命的重负,
人民领袖含泪将它背在肩上。
我们颂扬政权的重负,
它那不堪忍受的压迫。
只要你心里存在着时间,
你就能听见,你的舰船正在沉没……

请别向诗歌索取加倍的物、具体概念和物质利益。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饥饿。这是督马[12]式的怀疑。为什么一定要用手指触摸?而主要的,为什么要把词与物,与草,与它所表示的物体混为一谈?

难道物是词的主人?词就是人的灵魂的化身。活生生的词并不表示物体,而是像选择住所一样地自由选择物体的这一或那一意义,物和可爱的躯体。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魂围绕着被抛弃的,却未被遗忘的躯体。

我们关于"物"所说的一切,也可以换用形象性的说法来表

示：

抓住漂亮的词藻，将它掐死！

如果你能写，如果你会写，你就去写无诗意形象的诗吧。一个盲人用有视觉的手指刚触及亲人的脸，就认出了他，于是，欣喜的热泪，久别重逢引发出的真正欣喜的热泪夺眶而出。一首诗的存在依靠内在的形象，依靠先于该诗形成的发音模式。当一个词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一首诗却已经唱响了。这是内在形象的音响，这是诗人的听觉在触摸它。

只有相认的瞬间才使我们甜蜜。

现在似乎出现了教徒们祷告时的那种无声嗫嚅的现象。在神圣的狂怒中，诗人们用一切时代的语言，用一切文化的语言说话。一切都是可能的。旧世界的大门向群众敞开，如同一个死者的房间向所有的人开放一样。突然，一切都成了公共财产。大家都去拿吧。所有的迷宫，所有的密室，所有的秘密通道，都畅通无阻，词成了不是七管的，而是千管的排箫，它被各个世纪的气息吹奏得酣畅淋漓。无声嗫嚅中的最令人惊讶之处，就是统治者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哪种语言。他说的是一种完全不知名的语言。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他说的不是希腊语，就是迦勒底语。有一种与博学多识完全相反的东西。当代诗歌，尽管结构复杂，别具匠心，但仍是幼稚的：

请听听这朴素的歌⑬……

我认为，当代的综合性诗人不是维尔哈伦⑭，而是属于某一文化的魏尔伦⑮。对于他来说，旧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就是那管普希金的排箫。思想、科学体系、国家理论在他的体内歌唱，如同野莺和玫瑰在他的前人的体内歌唱。有人说，革命的原因是星际空间的饥饿。应当将麦粒撒向天空。

古典的诗歌——革命的诗歌。

译注：

① 人的灵魂的化身。

② 原诗为拉丁文。

③ 公元前 11 世纪末至前约 950 年以色列犹太国国王。

④ 法国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党人。

⑤⑥ 均为古罗马诗人。

⑦ 原文为拉丁文。

⑧ 法文，意为“颓废”。

⑨ 法文，意为“腐尸”。

⑩ 法文，意为“殉教者”。

⑪ 《圣经》神话中摩西的仆人和继承人。

⑫ 约公元 820 年率拜占庭人起义的领袖。

⑬ 原文为法文。

⑭ 比利时法语诗人，戏剧家(1855--1916)。

⑮ 法国象征派诗人(1844—1896)。

坠　落

一

诗歌需要古典主义，诗歌需要希腊化时代，诗歌需要激起的形象思维、机器般的节律、城市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农村的民间创作……面对着众多苛求的枪口，可怜的诗歌只能闪到一边。诗歌究竟应该如何？也许，它根本不应该考虑如何，谁也不需要诗歌，诗歌的债权人全都是伪装的！要想谈论艺术需要什么，必须做些什么，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第一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这是抽象讨论的永恒主题；第三，这样做使我们能摆脱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即感谢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用最普通的方式感谢现时被叫做诗歌的东西。

啊多么可怕的忘恩负义：库兹明、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布尼科夫、阿谢耶夫、维·伊凡诺夫、索洛古勃、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1]、霍达谢维奇——他们之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都是用不同的粘土捏成的。要知道，这

些诗人既不属于昨天,也不属于今天,而属于永远。上帝没有亏待我们。人民无法选择自己的诗人,如同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人民不善于尊敬自己的诗人,却得到……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可以这么说,他们还顾不上诗人;然而,人民的纯粹的愚昧和纨绔子弟的不学无术究竟有哪些差别?霍屯督人为了考验老人,强迫他们爬树,然后再摇动树干。如果哪一个老人体力不支,掉了下来,这说明他应当被处死。假斯文塑造着霍屯督人,他们那种惯用手段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有人需要诗歌,有人需要霍屯督人的游戏。

没有任何东西能巩固假斯文的地位,就像同一代的读者必须面对一代代诗人的频繁更替。读者已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剧场里的观众。他们的面前行进着不断变换的流派队伍。读者皱起眉头,做着鬼脸,吹毛求疵。最后,他们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俄国国内诗歌流派的急速更替,从象征派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个个都落到了同一个读者的头上。

90年代的读者群,是诗坛上无能为力的、完全不够资格的一代。他们坠落了。因此,象征派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的读者,无论在物质力量方面,智力方面,教育程度方面,思想成熟方面,象征派诗人都要比他们所面对的幼稚青年要老练得多。1900年在社会趣味的颓废方面甚于90年代,与新流派的战斗堡垒——《天平》杂志同时存在的,有水平低下的《野蔷薇》派,这是一套粗制滥造,故弄玄虚的不定期的文学丛刊。

当已完成的诗歌现象一个个地走出象征主义宽广怀抱的时候,当氏族已经瓦解,出现个性的、诗歌个体王国的时候,接受诸如象征主义、氏族诗歌熏陶的读者,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会显得不知所措,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氏族的帽子已经消失,每个人都

各自光着脑袋站着。继注入新鲜血液和宣布了具有非凡容量的文学标准的氏族时代之后，继在维·伊凡诺夫的浑厚的钟声中庆祝胜利的稠密的混合体之后，个体的时代，个性的时代接踵而来。但是，所有的当代俄国诗歌已经离开了氏族的、象征主义的怀抱。读者都很健忘，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啊，橡实，橡实，当我们吃橡实的时候，橡树又有何用。

二

有一次，我终于拍摄到了鱼的眼睛。照片上有铁路桥和几处风景的细部；可是，鱼类视力的光学原理使一切都不可想象地扭曲了 如果能拍摄到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②院士或者某一个俄国知识分子的诗的眼睛——他们是如何看比如说普希金的，那么，这出人意料的景象决不会亚于鱼的视觉世界。

诗歌作品在读者视觉上的歪曲，是完全必然的社会现象，与这种现象进行斗争是很困难的，也是徒劳无益的。在俄国实现电气化要比教会有文化的读者读普希金的作品容易，当然只能做到让他们读懂字面的意义，而不能做到获得他们精神上需要的东西以及达到智力所能及的水平。

以诗歌文字为例，它不同于音乐文字和音符记谱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大的空白，没有任何的记号，没有唯一能使诗文变得明了易懂和合乎规律的指南。然而，所有这些记号比起音乐符号和舞蹈记号要准确一些，因为有文化的诗歌读者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记号的，好像这些记号是从诗文里面抽出来的。

诗歌知识在任何情况下既和普通知识，也就是说读字母的知识不相吻合，也和广博的文学知识不相吻合。如果普通文盲和文学盲在俄国所占的比例很大，那么，诗盲的比例简直大得可

怕，更糟糕的是，人们把诗盲与普通文盲和一切仅仅会认字的人混淆在一起，认为这些人都是有诗歌修养的。上述情况主要是指那些教养不足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染上了假斯文的毛病，丧失了最基本的语感，实质上已经变成不能说话的哑巴，变成在语言上不定形的一族，他们满足于早就被廉价的教唆者、未必真实的抒情风格和往往与俄罗斯的言语要素格格不入和处于敌视状态的新词语弄得感觉迟钝的语言神经。

当今的俄国诗歌应当满足这些语言游民的需要。

产生于最深层的言语意识的字服务于聋哑人和拙口笨舌的人——词的克汀病者和退化者。

象征派的伟大功绩，它对待俄国读者群的正确立场表现在它的诱导工作上，表现在它的天赋的声望上，表现在用以教育读者的浓重的宗法意识和立法思想上。

必须使读者，同时也使依赖读者生存的批评家知道自己的分量。随心所欲的诠释诗作的批评不应该存在下去，它应该让位给对诗学的客观的科学研究。

也许，俄罗斯诗歌的一切现状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人民对属于自己的诗歌的一无所知和一窍不通。

保持着健康的语文嗅觉的群众，那些生成着，加强着，发展着语言词汇的阶层尚未接触到充满着个人主义的俄国诗歌，因为它还没有普及到自己的读者，也许只有当把自己的光辉洒向这与世隔绝的、目前还达不到目标的诗歌的星辰殒灭的时候，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译注：

① 俄国诗人(1886—1921)，20世纪初阿克梅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 俄国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1853—1920)。

简论诗歌

当代的俄罗斯诗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早在我国诗歌的过去的预料之中，难道亚济科夫①发出的弹指声和铿锵声不是预示着会出现帕斯捷尔纳克吗？这一例子足以说明诗歌的炮队是用超越射击来互相交谈的，对将它们分割开来的时代的冷漠毫不在乎。诗坛上始终在进行着一场战争。只有在社会白痴时代才出现和平和休战。词根的统帅们在互相攻击。词根在黑暗中作战，互相抢夺食物和地浆。俄罗斯的，即无文字的尘世语言，常用的词源学，老百姓的语言和僧侣的书面语，教会斯拉夫语以及充满仇恨的拜占庭文字之间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一批知识分子是拜占庭僧侣，他们把异己的精神和异己的面貌强加给语言。在俄国，修士们，即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所说的话始终是不同的。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②创造的教会斯拉夫词语在当时就像现在报纸上的新词。口头语言善于适应，它能够将仇恨的铁块炼成合金。口头语言始终能找到处于中间的捷径。在对待语言历史方面，它持和解的和颇为宽容的态度，即妥协主义的态度。诗歌语言向来没

有足够的“和解精神”，几百年以后又出现了历史上的不和，如同有一只苍蝇在里面嗡嗡作响的琥珀早就涂上了一层松脂，它那有生命的异物仍然活着，处于化石状态。在俄罗斯诗歌中发生作用的一切东西都有利于异己的修士文学。一切知识分子的文学，即“拜占庭文化”都是反动的，也就是说，是凶恶的，它会带来灾祸。一切趋向于诗歌语言世俗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旨在将修士知识分子——拜占庭文化从诗歌中驱逐出去的东西，都将给语言带来好处，即带来长寿，从而正确地帮助它建立在存在其他语言的家庭中独立生存的功勋。不过，也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比如说，像西藏人一样，人民具有先天的神权思想，像满族人一样从非宗教的外国征服者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在俄国诗坛上从事头等大事的仅仅是那些直接参加过语言平民化和世俗化工作的人。他们是：特列齐亚科夫斯基③、罗蒙诺索夫④、巴丘什科夫、亚济科夫，最后是赫列布尼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

如果我能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最基本的，再也不能简化的物体，我会把诗歌语言状态下的负极和正极描述成在意义外壳下的词汇之花的怒放和词汇熔岩的硬化。游移不定的、多义性的词根使诗歌语言变得生机勃勃。

词根的因子是辅音，它的生命力的标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赫列布尼科夫的《会说笑的说笑女人》）。词的增加不是依靠元音，而是依靠辅音。辅音是繁殖语言后代的种子和保证。

低下的语言意识导致辅音感觉的消失。

俄罗斯诗歌中到处浸透着辅音，或是“嗤”，或是“唏”，或是“呲”。这是真正的平民的言语。修士的言语则是元音组成的启应祷文。

亚济科夫之后，在诗歌战场上与拜占庭修士文化交战的战火已经熄灭，在这片光荣的领域里很久没有出现新的英雄，俄国

诗人一个接一个地充耳不闻语言的喧嚣，面对汹涌的声浪变得听觉迟钝，只是通过助听管才能在词汇的喧哗中分辨出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举例：在《聪明误》中有人对聋老头喊叫："公爵，公爵，向后走。"（索洛古勃）一小部分词汇还是可以的，并没有陷入毫无出路的绝境，它有时用灼热的圆圈把说话者团团围住，然而它却是一个征兆，说明说话者不信任自己的土壤，不是在一切地方都能站住脚的。实际上，俄国象征派是苦修风格的柱塔僧⑤：总共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五百个词——就像波里尼西亚人的词汇。至少他们是一些苦行僧、苦修僧。他们站在木墩上。阿赫马托娃站在一块托板上，这是托板上的柱塔苦修。库兹明在托板上撒上青草，使它看上去像块草地（《外地的夜晚》）。

普希金有两句诗是对诗歌的革新者说的。一句是："为了搅乱我们教民们平庸的愿望，又展翅飞走了。"另一句是："当出现伟大的格鲁克⑥为我们揭示新的秘密的时候。"一切用外国的语言和言语形象去引诱本国诗歌的人，都将成为最在行的革新家——诱惑者。说什么在俄罗斯言语中潜伏着拉丁语，潜伏着希腊语，这是不正确的。如果这样，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说，在俄语的音乐中有黑人的鼓声和卡菲尔人的单音节的表意。在俄罗斯言语中只存在它的本身。如果俄国诗人创作的诗歌读起来像拉丁语，这不应受到赞许，而是它的耻辱。那么，格鲁克怎么样？深奥的、具有诱惑力的秘密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俄国诗歌的命运来说，深奥的，具有诱惑力的格鲁克的秘密并不隐藏在梵语里，也不隐藏在希腊词语里，而是隐藏在诗歌语言的循序渐进的世俗化——请把《圣经》的拉丁文本拿给我们，我们不要拉丁文的《圣经》。

当我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我的姐妹》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经》拉丁化的纯情的快乐，它已经从平民言语的外部影响

和马丁·路德⑦粗俗的日常用语中解放出来，让大家都能理解，而那些多余的拉丁文早就不是不可理解的词语了。这是僧侣们的最大遗憾。当住在瓦房里的德国人第一次打开仍散发出油墨香味的，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啊。朗诵赫列布尼科夫的诗作可以与更宏伟、更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相比。一个没有受到历史的苦难和暴力压迫和损害的循规蹈矩者竟然发展了语言。赫列布尼科夫的语言如此平民化，似乎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僧侣、拜占庭和知识分子的文字。这是地地道道的非宗教的世俗的俄罗斯语言，是俄罗斯有书面语以来第一次发出的声音。如果你们接受了这种观点，就没有必要把赫列布尼科夫看成会魔法的巫师。他指出语言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过渡的中间阶段的道路，这条决定俄国语言命运的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道路，只有在赫列布尼科夫的诗作中得以实现，并在未来派的作品中取得发展，这些未来派作品是一种过渡形式，它还来不及用正确发展中的语言的意义外壳去包装自己。

当轮船经过近海航行以后驶入大海的时候，那些不能忍受摇晃的人都上了岸。在赫列布尼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俄国诗歌又驶入了大海，许多老乘客不得不纷纷离开诗歌之船。我看见他们提着箱子站在已经搁到岸上的跳板上。然而每一个新乘客，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此时此刻登上了甲板。

当费特出现的时候，

沉睡的溪流泛着银光，轻轻摇动

震荡着俄罗斯诗坛，当费特离开时，他说：

还有那不朽的语言的热盐

这语言的热盐，这哨声，弹指声，沙沙声，闪光声，拍水声，丰富的声音，丰富的生活，形象和感觉的春汛以空前的力量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中一跃而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费特诗歌中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返朴归真现象。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那些辉煌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俄罗斯诗歌现在已经过时。它显得淡而无味，因为它是不朽的。它没有风格，因为它被夜莺的声音单调的啼啭所表示的欢乐弄得喘不过气来。是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是直率的发情期的鸣声（松鸡在发情期，夜莺在春季），是咽喉特殊生理结构的结果，是既像羽毛，又像鸟的凤头一样的特征。

这是飞入云端的哨声，
这是践踏碎冰的吱吱声，
这是使树叶结冰的夜晚，
这是两只夜莺的决战……

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会使喉咙清润，会使呼吸强劲，会使肺叶康复，这样的诗有助于治疗肺病。我们现在没有更健康的诗歌。这是喝过美国牛奶以后端上来的马乳酒。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对我来说，是锻炼呼吸的绝好教材，每读一次，我的嗓子就发生新的变化；每读一次，有力的呼吸器官就作一次新的调整。

帕斯捷尔纳克运用的是一个坚定的对话者的句法，他热情地、激昂地证明着某件事；那么，他究竟要证明什么呢？

难道海芋

在乞求池塘?
夜晚白白地
关怀着腐烂的回归线。

这样,诗歌挥动着双手,嘟嘟哝哝说着话,摇摇晃晃朝前走着,它头昏脑胀,像傻子似地失去了理性;尽管如此,唯一头脑清新的,世间万物中唯一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仍然是它——诗歌。

当然,当赫尔岑和奥加列夫童年时站在麻雀山上的时候,他们在生理上已经感受到了广阔天地和小鸟飞翔的神圣的欢乐。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为我们叙述了这个时刻:光辉的胜利女神从雅典卫城飞来,降临在麻雀山上。

译注:

① 俄国抒情诗人(1803—1846)。

② 斯拉夫启蒙思想家(约815—885)。

③ 俄国诗人,语文学家(1703—1768)。

④ 俄国第一个世界驰名的自然科学家、诗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奠基人、画家、历史学家(1711—1765)。

⑤ 终日幽居于柱形塔式教堂内进行苦修的僧侣。

⑥ 作曲家(1714—1787),18世纪歌剧改革者之一。

⑦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活动家(1483—1546)。

獾　穴

（阿·勃洛克：1921 年 8 月 7 日—1922 年 8 月 7 日）

一

勃洛克逝世一周年的日子理应是很普通的，因为在俄罗斯的日历上，8 月 7 日仅仅是生命的开始。勃洛克虽死犹生，新的命运，Vita Nuova①正在度过自己的婴儿期。

俄国批评界挥发出来的沼气，伊凡诺夫·拉佐姆尼克、艾亨瓦列德、佐尔根弗列伊等人施放的浓密的毒雾，去年汇聚成一团，至今还没有消散。

关于抒情诗的抒情诗仍在继续。这是抒情的发情期的鸣叫最粗俗的形式。这是臆测。这是任意设置的前提，这是形而上学的猜测。

一切都在摇摇晃晃：从头至尾都是自作主张的判断。

请不要羡慕读者，他们希望从 1921—1922 年的文学中获取关于勃洛克的知识。

艾兴包姆和日尔蒙斯基的著作，正是他们的“著作”被天主教的启应祷文，被抒情诗批评家们施放的沼气淹没了。

在勃洛克死后的生命刚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学会认识勃洛克，学会与认识上的错觉和畸变的必然系数进行斗争。我们逐渐扩大人人必须具有的关于诗人的知识，从而扫清诗人死后命运的道路。

确定诗人的文学形成过程，他的文学起源，他的亲系和出身，立刻就使我们站到一个坚实的土壤上。批评家可以不必回答诗人准备提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必须回答：诗人从哪里走来？

纵观勃洛克的诗歌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创作中的两条线和两个突出的源头——本地生活的、俄罗斯的和外省的、欧洲的。80年代是勃洛克的摇篮。因此，当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诗人，即将走完这条道路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80年代。

本地生活的和欧洲的东西，并非仅仅是勃洛克诗歌中的两极，而是最近十年的所有的俄罗斯文学的两极。从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②]开始，在俄国社会中逐渐形成一条思想的鸿沟。摒弃对欧洲的浓厚兴趣，脱离欧洲文化的统一体，离开它伟大的怀抱，几乎将它视为异端，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是，他们出于羞耻，都不敢承认这一点。似乎为了急于纠正某人的错误，抚平拙口笨舌的一代人的过失（这一代人非常健忘，具有炽热的爱，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也为自己，为他们，为80年代、60年代、40年代的人们，勃洛克庄严地宣誓：

我们爱一切：地狱般的巴黎街巷，
威尼斯怡人的凉爽，

从远处飘来柠檬树林的芳香
和科隆的烟灰色的楼房。

然而，最重要的是，勃洛克具有对历史的爱，对俄国历史上出现的在知识界和民粹派的标志下经历的内务时期采取历史的客观态度。涅克拉索夫的三部巨著对他来说是十分伟大的，就像赫西奥德[3]的醒世叙事长诗《工作与时日》。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伴侣是七弦琴，对于勃洛克来说，它比起古典竖琴更为神圣。他拿过茨冈人的情歌，将它写成全民的热情的语言。看来，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4]高高的、数学的头脑在勃洛克的俄国现实意识的闪光世界里已经感到真正不朽的大理石般的凉意。

对勃洛克的历史嗅觉不必感到惊奇。当勃洛克在主动要求聆听革命音乐之前，他早就听过地下室里的俄国历史音乐，在那里，尽管紧张地竖起耳朵，也只能捕捉到切分音的休止。科斯托马罗夫、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5]从勃洛克描写俄罗斯的每一行诗里看着我们。尤其是克柳切夫斯基，他是善良的天才，具有一颗平常心，他是俄国文化的护卫者，有了他，任何灾难，任何考验都不可怕。

勃洛克是19世纪的人，他知道这一世纪的日子即将终结。他贪婪地、不失时机地扩大和深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只獾在地下挖洞，营造自己的住所，并且开好两个洞口。世纪是獾穴，这一世纪的人生活在几乎没有余地的空间里，狂热地设法扩大自己的领地，尤其珍惜地穴的洞口。勃洛克按照獾的本能，深化自己19世纪的诗歌知识。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诺瓦利斯[6]的蔚蓝色的花朵，海涅[7]的幽默，普希金的全部渴望，早就使勃洛克感到十分痛苦。普希金曾经希望用火热的嘴唇去亲吻与世隔绝的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的民间创作的能够给人解渴的

汩汩清泉。勃洛克的作品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罗马人和德国人的天才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使我们再一次想起《瘟疫时的酒宴》[8]中的一段“夜色中柠檬和月桂飘香”的描述和那支《我为梅丽的健康举杯》的歌。19世纪的全部诗体，就是勃洛克的势力范围。他是那里的皇帝，当他的行动变得令人敬畏，他的语调变得颐指气使的时候，他的声音显得坚强有力。勃洛克对诗体的主题材料运用自如，这使他产生一种想法，即最近时期出现的某些个别的、偶然的情节获得了与神话相同的公民平等权利，唐璜[9]和卡门就是这样的主题。梅里美的结构紧凑的优秀小说非常走运：比才的轻快雄壮的音乐如同战斗的号角，把永恒的青春和对罗曼种族生活的渴求的消息传遍了穷乡僻壤。勃洛克的诗为欧洲家庭中的年轻的神话故事提供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勃洛克历史诗体的顶峰，在传说形式中自由驰骋的欧洲神话的胜利，既不害怕时代错乱现象，也不害怕当代现实——这就是《骑士团长的脚步》。在这里，时间的岩层重重叠叠地覆盖在重新翻耕过的诗歌意识上，老情节的子实长出茁壮的幼苗（静静的黑黑的马达像只猫头鹰……从远方的陌生的安乐之土传来雄鸡的啼唱）。

二

勃洛克是文学上的开明的保守派，凡涉及风格、格律、形象的问题，他的态度表现得特别谨慎，处处保持与过去传统的一致。当你把勃洛克当作文学的革新者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英国的上院议员，他们在议院里非常策略地推行新的法案。这是一种与其说是俄国的，不如说是英国的保守主义。这是在传统和绝对忠于传统的范畴里进行的文学革命。勃洛克像一个学生那样，直接听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费特的教诲，自始至终没有

违背自己应尽的义务，没有放弃自己的虔诚，没有践踏任何一条文学准则。他仅仅用各种新的虔诚不断充实自己的诗歌 credo（信条），所以他很晚才将涅克拉索夫的诗学准则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而直接接受俄国诗歌创作中绝无仅有的现象——普希金的典范影响，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勃洛克在文学上的软弱性，并不是因为他优柔寡断。他深感风格是一种物种，因此他感觉到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生命并不像折断或摧毁一件东西那样简单，而是各种物种、血统的杂交和交配，是将各种果实嫁接到同一棵树上。

勃洛克全部作品中最出人意料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十二个》，它不受已经形成的文学准则的束缚，运用了俄罗斯民间短歌"四句头"的形式。长诗《十二个》是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戏剧式的"四句头"。它的重心表现在结构和各部分的布局，因此，从一段"四句头"结构过渡到另一段"四句头"结构具有特别的表现力，长诗的每一段都是释放新的戏剧能量的能源；但是，《十二个》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还在于直接吸收于民间文学的材料本身。长诗容纳了流行于街头的俚语俗话，还有不少类似"她的长袜藏着几张克伦纸⑩"这样瞬间即逝的词语，恰到好处地将它们用到长诗的表现手法里。《十二个》的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像《战争与和平》中几个年轻人物的谈话。尽管人们对长诗发表各种各样空洞的议论，《十二个》如同民间文学一样，是一部不朽的作品。

俄国象征派的诗歌博而不精，大肆侵占别的领地。他们，如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安德烈·别雷等人都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领域，又把它们变为废墟，然后又像劫掠者一样，继续向前拓进。勃洛克的诗自始至终，从《美妇人诗集》到《十二个》都是色彩鲜明，富有文化的创造精神。勃洛克诗歌的主题发展从崇拜走向崇拜，

从《陌生女郎》、《美妇人》出发，经过《滑稽草台戏》、《白雪假面》，走向俄国和俄国文化，然后又走向革命——最高音乐强音和灾难性的文化本质。诗人的心情推动了灾难的形成。崇拜加上文化，被认为是隐蔽的、被保护起来的能源，是等速的、合理的运动："爱，使太阳和其他的星体转动。"

诗歌文化来自防止灾难发生的愿望和将灾难放在从属于整个宇宙体系的中心太阳的位置上，无论是像但丁所说的爱，还是音乐，最后向它走去的是勃洛克。

关于勃洛克，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陌生女郎和俄国文化的诗人，当然，如果把陌生女郎和美妇人说成俄国文化的象征，这也是错误的；然而，崇拜的需要，即合理释放诗歌能量的需要支配着他的主题创作，并且在为俄国文化和革命的服务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译注：

① 意大利文，意为：新的生活。

② 俄国文学评论家、诗人(1822—1864)。

③ 古希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

④ 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1853—1889)。

⑤ 科斯洛马罗夫(1817—1885)，俄国和乌克兰历史学家、作家；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宗教哲学家、诗人；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俄国历史学家。

⑥ 德国诗人、哲学家(1772—1801)。

⑦ 德国诗人、政论家(1797—1856)。

⑧ 普希金创作的一部诗剧。

⑨ 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放荡不羁的骑士形象。

⑩ 指克伦斯基政府发行的二十、四十卢布的纸币。